

柳州文史资料

第三期目录

- 回忆“龙城求是学会”……………张振民遗稿(1)
- 附:“回忆邓子恢先生”……………刘克初遗稿(4)
- 清末两张学业文凭……………市党史办供稿 刘明文整理(5)
- 龙城中学的战斗历程……………高天骥(11)
- 柳江国民中学的沿革……………董咸熙(38)
- 柳江二中(今一中前身)建校经过……………陈显达(49)
- 柳江图书馆的遭遇……………董咸熙(55)
- 建国前柳州各报纸简介……………党史办供稿 邓冠濂整理(61)
- 陆荣廷时期高等审判厅片断经历
- ……………阙绳武口述 陈显扬记(72)
- 柳州法院的早期情况……………文史室(76)
- 回忆解放前的柳州法院……………李又新 覃登试(78)
- 柳州电报历史资料小辑……………文史室(86)
- 柳州电报局一鳞半爪……………王乃昌(88)
- 柳州电话局的创建及其沿革……………朱继珍(91)
- 关于柳州电话局创建的补充……………卢一民(100)
- 柳州乡村电话的创办及其
- 成立后的十年……………卢一民(106)
- 柳江县电话沿革(1940—1979)年表
- ……………刘家葵(119)
- 广西柳州市灾区图……………市图书馆供稿 于辉云整理(123)
- 广西柳州大火灾情资料补充……………文史室(125)

梧柳线航运概况……………市工商联供稿 龙文熙遗稿 (131)

解放前柳州南北两岸交通 ……………梁镇海 (148)

柳州印刷业

市工商联供稿 李希祐 黄尧卿口述 刘郁卿记 (158)

柳州新华烟厂始末

……………市工商联供稿 熊华章撰 黄炳藻整理 (165)

柳州植物油厂概况 ……………钟美全 (172)

解放前柳州工业概况 ……………唐天禄 白正驹 (183)

抗日时期柳州经纪行业概况 ……………刘振先 (206)

抗战时期柳州工商业经济概况 ……………刘振先 (211)

回忆公私合营永新织造厂

……………市工商联供稿 盛德莹记 (217)

柳州三青团从组成到消灭 ……………蒋 霖 (219)

临解放前，国民党在柳州的应变

活动及其覆灭……………蒋 霖 (224)

秦镇投降真相 ……………朱焕章 (236)

惊险的一晚……………刘郁卿 (244)

质疑 订正 补充

“覃连芳在柳州沦陷前被挟持到重庆”之说，

不符事实的考证 ……………文史室 (247)

柳州高工搬迁情况 ……………刘启陆 (250)

编后话 …………… (252)

照片：鱼峰山上摩崖“柳州创建电报”勒石

市博物馆供稿 陈国康拓

回忆“龙城求是学会”

张振民遗稿

龙城“求是学会”是邓子恢先生创办的。

邓先生名承绪，字子恢（后改恢禹），柳州人。少时刻苦读书，年十八入学为秀才，未几补邑廪生。因家甚贫，侍父母克尽子道。设书馆于西门细柳巷内，初收小学生二十余人，管教甚严；附近街邻父兄多送子弟从学，逐年都有增加，馆内几不能容，学生两人共书桌一张。将及四十人。后又收大龄学生十余人。每日课程分别讲解《四书》、《经书》、《历史》。并抄读古文，和《戴东原先生文集》（戴东原乾嘉时人，经学名家）。每三日作文一次，诸生呈卷后，删改课文每至夜深始去休息。文有不通顺者，必详为解释，俾学生得到了解为止。戊戌政变失败后，国事日非，先生读到当日书报，极为愤慨。并嘱学生多阅看新书，及梁启超先生《饮冰室文集》等。当时清政府已废除八股，改习策论。至一九〇四年（光绪卅年），停止科举考试，筹备开办学堂，惟本郡中学尚未组成，先生于一九〇四年秋间创办“龙城求是学会”，会址在北大路二巷仓沮二公祠内，招集柳州青年约卅余人，集会讲学。开学时先生讲话：“今天是‘求是学会’开学的第一天，各位热心到来踊跃参加，我很高兴。学

会用‘求是’二字，就是实事求是，身体力行，达到最后目的。现在科举已停止，私馆已结束，桂林各学校或在筹备中或未定期招考，本郡中学亦未能即时组成，在此青黄不接的时期，学业是不可荒废的，还是要继续起来，学会之设，就是这个意义。暂定一个时间，聚集一堂，来研究新旧书籍。并设体操一科，请刘古香先生担任。现在国家衰弱，外交失败，瓜分谣言，震惊全国，危亡之祸，迫在目前。有志之士应当奋起挽救危亡，责无旁贷。但是必须有所准备，要有充分新旧的学识及强健的体力，才能负起责任，发奋图强，愿与各位共勉之。”成立后，先生每日依时到会与会员讲解一切，蔼然可亲，获益匪浅。参加学会的有：冯仁川、梁伯贞、张振民、覃子霖、周月卿、王干廷等。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柳郡中学堂成立，会员多投考中学或赴桂林投考师范、法政、及陆军小学等学校。为期半年的求是学会遂告结束。后来先生充任马邑两等小学校长。一九〇七年（光绪卅三年）广西提学使李翰葵（主张维新）来柳调查学务，认为先生担任马邑两等小学校长，热心教管，成绩优良，嘉许备至。一九〇八年（光绪卅四年），升调先生为桂林模范两等小学校长并兼督学任务。先生奉命于六月携一随从赴桂，住西门平章庙内，晋谒李学使，准备接事，因来时沿途感受暑热，发热致病，卧床不起。病十余日，医治无效，溘然逝世。李学使得知极为叹惜，即派人料理丧事，安葬于南门外黑山脚一带。当时张振民在桂林农业学校，去看过先生的病。在广西陆军小学肄业的柳州学生，全体去看先生殓殓。先生享年四十二岁，无子，有二女，有妻妾，老亲尚在，家

无储蓄。作针线度日。先生在时与一班同志刘古香、邓先舫、黄寿伯、朱善卿先生等锐意维新，未成其志，不幸中途凋谢。迨辛亥时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先生的学生有严秋田、郑兰生、张壮生、杨蓬倡等多人参加革命前线，参加同盟会者有柯銮臣、他们尚能不负先生之教。

1964、12、8记

回忆邓子恢先生

刘克初遗稿

马邑两等小学系在光绪三十二年春开办。首任校长系覃超（字哲民）先生。兼教全校《算术》，《地理》、《历史》，教员系朱奇元（善卿）先生；体操教员系刘古香先生；音乐图画教员系龙伦甫先生，经学教员系钟献廷（他是刘古香先生的老师）、杨玉成先生。

第二年，（即光绪三十三年）覃哲民先生去桂林入广西法政学堂，校长职务由邓子恢先生接充。后来又由朱奇元接充。光绪三十四年夏，邓子恢先生调充省督学去各县视察学务，因天气炎热感暑，回到桂林数日病重死去。他是住在桂林广西全省教育会内，死时柳州在广西陆军小学肄业全体学生（一、二、三期）都去看他，面色与生时没多大变化。光绪三十三年冬，我与黄梦年去考广西陆军小学系由邓子恢先生送去的，至今我还感激他。”

（录自刘克初1962年给陈显扬的亲笔信）

编者按：张文谓邓于光绪34年升调为桂林模范两等小学校校长并兼督学，原准备接事，因赴任时沿途受暑致病，到桂十余天死去。

而刘文谓邓于光绪34年调充省督学去各县视察学务，因天气炎热得病，回到桂林死去。叙事互有出入，特将二稿并存。

清末的两张学业文凭

——谈柳高“始祖”名称

刘明文 1984.11.5

于中共柳州市委党史办

我们在研究考证大革命时期柳州市地下党支部成立的时间和地点这一问题时，接触到柳州高中的历史，因为地下党支部最先在这个学校诞生的。但是柳高的“始祖”叫什么名称呢？在无文献、档案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唯一的根据是老人们的回忆材料，初步定为“柳郡中学堂”。有的人对此称呼表示赞同，也有人表示反对，孰是孰非，定不下来，遂成悬案。

这个悬案在今年五月间获得圆满解决。柳高“始祖”的正式名称是“柳州府中学堂”，行文时称为“柳州府官立中学堂。”有何为证？有！象州县档案馆保存的一张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十二月的修业文凭（即学年成绩证书）和一张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二月的毕业文凭即是证据。这两张文凭的主人是该校丙班文科学生、象州人李登超。文凭上明确无误地盖有“柳州府中学堂关防”和“广西提学使司之印”（相当于今教育厅）的大红印章，还有“广西柳州府官

立中学堂”的行文字样。明明是叫做柳州府中学堂，为什么有些老人都叫它做柳郡中学堂呢？原来是民族意识在起作用。我国从秦、汉朝起行政区域实行郡县制度。柳州在历史上先后属于桂林郡、郁林郡、马平郡、始安郡、龙城郡的治所，到了清代才改为柳州府。人们出于民族意识和历史习惯，爱把府称为郡，所以叫柳郡中学堂。

这两张文凭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学校名称的重要证据，而且还给若干历史事实供给了重要的史据。在相当人民日报一个版面大的、四周围有八条五爪金龙图案的毕业文凭上，有一半篇幅是光绪皇帝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奉慈禧太后之命，给“管学各衙门暨大小各学堂”镇压学生运动的谕旨。这个谕旨显然是针对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余名上“万言书”，要求拒绝中日合约，迁都抗战，变法维新之举，以及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政变为口实，对教育知识界出现的“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等爱国和维新的行动，扣以“离经叛道”和“犯上作乱”等大罪名。重申学堂师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聚众，立会演说，”否则，予以“严惩”，“绝不姑宽”。这个资料反映了戊戌政变失败后，光绪被囚禁，慈禧独裁专政，严厉镇压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史实。从这两张文凭上面，人们还可以看到康、梁变法维新尽管失败，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科举制度终被抛弃，向西方学习科技之门已经打开这一事实。这两张文凭上记载该校设有修身、经学、国文、英文、历史、地理、

算术、格致、图画、体操等科目的成绩表。这些学科体现了康、梁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维新思想，是与慈禧的“懿旨”相违的，慈禧不是痛斥维新派“悖弃圣教，擅改课程”么？

柳州府象州人李登超的两张文凭，据说是在解放后的一次政治运动中收缴的。李登超领毕业文凭时是十八岁，如果还活着的话，该是九十一岁了。从文凭上可以得知李登超是个“旁门左道”的高材生，毕业时他的经学和国文仅得65分，而英文、算术、地理、图画都在八十分以上。也许他还是体坛上的竞技能手，年考和毕业考的体操分数都是100分。今年五月，象州县党史办的巫玉堂同志在该档案馆发现了这两张文凭，并借出来给我们考证，至此，柳高“始祖”的真名才大白于天下。

附抄：清末的一张毕业文凭

清末一张毕业文凭（原文）

（原件48/58）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

上谕朕钦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创设各等学堂节经谕令学务大臣等详拟章程奏经核定降旨颁行奖励之途甚优董戒之法亦甚备如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畔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原期海内人士束身规矩造就成材所以勸望之者甚厚乃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强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议以致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不独中国前史本朝法制无此学风即各国学堂亦无此等恶习士为四民之首士风如此则民俗之敝随之治理将不可问欲挽颓风非大整饬不可著学部通行京外有关学部各衙门将学堂管理禁令定章广为刊布严切申明并将考核劝戒办法前章有未备者补行增订责令实力奉行顺天府尹各省督抚及提学使皆有教士之责乃往往任其恣越违道干誉貌似姑息见好实系戕贼人才即如近来京外各学堂纠众生事发电妄言者纷

纷皆是然亦有数省学堂从不出位妄为者是教法之善否即为士习之优劣所由判辨有明徵嗣后该府尹督抚提学使务须于各学堂监督提调堂长监学教员等慎选器使督飭妥办总之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理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较若其始敢为离经畔道之论其究必终为犯上作乱之人盖艺能不优可以补习智识不广可以观摩惟此根本一差则无从挽救故不率教必予屏除以免败群之累违法律必加惩儆以防履霜之渐并著学部随时选派视学官分往各处认真考察如有废弃读经讲经功课荒弃国文不习而教员不问者品行不端不安本分而管理员不加惩革者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倘该府尹督抚提学使等仍敢漫不轻心视学务士习为缓图一味徇情畏事以致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除查明该学堂教员管理员严惩外恐该府尹督抚提学使及管学之将军都统等均不能当此重咎也其各属遵奉行俾令各学堂敦品励学化行俗善贤才众多以副朝廷造士安民之至意此旨即著管学各衙门暨大小各学堂一体恭录一通悬挂堂上凡各学堂毕业文凭均将此旨刊录于前俾昭法守钦此

广西柳州府官立中学堂

给发毕业文凭事照得本学堂学生李登超业将中学文科功课肄习

完毕计得毕业分数捌拾贰分参壹列入最优等除恭录

谕旨应各敬谨遵守外相应给发毕业文凭须至文凭者

学科 教员

毕业考

学科

教员

毕业考

学科

教员

毕业考

试分数

试分数

试分数

(蓋章)

(蓋章)

(蓋章)

修身 何其鑑 柒柒伍

历史 于体乾 柒〇

国画 唐虞开 玖貳

经学 朱奇元 陆伍

地理 于体乾 玖捌

体操 唐虞治 壹〇〇

国文 唐貽谷 陆伍

算术 罗云章 捌陆

英文 马其芬 捌玖

格致 罗云章 捌肆

毕业考试总平均分数捌拾貳分陆伍

历期历年考试总平均分数捌拾壹分玖柒 实得毕业分数捌拾貳分叁壹

本学生现年十八岁系象州人

曾祖洲 祖父 父春标

右给中学文科学生李登超

监 督曹綬章(印章)

宣统

三年

二月十五日给

(篆) 广西提学使司之印

中字第 四 号

龙城中学的战斗历程

高天骥

龙中原是私立，解放后改为市立。她在解放前的历史，是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地方上一小撮土豪劣绅作斗争的历史。兹值龙中校庆49年之际，特回忆她的战斗历史记录下来，以期继承和发扬龙中的光荣传统，在党的领导下，把学校办得更加完善美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人才作出更多的新贡献。

一、官家不办百姓办

三十年代的广西，教育事业奄奄一息。偌大一个柳州地区，仅有一所省立第四中学（后改称省立柳州中学。即柳高前身）。每学期只招收学生一百名，对柳州及附近二十多县每学期千多名高小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来说，实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当年虽有人为失学青年开设一些升中补习班（学社），但仅为临时补救办法。数年之间，失学青年多至好几千人。

我们柳州地方父老和教育界有识之士，对青少年失学问题颇感忧虑，于是我们向社会呼吁：官家不要教育，我们老百姓要教育，中华民族子孙后代不能没有文化，“官家不办

百姓办”！由于这一倡议，顺应人心，立时获得很多人的赞助。为此，地方人士几经商议，由发起人周书、龙月卿、龙孝坚、龙伦甫、钟善初、曾全盛、高伯伦、高天骥、余智宏（时为探智升中补习学社负责人）、钟毓文等二、三十人开会，推举天骥赴南宁，向教育厅申请在柳州办私立中学一所，可是反动当局对此合理要求，态度冷漠，置之不理。然而，这不仅挫折不了柳州地方父老与群众办学的决心，反而激起了大家的义愤。民众办学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当时学校开办费无着，即由天骥从家中拿出一千元应支。

在群众支持和帮助下，柳州私立龙城初级中学的筹备工作，终在短期内就绪，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下旬，租赁文武街民房一栋为临时校舍，招收学生三百人，编成五班，于十月十五日正式开学上课。校董会由发起人选举产生。选举结果，周书、龙伦甫、庞枚宸、~~周~~钟毓轩、唐培初、曾全盛、张任民、覃连芳、黄萝年、刘克初、高伯伦、龙月卿、龙孝坚、高天骥、余智宏等十五人为校董，共同组成龙中第一届校董会，并推周书为董事长兼名誉校长。校董会还任命天骥为教导主任，代行校长职务。余智宏为事务主任，聘请石宝怀、罗觉、陈平、梁德光（女）等十余人为各科专任教师。从而部份地解除了柳州及附近县份青少年失学的痛苦，受到地方父老和学生家长的赞许；然而，也触怒了反动当局和引起土豪劣绅的嫉忌，埋下了对龙中仇恨的种子。

二、初创时期的甘苦

龙中开办之初，因陋就简，物质条件欠缺，教学力量薄

弱，学校在社会上还没有什么地位，有些人对我们能否把这所学校办好，存有怀疑，甚至有个别人借办学为名，进入龙中的学校组织，图谋私利，而闹事，制造分裂，幸而大多数校董团结一致，迅速改组校董会和学校行政组织，加强了组织的纯洁性，才未酿成严重损失。改组后的二届校董会的当选者为廖磊、周书、张任民、黄梦年、覃连芳、吴耀、唐培初、龙伦甫、钟善初、曾全盛、高伯伦、庞晋、龙月卿、龙孝坚、高天骥等十五人。但龙中仍处在潜伏的危险包围之中。危险既来自反动当局对学校外来年轻教师的怀疑与不信任，又来自校董会内部，军阀覃连芳为首的地方集团的破坏和捣乱，他们人数虽少而能量颇大。

为了解除反动派当局对龙中的疑虑与戒备和钳制覃连芳等人的破坏活动。校董会中有正义感的多数成员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商议决定利用军阀内部矛盾来办学校。校董会决定聘请时为柳州最高当局新桂系第七军军长廖磊担任董事长。因为廖磊一向在外省做官，刚回广西不久，人望未孚。加之他手下还有一个桀骜不驯，骄横跋扈的师长覃连芳。廖磊素感“强龙难斗地头蛇”之苦总想在地方上施些小惠，收买人心，以提高他个人的威望和巩固他的地位。原以周书（周麟生）为首的校董会乃投廖磊之所好，借用他的地位和声望，来消除反动派当局对龙中的怀疑，而抵制覃连芳等人的捣乱，利于龙中的发展。果然，廖磊对聘请他当董事长一事正中下怀，爽快地答应了。

廖磊应聘后，即接长龙中校董会和兼任名誉校长。周书退为副董事长，天骥仍任教导主任并兼管学校日常工作。从

此，廖为了发展个人的势力和提高自己的威望，不但在客观上确实为龙中起了某种保护作用，并在经费、校舍、设备等方面也运用他的影响，对龙中做了一些好事。使龙中在1935年11月至1937年9月止，不到两年时间，位于湾塘路的龙中新校舍全部落成，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学校领导和进步的教职员工以及广大学生，却能保持清醒头脑，并没有因为反动人物当董事长和名誉校长，而受他的反动思想影响。相反，师生们巧妙地应付廖磊派进龙中当军训大队副的监视，由有关进步人士介绍聘请了思想进步，作风正派，教学能力强，热心教育事业的教师来校任教。著名的优秀数学教师谢畅如以及武汉大学毕业生彭荣仁先生等，就是这个时期到学校来任课的。接着在1938年—41年间，学校又聘陈雄子、刘准、韦立仁（中共党员），莫易平（即杨烈）、刘燕如等人来校任教。大大地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培养了学校的优良学风。出于廖磊意料之外，龙中后来竟成为他们鼻子下的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全面侵略。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1938年10月，柳州文化界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保卫大西南号召，组织了柳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一开始龙中师生就是“文协”的积极支持者与参加者。“文协”理事长初为西大农学院乐嗣炳教授，1939年春由乐教授推荐由天骥担任，而陈雄子同志仍主持“文协”的宣传部工作。龙中师生更成了“文协”的中坚。师生们在教学之余积极参加“文

协”的抗日救亡歌咏和话剧团的宣传活动，到街头、电影院、戏院演唱。在沉寂的柳州古城，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在反“汪”（汪精卫）运动中，曾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不屈的斗争。

当时“文协”筹资创办了一个“救亡剧场”，聘请了一位从上海来的戏剧工作者姚岳（即姚平），专职主持“剧场”的演出工作。其生活费由龙中资助。1939年春“剧场”接待了从抗日前线撤退来的三个文艺团体，即：“上海八一三救亡歌咏队”，福建省“黄花岗儿童剧团”、广州“兰白”儿童剧团。此外还由龙中师生组织了一个救亡剧团。不时在“剧场”演出。记得龙中师生还曾与上述的文艺团体合作演出过一个大型话剧《塞上风云》，历时三日、夜，共六场。观众场场满座；又独自公演了《魔窟》等独幕话剧。当时剧场的任务主要是宣传抗日救亡，票价不能收得过高，一切开支，包括外来三个文艺团体的团员五十个人的伙食等，单靠剧场门票收入是不够的，结果，三个多月就亏损了三千多元，报销无门，只好由天骥个人担负起来。

1939年5月，龙中全校师生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巡回宣传工作组，历时一周，行程百数里，到拉堡、成团、洛满、新圩等乡镇，除在圩场演出戏剧及其他文艺节目外，还组织小分队、深入群众，以歌咏、山歌、墙报、家庭访问等形式宣传抗日和慰问抗日战士家属。购买慰问品的费用都是由龙中师生自动捐献的。平日龙中师生还时常在校内举办以抗日为内容的壁报、话剧、歌咏等班际比赛，以激发广大师生们的爱国热情。

1939年7月15日，日寇对柳州市区首次疯狂轰炸，不少街巷成了废墟，群众伤亡枕籍，龙中校舍亦遭轰炸，损失颇重。师生们在警报解除后，回到学校，目睹一片瓦砾的情景，悲愤异常。但龙中师生不只以自己学校校舍的善后工作为虑，而是立刻自动自觉地组织起来，走向柳侯公园、及学校附近灾区，来回用临时自制的担架，运送受了重伤的群众到医院抢救。当时龙中师生这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群众的行为，深得社会人士的赞扬。

龙中由于校舍被炸毁，而市区空袭警报又频繁，被迫疏散到柳市郊区鹧鸪江搭起茅草校舍继续上课。以后几次迁校，备尝了由于日寇侵略致民族遭受灾难带来的艰辛。

龙中师生在1937年至1939年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所作的一系列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对于激发柳州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坚定抗日胜利信心起了积极作用。这样，反动当局和劣绅、官吏散布流言蜚语，不仅仇视龙中，而且伺机对龙中进行打击和破坏。

这个机会终于给他们盼来了。1937年当廖磊调往安徽任省主席，并在1939年死于任所之后，这批反对龙中和与廖磊个人有矛盾的人，便有待无恐地对龙中进行报复和破坏。他们利用国民党对私人办学的限制政策，在龙中的立案问题，多方挑剔与阻挠，以龙中缺少“足够的基金”为口实，不批准立案，妄图置龙中于非法地位，而予解散。为了粉碎反动分子的阴谋，在校董会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各尽自己的力量，为龙中筹集基金。天骥作为一个住校校董兼校长，理所当然要和师生及校董们采取积极行动，为募集学校

基金而努力，于是耐心地动员母亲将价值银币三万余元的房地产共十一所，捐给龙中，补足了龙中基金不足之数。终于使龙中立即获得“备案”的批准，并为不久后获准“立案”创造了条件。

三、多灾多难的四年

随着日寇对我国的侵略日益深入，龙中师生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抗日热忱，逐浪高涨，教学之余，不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而且学校还支持学生踊跃参加有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抗日学生军；支持和资助陶奈夫等三位同学秘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

由于1939年七月十五日，日机空袭，龙中遭到轰炸。龙中被迫迁至鹧鸪江。不久，全校师生不幸传染了疟疾，加之战局日趋恶化，日寇从广东沿海登陆，占领了南宁，柳市人心惶惶，龙中不少教师离校，仅天骥和教导主任邓贻泽，以及年届古稀的朱奇元语文教师老先生等十人坚持着七个班的教学。后来，由于日寇自动撤退，战局稍定。学校情况稍有好转。然而一波刚平，二波又起。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间的一天，柳江县政府下命令征用龙中校舍为军需仓库，声言“要即日空出所有学校棚舍备用，否则以破坏抗战论处。”面对反动当局的无理要求，全校师生团结一致，有理有节地与反动政府进行说理斗争，驳得他们理屈词穷，只好收回命令。但人祸刚除，天灾又到：一九四〇年下半年，龙中不幸遭遇两次火灾，茅棚草舍，荡然无存，逼得龙中只好冒着天空袭、搬回城里的老校舍上课。然而，校舍却已被国民党

的一七三后方医院占用。屡经交涉收还，均无效。于是一场严重的护校斗争又降临到龙中头上了！

四、百折不挠的护校斗争

为了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夺回校舍，校董会发动校友、学生家长与在校师生献计献策。1940年冬某晚，校友代表们和全体师生，在火灾中幸存的草棚礼堂举行紧急的护校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成立护校委员会，和收回校舍后援会，领导这场运动的斗争。前者以学生自治会主席梧裕茂等人为骨干组成，后者以学生家长中的知名人士为骨干组成。这两个护校组织，都在校长和护校坚决的教师陈雄子等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护校代表分别向专员公署和警备司令部和伤兵管理处、参议会、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等机关交涉，但是他们互相推诿，甚至拒绝交还校舍，更有甚者竟有人造谣诽谤龙中，不支持抗日，不热爱为抗日流血的伤兵，想让伤兵迁到乡下受苦……挑拨伤兵仇恨龙中，以制造冲突。

为了粉碎造谣者的阴谋，龙中学治会派出学生慰问团，分为二十个小组，共百多男女学生深入173后方医院，为伤兵们理发，洗衣服、缝补衣服，赠送鞋、袜、毛巾等慰劳品，表演抗战歌曲，积极向伤兵们作好龙中收回校舍的解释工作，以取得伤兵们的谅解和同情。接着，护委会组织请愿示威游行，把护校斗争扩大到社会，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援。学生的游行队伍秩序井然，高唱龙中校歌走上街头，并且停留在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门前请愿，强调要求他们归还龙中的校舍。这一着，公开揭露了反动派摧残地方教育

的丑恶嘴脸，震动了柳州整个社会。致使敌人理屈词穷和恼怒不已，竟拒绝了学生的合理请愿的要求。

学校负责人理应站在护校斗争的第一线。天骥便以龙中校长名义亲自闯入第四战区司令部定期召开的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即席诉说龙中校舍被无理霸占的情况，提出收回校舍是龙中一个迫切和合理的要求。并呼吁各机关当局对学生的护校正义行为，给予大力支持和援助。说罢，立即退席。这个突然袭击使得会议主持者及有关官长非常被动狼狈不堪。

反动当局用拖的战术对付龙中，龙中则用坚韧的战斗来回敬敌人。校董会决定按计划坚持开学招生，即使反动当局不归还校舍，准备在大街上露天上课。以校长的家作办公地方，借用电影院、剧院、机关礼堂为课堂，甚至还公开在闹市区的十字路口（今五角星处）警察岗位附近上课。这样一来，获得了学生家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社会舆论纷纷谴责反动当局摧残地方教育的罪行。国民党柳州专区专员尹某气急败坏地向他的主子CC中统特务陆树珊汇报，欲对龙中及其负责人加上“赤化”的罪名，予以处置。但他终于抓不到任何把柄，阴谋不能得逞。

由于龙中师生的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加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声援，迫使国民党当局感到众怒难犯，终于被迫交还了校舍。护校斗争取得了胜利。通过护校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师生、校友、家长空前团结，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热爱母校、尊师爱生的优良校风进一步培养起来了。

五、龙中易长的变故

当反动派被迫交还龙中校舍之后不久，1941年的夏天，柳州专员尹某指使他的爪牙放风，说：专员认为高天骥当龙中校长是不适宜的，最好是叫他自动辞职，避开为好”。这是统治着柳州的顽固分子，威逼该校负责人的公开信号。天骥为了坚持办好龙中，对反动派的威胁和警告置之不理，当时，天骥并不是尹某想像中的“赤化”分子，只不过被看作反对国民党当局那种极端蔑视人民的权利，毫不爱惜地方教育事业的官僚法西斯独裁作风的一个普通的爱国、坚持抗日的年轻教师而已。即使这样，也要受到迫害。

1942年上学期，专员尹某见天骥不肯屈从他的意旨，驯服地离开龙中领导岗位，于是他再次玩弄阴谋诡计，通过钻入学校当教师的内奸，中国青年党分子沈某，在校内制造分裂，破坏教师之间的团结，削弱学校与反动派对抗的力量。天骥为了顾全大局，免使学校遭到更大的损失和破坏，忍痛辞职。

当我离开龙中领导岗位以后，校董会委派另一位校董、地方知名人士陈如平当校长。陈校长社会工作经验丰富，人缘好，善于应付各种事变，和专员尹某没有发生过矛盾。因此缓和了反动当局与龙中的尖锐矛盾，从而保住了龙中的安全，使学校和各项抗日活动得以正常开展。

天骥虽然不当校长了，仍然以常务校董名义支持学校工作。1942年秋，天骥与部分校董、校友积极筹建了龙中高中部校舍。

六、迎着苦难向前进

1942年7月9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在桂林捕杀地下党广西省委负责人苏曼等三位同志继而便在广西各地搜捕杀害地下党员，这就是“七·九”事件。柳州的反动派也挥起了屠刀向革命分子动手了。地下党为了保护同志们安全，陆续把那些较暴露的同志转移到农村。当时，龙中第30班的导师（今称班主任）莫易平（即杨烈）和韦立仁老师奉地下党的指示，先后撤离学校。这两位老师是教学骨干，是宣传革命思想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深受学生的敬爱。由于进步教师的被迫撤离，使学校的教学力量和革命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这固然给了新校长陈如平一个打击。但是陈校长也利用新学期调整教师的机会，趁势把反动派打入龙中的坏家伙予以解聘。同时还聘请了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到龙中作教师，有些分别担任行政、教学领导和班导师，他们是：黄福祥、覃景秀、张震道、文注纲（即黄英）、沈枫、马伟（这二人是地下党员）方宏誉、王明初、徐惠观等。这些老师在教学、生活、思想作风上，都能起到表率作用。从此学校有了新的转机，教学质量大为提高，龙中又一次获得了地方人士新的好评。

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董事会研究决定于1940年冬，积极办理龙中立案未了手续，在已有基础上补充筹集资金、扩建校舍，增办高中部。校董会和许多校友纷纷为发展龙中而踊跃捐输。过去对龙中存有不同看法的人，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

因而龙中意外地得到两笔“横财”，一笔是法币二十万元（约值三千元银币），由柳江县参议会咨请柳江县府，用屠宰税拨给的；另一笔是柳州西门外的十所房屋地产，由裕国赌博公司代理人廖胡慧、覃连芳二人代表公司赠送。龙中有了钱，终于1943年建成了高中部校舍一座，招收高中学生两班。这时全校高初中共有14个班，约七百名学生、教职工五十多人。至此，龙中的规模，教学质量可与省立柳中较短长，至于学校的校风与声誉更是遐迩闻名。

1943年春，国民党继“七·九”事件，又发动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了“一·一五”事件，广西地下党再遭一次破坏，不少同志被捕牺牲。在龙中任教的一位地下党员，另一些进步教师被特务监视或警告。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搞的人心惶惶，但在学校领导和进步力量的沉着应付下，师生们能安定了下来。

七、沦陷时期的龙中

一九四四年夏，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前线，节节败退，衡阳失守，日寇大举入侵广西，逼近桂林、柳州。柳州城南居民紧急疏散，国民党军政机关，文武官吏，以及绅商巨贾，纷纷争夺交通工具，抢先逃命。

龙中为了保护师生安全及学校财物，**周显**、**查林**校长如平主持下，商讨迁至山区，坚持办学的问题。经进步教师**张震道**、**沈枫**、**陈柏芳**（女）、**郑愚**、**马伟**（以上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一些熟悉山区情况的校友建议，迁校到桂西北罗城县龙岸乡，以便利用该地地理及人缘的良好环境，扎下根

来，相机发动，组织群众，建立敌后游击区，对敌进行游击战争。原已离校的各届毕业生闻讯，有些回校表示愿意参加共同行动。是年九月，龙中校长陈如平遂率领教职工、学生百余人及部分家属（包括天骥的一家老小）迁至龙岸乡，借当地何家祠堂为校址，招收新生一班，继续上课。在困难中，随龙中到龙岸的除上述进步教师外，还有港澳同胞教师翁文甫、马国帆、梁务柱、刘统圣等四人。另开学前刚到龙中的廖冰（女）和龙中原任教师覃景秀、职员罗月洲等。天骥当时虽为龙中校董但因故未参加迁校行动。正当开学之际，柳州宣告沦陷。十一月中旬，日寇南犯，罗城县失守，周围的宜山、融县、长安镇，都沦于敌寇，龙岸岌岌可危，龙中为保全计，于十二月初撤退到龙岸乡唐玉村。此时因形势险恶，新招学生纷纷随家长疏散回附近村庄，剩下部分学生，教职工及家属，跟随学校艰苦与共地生活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之交几乎全境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龙中为了深入农村建立对敌根据地作好准备，分散一些体弱的男女教师到各村乡开办小学和识字班，籍以调查了解农村情况，联系和发动群众。部份教职工及学生留下，积极作军事训练和战斗准备。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为了利用合法地位，建立抗敌根据地，上述教师主张陈如平校长，接受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桂北行署命令，到柳城古寨组织县政府，并任该县县长。其实国民党在各地的党官均已逃跑一空的情况下，不得不委派陈如平校长，当此空头县长，而龙中进步教师代表则利用古寨柳城县政府为龙中前方阵地，以前方保证后方，使龙中在龙岸能继续立足下去，要利用柳城合法地位

在柳城地方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开展游击战争，故由一些年壮力强，身无牵挂的教师，如：张震道、马伟（以上中共党员）覃景秀随陈校长去柳城古寨组织县政府；另由一部份身体不好而有家累的教师坚持龙岸继续办理龙中，校长仍由陈如平兼任，但委王明初代理学校日常工作。在柳城一次战斗中，龙中教教员卢波同志（中共党员）英勇牺牲。

八、在废墟中重建龙中

1945年7月下旬，龙中从罗城迁回柳州。当时陈如平校长仍在柳城县长任上，校董会再次决定任命天骥为龙中校长。临行时，陈在经济困难中交给天骥伪币10万元终于回到柳州。入校之日天骥与教导主任王明初等十多位教职工和校友，环行全校一周。放眼望去，断壁颓垣，瓦砾蒿莱，比比皆是，更有人尸兽骸触目惊心。看到母校被日寇烧杀蹂躏的悲惨情景，更激起我们对日寇执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和蔑视。

龙中的重建恢复工作是在废墟上开始的。校长、师生校友自动回校义务劳动。共同斩草除荆，清理瓦砾，填平弹坑，刷墙涂壁，修葺校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真是“群力拾柴火焰高，依靠群众有办法。”惨淡经营了一个多月，开学的准备工作终于就绪。四月初共有新旧学生二百多人，编为五个班，正式开学上课，这是龙中师生艰苦奋斗结成的硕果，是大家用血汗换来的胜利。我有感于此，写了律诗一首，以表所怀。

诗曰：

暴雨初晴流未清 沉宵突破已黎明
颓垣触目燕堂毁 蔓地绿蒿黄舍倾
荡荡滔滔嗟柳水 殷殷切切建龙城
金钱十万注终何用 无限师生共济心

注1. 名誉校长廖磊字燕农礼堂当时题名为燕堂

2. 前页文中说：“陈校长在经济困难中交给天骥伪币10万元，终于回到柳州。”

在那劫后余生，百废待兴的日子里，国民党反动派拂逆全国人民渴望民主自由和平建设的愿望对经过日寇侵略弄得遍体鳞伤的祖国，他们却到处劫取民财抢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他们根本不顾人民死活，不理不采地方教育事业。龙中虽处在经济困难的时期，但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从来不抱幻想。我们依靠的是全校师生和热爱母校的校友们的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战胜困难。龙中开展伪币二千元（约值银币三角）募捐运动，”广大师生、校友、家长纷纷解囊捐献。同时，天骥也下定了经济突围的决心，用个人房产作抵押，与商人合伙，承包了省府电杆木一批。将所赚得的钱买来廉价木材一千五百根，解决了重建校舍及床铺，课桌椅全套设备等难题。保证了八个班在教学上和生活中的需要，1947

年春，因国民党币值又大贬，学校经费更陷入困境，迫得投标柳江县府公开投标浮桥，望得赢余补助。当时此工作由学校生产处主任周季康（即解放后百色副专员姚勉光同志）负责。但不久，周的政治面貌被中统特务驻柳头目徐来发现，迫得离柳，浮桥工作乃由天骥暂管。同年8月，一夜洪水爆发，天骥得讯赶到桥上指挥抢险，拆卸桥板与桥船。由于水势越来越猛，上游冲散木排风卷而至，此时天骥正在浮桥中段，所站桥船便被冲击与其它桥船离散，天骥与此桥船只身被洪水冲走，直到第二早晨至武宣峡口勒马才得脱险靠岸登陆，乘另一机船安全返柳。由于及时抢救，浮桥损失虽不大，但学校希望得到资助，成为泡影。可幸早在1946年夏，龙中开始有了中共党的组织——特别支部。当时支书是陈光同志（后调桂林市城工委任书记工作，解放前夕在桂林牺牲。）宣传委员是梁华新同志（后调忻城中学工作，因暴露被敌特发现他在忻中，即令忻城县县长陈如平同志，在忻中逮捕他，陈趁回柳专署述职机会秘密告诉我从速通知梁他去。我叫梁在龙中时挚友欧阳汉同志，通过党组织令梁离忻。陈如平回住所时，梁已他去了，这时陈才带人去忻中抓他，拿不着，即报梁已在逃了事。陈因此事终被伪专署怀疑，不数月即被免职。）组织委员侯信同志（后在柳北游击战争中牺牲了。）

由于有了地方党的领导，龙中走上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九、龙中有了主心骨

自从柳州地方党特支在龙中成立之后，直到一九四九年

九月学校被反动派解散前，这段期间，龙中的地下党组织和外围群众组织，日益发展壮大。一九四七年特支撤出龙中，柳州地下党仍派有联络员负责领导龙中的地下组织。据了解，解放战争时期，曾在龙中工作过的地下党员教职工，有陈扬（陈光），梁华新、侯信、丘行、周季康（即姚勉光）、黄莎、黄青、吕维多（女）、方宏誉、沈枫、陈柏芳（女）、沈章平、邓莹（女）王萃新（即马伟）、毛恣观、罗杰林、唐美贞（女）、曾景（即曾少庆）、罗月洲、梁仕臣（工人）、马肇清、胡敬之、王少白、陈乃麟、梁锡吟、莫家聪、陆显才等。还有进步教师曾诚、王明初、卢宝森、黎达愚、李立民、赖德昭、陈雄子、邓崇武、梁琴、欧阳汉、孙平、覃景秀、陈如平等同志（此外可能还遗漏一些同志）。上述这些同志是龙中的领导、教学骨干力量。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我们推行民主教育，坚决站在进步力量的一边，坚持进步，反对落后，决心地把龙中办成白色恐怖中的红色天地。

龙中图书馆最受师生欢迎，因为里面有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李有才板话》、《洋铁桶的故事》、《八月的乡村》、《新儿女英雄传》。还有通俗理论书籍：《大众哲学》等……。还有大批高尔基及其他苏联小说。还有鲁迅、茅盾的著作。还有香港运来的进步报刊，甚至《新华日报》也在这里出现。师生们如饥似渴地在这里接受革命思想，呼吸新鲜空气。图书馆也是地下党印刷革命传单的掩蔽所，许多无声“炸弹”是从这里投出去的。当时梁仕臣同志是图书馆的唯一的工人（地下党员），那里的事情是经他的手干的。

在课堂上，用的是国民党出版的教科书，老师讲的却是

革命的道理。例如丘行老师讲严复的《缺陷论》时用毛主席的《矛盾论》的观点来评论严复的著作。有的老师在讲岳飞的《满江红》时，就影射蒋介石为当代的秦桧。

在礼堂，以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为骨干组成学生自治会，经常在这里举行歌咏、戏剧、演讲比赛、读书报告会、时事报告会、民主辩论会等活动。发出要民主、要自由、反内战、反饥饿的战斗呼声。在教室之间的走廊里，各班出版了琳琅满目的墙报，师生们称这里为民主墙，反动派则咒骂它为“共匪”墙。

在球场上，各种田径、球类运动有计划地开展比赛，学生们生龙活虎地锻炼身体。闻名柳州体坛的“鱼雷”篮球队，就是龙中学生的球队。每年还分别举行一次男女越野赛跑。连续二、三年获得女子三千公尺越野跑冠军的就是龙中廖淑彦同学。

龙中既实行民主教育，又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大部分学生在校食宿，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奇装异服和黄色歌曲在那里没有市场。学校的奖惩严明，做好事的受到表扬，记优点、记功；做坏事的受批评记缺点、记过。每周一次民主检讨会，同学与老师之间，互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生还定期举行评教评学活动，帮助老师改进教学方法。学生的互教共学活动开展得很活跃。各班的地下读书会秘密学习和讨论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十一周年纪念日，龙中的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奔流社成立。

学校行政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无论制订教务、教学计划、经济开支，人事任免，聘请和解聘教职工等方面，都要经过充分协商，讨论或由会议决定，个人不得独断专行。

在国民党反动派极端黑暗的统治下，柳州城的大街小巷，机关学校刷满了反共反人民的标语，唯独龙中“出污泥而不染”，学校墙壁贴的是民主标语和反饥饿、反内战的墙报，不仅如此，龙中还坚决拒绝了国民党、三青团进校来搞“党团员联合登记”粉碎了敌人妄图在龙中建立反动党团阴谋。全校师生还拒绝参加反动当局在市里举行的反共集会和游行，学校领导还购置了十三条枪，组织护校武装，以对抗反动派的突然袭击。

就这样，龙中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加上他们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损兵折将，屡吃败仗，气恼难休，因此对龙中的打击与迫害步步升级，诬指龙中为“包庇奸匪”的“巢穴”。暗中则造谣中伤，挑拨龙中与地方群众的关系，妄图孤立龙中；继则派遣特务冒充进步分子打入龙中，侦察师生言行，伺机破坏。设置在学校附近的警察派出所，派便衣特务日夜监视龙中，白色恐怖笼罩着学校。地下党为保护已经暴露的党员的安全，有计划让一批同志撤退转移，同时又从外地调换一批同志进来补充。注意总结斗争经验，讲究斗争策略，改进斗争方法，极力不让敌人抓住把柄。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百万雄师过了长江，国民党反动政府从南京逃到广州。这时柳州城挤满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桂系军阀妄想保住老巢，派出56军军长马拔萃坐镇柳州，组织土匪武装，开赌包烟，横征暴敛，实行宵禁，到处

抓兵拉夫，捕杀无辜，搞得柳州全城乌烟瘴气，民怨沸腾。龙中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坚强不屈，英勇斗争，学校不但没有后退，反而壮大发展，一九四八年夏又恢复了高中部，招生两个班。从此龙中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高初中共16个班（高中两个班、初中14个班）计八百多名学生的完全中学。另附设龙城小学（小学校址在今市进修学校内）有小学生三百多名。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纸币成为废纸，学校经费入不敷出，于是实行经费收支改以实物计算（大米）的方针，教职工生活有了保障，教学积极性普遍提高。随着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和需要，地下党在师生中积极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及群众组织的爱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广西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地下学联的成员，大大地壮大了革命力量，对敌斗争也更日益激烈尖锐起来。

十、给敌特的一记闷棍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龙中的地下工作者，不畏艰险，出动到城里散发地下党的革命传单，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劳苦大众的斗志。随着我们斗争胜利，敌人对龙中的防范和进攻更加紧了。五月十九日中午，地下党广西城工委书记陈枫同志突然接到情报：敌人要逮捕龙中的五个地下党员教师。陈枫同志立刻命令地下党方宏誉、毛志观、丘行、罗杰林、唐美贞于晚上主动转移外地，并指示由龙中学生自治会出面，发动寻师运动，以转不利为有利，给各派系特务制造矛盾；达到揭露敌人迫害和阴谋的目的。

五位地下党员教师在地下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抢在敌特下手之前，顺利地撤出龙中，转移到安全地带。五月二十日，龙中学生的“寻师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学治会担任领导工作的学生党员周民震、潘瑞才、明乐、周民霖、刘明文、刁蕴冰、温克勤等人，以及各班负责人共同组织了寻师委员会。寻委在全校师生动员大会，揭露了敌特迫害进步教师，造成教师失踪的罪行，发动全校师生、家长和社会进步人士，向反动派索回老师。广大学生为失去这五位进步老师而痛心疾首，更加深了对反动派的痛恨。寻委会一方面分头派人到国民党的《广西日报》刊登寻师启事，到大街上张贴寻师海报，到各机关学校去呼吁求援。另方面在校内开展捐款救济失踪老师家属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整个柳州震动很大，社会舆论同情学生，纷纷谴责反动派倒行逆施，柳州各学校的进步组织亦举行了声援集会，给予国民党反动当局以严重打击。据悉当时国民党专员为此暴跳如雷，痛斥专业特务是一些饭桶，说没有抓住共产党，反而被共产党打了一棒闷棍。

在寻师运动期间，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地下党与学校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由沈章平、李立民、胡敬之、曾景等同志共同负责组织，将前面所提到的护校的枪支发给地下党员和一些可靠分子，准备武装拒捕，潜渡柳江，奔赴柳北游击区。另外，派出校工中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在夜间站岗放哨，监视敌特的活动，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即关闭连接学校的街灯，鸣钟报警……

五月底，寻委会接到柳州地下党领导机关的指示：“寻师运动”既要敢于斗争，又要注意适可而止。既然我们的同

志已经安全转移到新的战斗岗位，同时揭露敌人迫害阴谋的目的已经达到，运动就可到此结束。

于是历时十天的龙中寻师运动胜利结束了。可是，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在加紧策划对龙中进行新的迫害。

十一、黎明前的战斗

寻师运动结束后，龙中的学生运动更加活跃，地下党、爱青会和地下学联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解放军已解放了湖南省北部地区，在柳州的敌人更加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龙中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的师生，响应地下党关于“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号召，纷纷走出课堂，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调查敌军驻地、兵员、武器装备、仓库物资情况，以及敌特动态，有的同学搞到国民党企事业单位的财产清册和人事档案。有的同志深入郊区组织群众。地下党员教师胡敬之在鸬鹚江和一个垦民，伏击敌特，缴获手枪两支。地下党为了粉碎敌人搞“八一反共大游行”的阴谋，便于七月二十八日发传单，号召人民群众拒绝参加，并拒绝使用银元券。许多同学参加了散发传单的活动。八月一日这天，没有一个龙中的师生参加反共游行。反动派原定搞的万人游行结果遇到各阶层人民的抵制。只有两三百名反动分子和伪军警人员参加，群众说：这是“城隍庙里唱戏，鬼看。”

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反动派仇恨龙中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住了，终于使出杀手锏，以省府《教人字第9155号俭代电》撤了高天骥龙中校长职务。地下党和校董会采取紧

急应变措施，又委派陈如平当校长。陈如平当时是华中剿共总司令部经济组织负责人，又曾任过国民党的县长。但反动当局那里知道陈如平和我们一样，早与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并且是党领导的“广西爱国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的重要成员，陈如平到任后，并没有屈从反动当局，他接受地下党的领导，积极筹备暑期后的开学工作。学校提前于八月二十五日开学上课。将原有十六个班减编为十二个班，并撤消了学校的分部，学生剩下六百入左右。教学一如既往，教学情绪与民主运动普遍高涨。

一九四九年九月，解放军进迫包括衡阳的湘西、湘南。广西解放已为期不远，反动派愈加疯狂地向革命力量进行反扑。继解散昆明师范学院之后，国民党广西省府竟于九月十四日的“994”次例会中，通过一项决定，以“龙城中学历年包庇匪党、策动不法活动，败坏校风，淆惑人心，破坏戡乱建国”为借口，解散龙中。十五日晨，柳州大小特务报纸、竞相以头条新闻刊登这一消息。

为了保护学校的生存，校领导召开大会，向全校师生宣布敌人扼杀龙中的罪行，号召师生们紧密团结起来，勇敢、机智、沉着地和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保卫学校和师生们的安全，在未见正式命令之前仍然坚持上课。接着校董事会派董事长王赞斌偕同陈如平校长到桂林与国民党省府交涉，要求他们收回解放龙中的决定，并为龙中的正当活动和表现进行辩解。以拖延时间，为学校应变作好准备，然而反动派当局一口咬定：高天骥、陈如平一伙是中共嫌疑分子，并说高等多年包庇“匪党”解散龙中已成定

案，不容更改。

九月十八日，国民党柳州专员公署果然来令，勒令龙中教员转校任职，学生转校读书，但转职转读必须有两名国民党校级军官或二名荐任文官担保，或者有五千元光洋资本的商店作保方可。地下党城工委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当天下午（“九、一八”）派地下党员曾景、黄维光、明乐三位同志于天黑时候，要我和他们一齐乘小舟，横渡柳江至窑埠，借宿于长期支持我党革命工作的黎达愚革命老人家住一宵翌日在曾景同志指引下潜居于当年厚生公司（官僚资本林场）一个与我党有关系的垦民点深山杂林中。稍后又在党的安排下转到雒容县丹竹乡，岩面山厂地下党员谢仲同志家。

陈如平校长于8月二十五日由桂林返抵龙中，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大会，宣布桂林一行的结果并决定为了保护全校师生人身安全，避免敌人进一步的迫害，学校只好暂时解散。陈校长悲愤的话音刚落，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龙中数百名师生愤激的感情，他们深恨反动派夺去他们朝夕依聚、苦乐与共的母校。他们以无限依恋母校的心情，无比悲壮的声调和如同要急切奔赴一次为保住最可爱、可贵、又值得为之牺牲一切的战场而高唱龙中“前进、前进、前进！”的校歌，满怀深情地，久久不忍离开母校。这是龙中当年被迫解放时，由一群久经团结战斗考验、情意相投，互相教育帮助、共同追求进步的龙中革命师生，所发出誓死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暴行的心声的最强音！

学校被反动派解散后，一部分地下工作者和留守学校的教职工，在地下党员沈章平老师为首的留校小组的领导下，

和反动派作了无畏的较量。勇敢地保护学校的铃印和重要档案材料。面对面地和国民党县参议会议长韦初开，及教育局长覃志作说理斗争。反动当局只好派武装强占校舍，强管校产。但留校小组仍坚守自己的岗位。大部分失了业的教职工和失了学的学生，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和抗议，宁可失业失学，也不愿接受反动当局歧视性的“甄别”、“审查”而就业、复学。

对于龙中的被解散，亲者痛，仇者快。柳州城的特务报纸，自龙中解散之日起，连续发表《树倒猢猻散》《擒贼先擒王》《龙中恶贯满盈》等社论和杂文，对龙中进行“围剿”其中以中统特务主办的《大华报》最为恶毒。散居在柳州的龙中师生无不气愤填膺，纷纷用革命行动来回击敌人的诬蔑，许多人积极参加了地下党为了迎接解放的准备活动，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到柳北、都宜忻、桂中等游击区，参加了游击队，拿起枪杆打敌人。他们相信，黑暗快要过去，曙光即将到来，龙中一定会随着柳州的解放而获得新生。

十二、一唱雄鸡天下白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炮声隆隆，解放军攻占柳州市区，敌人狼狈逃窜。。留守龙中的地下党员沈章平、曾公朗冒着危险，把一面自制五星红旗插上培新路一家的屋顶。解放军大部队入城后，由龙中学生组成的宣传队和其它单位的宣传队走上街头，共同欢呼龙城的解放。

柳州解放后，龙中师生纷纷自动回到学校。在党和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把恢复学校的工作筹备就绪了。十二月一日龙中正式复课，从此，龙中又掀开新的历史的一页。

复课后的龙中师生，积极参加了解放初期的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如民主改革，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运动，大批学生参军、参干。仅一九五零年的一次，龙中就给柳州市的党政群机关团体，输送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爱青会员，学生骨干分子六十多人。一九五一年又向军政干部学校，输送了四十多名学员。

当时天骥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因工作需要，奉地下党命组织柳州临时治安委员会与党代表沈章平共同担负起维持临时治安及大军南下追击敌人的支前工作，继而光荣地参加了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副市长）工作。沈章平同志担任了市文教局的领导职务。

一九五二年，全国进行公私中、小学的调整工作。龙中奉令在市文教局主持下与柳州中学、新华中学合并为一个规模较大的中学，由市文教局长沈章平同志任校长。一九五八年，龙中又从柳中分出来。一九六〇年又合并入柳中。一九六三年再次从柳中分出来并改为市第七中学。一九六四年市委和教育局批准恢复龙城中学的名称为：“柳州龙城中学”，以表彰发扬她在解放前光荣的革命的传统。在“文革”十年内乱中，龙中校名又被极“左”思潮当作“四旧”砸烂，改为红卫中学，后又复名为市第七中学。龙中作为解放前经我们党精心培养起来的一所具有多方面革命历史传统的中学，在十多年来的反复分合的过程中，元气大损，如要

恢复昔日的光辉面貌，非在市委的关怀下，健全领导班子，加强领导并给予她一些较好条件，目前在校的全体爱校师生和热爱母校的校友们的积极努力，通力合作，做出许多富有实效的工作不可。一九八一年九月市委认为龙城中学曾在各种困难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前进，并为国家培养不少人才，目前，她是一所有高初中二十一个班，教职工壹佰多名、学生壹仟贰佰多名的正规中学。为了使龙中能更好的继承和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上级再度批准了她恢复这个光辉的校名——龙城中学。我们坚信，龙城中学今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指引的正确路线，办理得更好，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培养人才做出自己的贡献。龙城中学校名的再度恢复，这是一件十分值得庆幸的事情，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工作，把她办成一间无愧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朝气蓬勃的学校，才不辜负党和人民对她的期望。

柳江国民中学的沿革

董威熙

一、筹建国中的时代背景

1929年，新桂系李、黄、白与蒋介石火拼，武汉失败后，并未死心。30年代，又重新盘据广西，整军经武，积蓄势力，打着“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幌子，待机问鼎中原。这期间，他们在军事、政治、经济、文教方面，都有许多新措施。创办国民中学，便是其中之一，其目的：

一、准备基层组织之基干人员和其他公务人员。新桂系为了巩固基层组织，需要大批忠于他们的干部，因而创办国民中学。

二、改造普通中学。新桂系认为当时仿效美国的“三三制”的普通中学是为学生升学而设的，不适合他们的需要，为此创办前、后期“四年制”的国民中学便应运而生了。

1940年秋，日寇从南宁撤退，广西战局平静下来，柳州暂时解除战火的威胁。这时，柳江县参议会、柳江县政府，根据1936年2月广西省政府公布的《广西国民中学办法大纲》提出筹办柳江县立国民中学。参议会议长覃采如、县政府县长朱瑞元推荐参议会驻会议员熊天元为筹建校

舍委员会主任；董咸熙担任校长职。我是学教育的，乐于担任斯职。遂于1940年秋，一面着手筹款建校，一面招生上课。

41年初，择定柳州市景行路贛学（即现在市二中校址）为国中临时校址，进行修理；同时布告招收国中前期三个班新生150名。我请委梁琴为教务主任，陈西林为训导组长，陈运昌、杨第晰、陈显文、李祖培为教师，曾如海为事务主任。41年3月1日，正式开学上课。从国中成立之日起，到1949年11月25日止，前后不够十年。学制几经改革，三易其地，四易其长，终于脱胎换骨，回到人民的怀抱里。

二、筹建校舍

根据《广西国民中学办法大纲》要求，国中应设在农村。加之柳州是抗战后方的交通要道，河南张公岭附近设有飞机场，敌机不时从围洲岛起飞，来柳空袭，因此，国中不能长期留在市内上课。经县参议会、县政府商定，选择思贤乡木罗村为永久校址，并发动各乡镇参议员进行捐募建校经费。时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城乡人民，出钱出力，负担奇重；加上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钱捐助？至于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走私漏税，发国难财的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他们吝啬成性，更加不肯捐助。例如柳江县成团乡“大名鼎鼎”的地主熊天元就是如此！县参议会、县政府选他做筹建校舍委员会的主任，目的就是希望他带头捐款，但他徒挂筹建主任虚

名，实际是一毛不拔的典型。

到了一九四二年，全校师生数百人，没有一天能好好上课。只要马鞍山顶挂上一个灯笼，发出空袭警报，师生立刻哄出教室，拼命地跑出郊外躲避。师生迫切要求，学生家长提出意见，希望把学校早日迁入农村。在此紧急情况下，我劝说董氏宗族的老者，同意把董氏宗祠的蒸尝——坐落在谷埠码头到北帝庙一带空地，申请柳江县政府代为标卖，县长萧劲华，教育科长王简临，乐意这样办，获款三万余元，充作国中建校经费。为了不受物价影响，我请高村农民许某，在木罗寨打石头，踩泥砖、烧灰、烧瓦；又请县府派建设科覃技佐同我上长安（融安）买了两排木头放下柳州；一面请人绘图，由县府招商承包建筑，（包工不包料）嗣以木行街木材商人罗亿昌的造价最低，取得承包权。从1942年夏，拖到1943年秋，几经周折，罗亿昌甚至坐牢，终能在木罗村建成楼下用石头，楼上用泥砖砌成的一座大楼。楼下十间教室；楼上十间宿舍；另建成能容800人的一座礼堂，两翼延伸为办公室，图书阅览室，仪器室；还建成两座教师宿舍，一座膳厅等。43年9月，全校十个班，师生共约500余人，从柳州景行路临时校舍迁入木罗新校舍。这里山青水秀，柳暗花明，不受空袭干扰，前后对比，师生感到如同生活在世外桃源样的乐趣。

三、教材问题

1941年春，学校开学上课时，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教材问题。新桂系创设国民中学原没有充分准备，没有为国民

中学编纂特有的教材。当时国民中学所用教材却从普通中学搬来，普通中学的年限、课程时间与国中全不相同。广西教育厅先颁布一个《国民中学课程科目及每周授课时间》，继颁一个《国民中学前期选用教材一览表》，指定国民中学前期哪一科目采用哪一种初中教科书，指定国民中学的“公民训练”科目，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复兴初级中学的公民教科书；国文科目采用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初中国文教科书》；算术科目采用正中书局出版的《基本算术教科书》，其他科目，莫不如此。另外还颁布一个《各科教科书使用说明》。指出所借用的初中教材哪段应详，哪段应略，哪段应补，哪段应删。（以上见广西文史资料十五期《新桂系的国民中学教育》一文）足见国中教材如此鸡零狗碎，缺乏系统，正说明主办国民中学的人，采用实用主义哲学的具体表现！

四、升学问题

前面说过，新桂系设立国民中学的目的是为培养基层干部，而不是为着学生升学。所以国中课程侧重于政治训练，社会服务和生产技术方面，但是这些科目既缺教材，又缺教师。因此这些科目有其名而无其实。至于基础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的份量却比初中少得多，特别是不设英语一科。

41年上半年招收的前期国中班学生，到42年下半年就毕业了。这些学生多是考不上省立柳州中学才来投考国中的。他们和她们毕业后，年龄仅十三、四岁，谁也不愿跑去农村去做基层干部；但是想升学，投考高中又竞争不过普通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学校开办前期国中班，已经感到问题严重，

自然就不愿开办后期国中班了。因此这些前期毕业的国中班学生掉在半空中，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学生苦无出路，家长责难学校，参议会和社会人士啧有烦言！

五、学制改革

为了解决学生的出路问题，从42年秋季起，学校先后开办一年制的简易师范班共两个班，高中先修班一班，同时又招收初中班和国中班。学校内存在四种不同的学制，形成大杂烩。根据形势的发展，顺应各方要求，从46年起，干脆利索地停止招收国中班，尽收初中班。将学校改名为柳江县立初级中学。这时，投考初中班的学生，较前增加数倍。为了激励城乡小学的学生，勤奋学习，争取优异成绩，每校可保送高小毕业成绩优良的两名学生，免新生考试，进入县中学习。

47年下半年，根据河南地方人士的请求，县参议会的提案，县中在河南设立分校，请委陈显达为分校主任。49年上半年，河南分校改为柳江县立第二初级中学，陈显达任校长。河北的柳江县立初级中学改为柳江县立第一初级中学。解放后，掉转过来，河南的二初中改造成为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第一中学；河北的一初中改造成为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第二中学。

六、反动党团组织

教育不是孤立的，它是受政治、经济制约的。1941年春，国中开学上课后，国民党柳江县党部派专干余绍元来校

召集教职员中的国民党员开会（旧社会，在公立学校做事，必须参加国民党）组织国民党区分部，选出事务主任曾如海（曾亚中）任区分部书记，梁琴、陈西林任区分部委员。43年秋，学校迁入木罗，曾如海离校，改选办事员周天枢为区分部书记。事务主任由李立民接充。43年春，广西三青团委派我兼任三青团柳江分团干事。是年秋，柳江分团派专干唐健人来校发展三青团员。凡年满15岁的学生，均由童军队长虞国礼发表给他们填写，经过集体宣誓，参加三青团的学生约200人，并选出简师班学生蒋霖为区队长。44年上半年，蒋霖被柳江分团调去学习，虞国礼继任区队长。45年冬，柳江分团派专干蒋霖来校登记旧团员，（因44年11月至45年7月，柳州沦陷，学生星散之故。）参加登记的不过数十人，并选出初一班覃其涵为区队长。46年秋，柳江分团召开团员代表大会，我以干事名义参加，结果被选为执委。

七、曾世钦（曾诚）事件

1943年1月中旬，广西地下党出现了叛徒。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逮捕共产党人，柳州也不例外，一天上午8时左右，柳州警备司令部副官主任熊天梦来校对我说：“你校有一个曾世钦老师，他是都安人，都安有人控告他，霸占人家的田地，请你叫他来问看，是否有无这回事。”我叫工友去找他，工友回话说：“曾老师去公园做运动了。”熊天梦叫我去公园找他。走到景行路土帝庙米粉店碰上了，熊天梦又用同样的话对他说，并叫曾世钦（解放后，改名曾诚。）同他到柳州警备司令部去。接着在柳州公开活动的中统特务徐

来也出现在他们的后面。这时，我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天下午，从各处传来的消息，又知道龙中教师覃景秀（解放后改名石山），柳州日报社总编辑林继茂同时被捕。三天后，我叫出纳员蒋玉应送饭给曾，探听消息。蒋回校告诉我，曾对她说：军统特务钟可庄，中统特务陆树珊用拳头猛击他的胸口……。43年冬，龙中校长陈如平告诉我，柳州专员兼警备司令尹承纲传话出来，叫柳中校长王剑功、国中校长董咸熙、龙中校长陈如平同去担保，然后释放曾、覃二人。

八、柳州沦陷

1944年8月8日，日寇攻陷衡阳，矛头指向广西。9月初，桂林紧急疏散，柳州城乡震动，东站和北站，人山人海，车蓬、车底都塞满了人。影响所及，学校已无法上课。我叫出纳员蒋玉应、事务员敖启苍发完全学期的学米给教职员工，让他们各自疏散回家。又叫敖启苍率领学校工人把学校重要公物疏散到城团乡的一个山角落的农民家。9月上旬，我一家老小五口，仓猝出柳，搭柳州中学雇用的民船，沿河而上，经柳城大埔、罗城寺门，直达龙岸。学校教务主任梁琴、训导主任黄宗范、出纳员蒋玉应、图书仪器管理员杨继英亦已疏散到龙岸。

九、胜利归来

1945年7月1日，日寇退出柳州时，四处放火，整个柳州变成一片焦土！9月初，我回到柳州，看到的尽是颓垣断

壁，满目疮痍。时值霍乱流行，死者陈尸街头，无人收殓。逃难归来的人，衣、食、住、行均成问题。我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人，跑到窑埠码头两侧，拔芭蕉莖来充饥。我回到思贤术罗村，看到国中校舍，全被日寇拆毁，片瓦无存，只得积极设法，修复柳州市景行路旧址。十月，通知旧生回校复课。原有十个班的旧生约500人，回校者不及二分之一。只好招收新生和插班生补充缺额。上课后，用全学期劳作时间，收拣残砖烂瓦，除草挑泥，清理校内一切垃圾，填平坑坑洼洼的地方。

46年冬，美军在北平奸污北大女生沈崇，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北平、天津大中学生，高举反美暴行的旗帜，通电全国，游行示威！全国青年学生，纷纷响应。当时，柳州中学（即现在的柳高）以学生会名义，召集高工、柳师暨柳州市各中学学生代表开会。柳江县中的学生代表覃其涵参加。会议决定组织柳州学生联合会。发通电、宣言、传单，声援北大，抗议美军暴行。

47年夏，全国爱国青年，声讨美、蒋挑起内战，迫害人民的滔天罪行，声势浩大，形成全国性的“六·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运动。但由于柳州专员林茂，召开全市中等学校校长会议宣布严禁学生爱国运动。各校长回校又采取共同做法，召集各班主任开会，严加防范，致使运动未能迅速开展。只有站在革命最前列的柳州中学，英勇地冲破重重樊篱，全校高初中数百名学生，浩浩荡荡地上街游行，张贴标语等，他们这种轰轰烈烈的行动，震撼了柳州，深入了人心。

47年7月柳州专署又召开柳州中等学校校长会议，为了防止各校发生学潮，要求各校遵照广西教育厅发下组织特务性质的“学运小组”。我因调职离校，由学校区分部书记周天枢代表出席会议。

在爱国运动声中，革命势力已发展和深入到县中内部。据我的记忆：曾先后在过国中（县中）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传播革命种子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就有丘峰、韦章平、覃立彬、吴师光、沈音、王春湘、农奋、黄瑞清、梁之瑜、丁维民、李家辉、曾度洪、陈义宽、邓崇慧、廖宝琦等，由于受到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的启发教育，学生思想觉悟提高，先后加入爱青会和入党的学生如陈绪华、覃开坤、康成禧、杨育希、麦超、易光远、韦初然、欧敏士、柯国雄（柯阳）、廖剑鸣、谢汉强、秦嗣松、高彬、杨美芳、韦银枝、龙淑媛、陆世芳等。

十、调职离校

一九四六年后，由于柳江城乡官绅的争权夺利，地方的中、上层人士结成封建式的城乡两派，实际上是张任民和覃连芳两派。当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时，两派相争，几乎动武。当时我是附属于城派即张派的。1947年，柳江县县长杨义，他是城派头子之一，他和我又有亲戚关系、适逢新桂系的广西省政府，令饬各县、市成立教育局，从派系的立场来说，自然不愿意这一职位落到对立派的手里，杨义推荐我担任县教育局局长，是势所必然的了。由于我的推荐，曾任柳州中学教务主任的刘冠群，继任柳江县中校长职。

1947年7月，我离开县中，刘冠群于8月1日到职。48年春，县中办理招收新生工作。体育教师李士光买空卖空，他在校外大肆活动，扬言谁给他300万元伪钞，他保证谁的儿子取录县中。当时柳州学校的情况是：“教师走私”，因为私立学校的待遇高：例如私立中正小学教师陈丽英，他每月工资是白米400斤；私立中学教师每月工资500~600白米；公立小学教师每月工资是150~300斤谷子代金；中学教师每月工资是350~550斤谷子代金。“学生归公”，因为公立学校收费低。小学生每学期收学米20斤，初中30斤，高中50斤。私立小学校小学生每学期收学米200斤，（香山慈幼院小学便是这样）初中收300~400斤，高中收500斤。（私立大道中学便是这样。）正因为这样，思贤乡拉堡圩小学生刘文盛的父亲，受到李士光哄骗，给了他300万元。可是学校取录新生出榜时，刘文盛只获得备取。他的父亲火冒三丈，将内情告到学校和柳江县政府、县府便把李士光抓了。县府秘书罗惠南，原是县中训育主任，他久已垂涎县中校长职位而不可得，他乘机唆使李士光供认：说他受贿得到300万元全交给校长刘冠群了。于是县府把全案和李士光口供送交柳州地方法院裁决，法院不经调查研究，只凭控诉书和李士光口供办理，经传讯后，糊里糊涂把校长刘冠群、教导主任黄宗范、教务员曾伯钧全扣留了！县中师生极为愤怒！曾写慰问信和派代表去监狱慰问。龙中校长高天骥，对法院陷害好人极感不平，曾到教育局和我商量，拟发动学生列队到法院请愿。当时县中群龙无首，我便打电话通知县中训育主任陈西林来局磋商，陈西林说：“国民党法院是不好惹的，我家中有老有小，

我是不敢发动学生的。”高天骥听了他的话，气愤地说：“怕什么！最大不过是撤职，你若被撤职，我请你到龙中当教师。”陈西林仍然无动于衷，这件事便搁置下来了。但由于社会人士反应强烈，法院便把黄宗范、曾伯钧释放，直到49年3月，法院才宣布刘冠群无罪，把他释放。

当刘冠群坐牢后，学校形成无政府状态，我便推荐陶尊五继任县中校长。陶曾担任过两国简师班主任，深得学生爱戴。陶是中渡人，和柳州专员罗浩忠是同乡，因此，拉拉同乡关系，陶尊五接任县中校长很快地通过了。但，在旧社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1949年夏，罗浩忠调离柳州，苏新民继任柳州专员，陶尊五的校长位职便被私立大道中学教师瞿辉伯“取而代之。”柳州临解放前，瞿离校溜走了。

从1941年3月1日起，至1949年11月25日止，柳江县中（国民中学）在柳州的教育史上，留下的事迹是：开办了国中前期班11个班，简师两个班，高中先修班一个班，初中18个班。柳州解放了，它才脱胎换骨回到人民怀抱里。

柳江二中（今一中前身）建校经过

陈 显 达

一九四七年我在外地工作，六月初因事回柳，遇阚绳武、莫显丞、黄炳炎、韦秉廉等地方人士，谈及柳江城区河南，商业繁荣，人口稠密，没有一所中学，小学生众多，升学实有困难。我们地方热心教育者大不乏人，我们在河南筹建一所中学，显达回来为桑梓服务，建筑经费由我们发动捐募解决。六月尾，我辞掉外地工作回家。

七月间，屏山镇开镇民代表大会，镇公所及一些代表提出建立第二中学方案，获得全体通过。并选出陈显达、彭隆均、莫显丞、黄炳炎、阚绳武、覃子权、吴越、韦秉廉、陈显扬、朱佩珖、黄文魁、苏子牧、吴际平等十三人为建校委员。推举黄炳炎、彭隆均、吴越、韦秉廉、黄文魁、吴际平、陈显达七人为常务委员，并推选陈显达为主任委员，彭隆均为副主任委员。报请县参议会审议通过。

随即成立建校委员会，开始筹备工作。并推出彭隆均、黄炳炎负责募捐，朱佩珖负责财务，陈显扬负责工程。分头进行。并报县教育局备案。

为了赶在47年下学期开学上课，时间只有两个月，学校成立，尚未获得省教育厅批准，因此暂用“柳江县中河南分校”名称。县教育局派我为分校主任。其它教职员，大都由县一中调来。第一学期两班新生，由一中拨来。远地学生需在校住宿，校舍刚在筹建，商得镇民代表大会同意，暂借河南圩场（今东风商场）西面圩亭九栋，为临时教室、宿舍、办公之用。当时即以建校捐款购集木材，将圩亭装修，如期开学上课。

紧接着急于选定永久校址，这在当时亦非易事，因柳州地处全省交通中心，柳州河南又是交通枢纽，抗战期间，由于接近山岩，防空便利，不少地皮为桂系权贵占有，如：柳邕路与柳石路交接的山脚一带公地，为李宗仁第二夫人郭德洁名义“租用”（其实就是霸占，原租用的人绝大部分被她赶走了）。又如：柳邕路东端的北面，一大片公地（今六中整个地盘）为桂系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占有，他说是“买得的”。而二中校址，又不宜远离市区。几经踏勘，终于选定桐油山下。桐油山又以其形象称狮子山，紧靠马鞍山南面。大家认为山麓虽不平坦，但西面场地在抗战前曾经开过一次运动会，相当开阔，作为永久校址，有发展条件。

筹建工作，首要募集经费。由于委员们为地方绅士及谷埠对河商行老板，对建校事业颇具热情。各自提出：“若要人下水，自己先脱衣”。如黄炳炎、黄文魁、韦秉廉、彭隆均、吴际平、都争先认捐，特别是苏子牧以新华烟厂名义，捐米一百担（每担100市斤），因当时国民党钞票已贬值，所有建筑材料及工资皆以米来订单价。建委财务规定所有收获捐

款，立即由财务购进白米贮存，以备开支。募捐工作，委员中积极分子，随身携带募捐簿据，随时随地，遇对象（相当的）即进行劝募，筹集经费，取得顺利。每月将捐款人姓名及捐款数目，在教育局出版的《教育简报》公布。并由二中学校会计孙醒依兼建校委员会会计，负责审核帐目。

建校工作，不仅募捐一项，其它如财务，工程种种工作，各部门尽力负责，先完成了木石结构的教室六座（每座有教师办公室一间），办公室和宿舍各一座，和校门（北向）与环绕东北至半山上的石砌围墙。为了将来发展，1948年又呈准县府拨桐油山西面场地（现一中广场）直到南面小山脚下的一大片地方作扩充校舍与体育活动场所之用。

一九四八年秋，仍由一中拨来两班新生，在新校舍上课。初，省教厅不同意我们办初中，拟改为职业学校，但地方人士反对，经过力争，终于1949年4月批准，正式成立二中，委派我为代理校长。秋季开始自行招生两班，于是六个班学生已全部在新校舍上课。

二中所实施的体制是解放前的教育制度，从民国以来，基本上是照抄日本的，而日本又是沿袭欧美的。兹就人员编制，所开课程等略述于下。

关于人员编制：行政人员，设校长一人，实行校长责任制。校长综理学校一切事务，凡对内对外公文概以校长名义进行。下设教导主任一人，负责教导工作，拟定全期教学计划，分配教师上课时数等；有组员三人，分别负责排课，草拟来往公文，及缮写工作。总务主任一人，负责后勤工作，有会计、出纳、采购共三人。教师以每班配备两个半的比例计

算，每周上课十八节，超过者有超钟点费。班导师（班主任）工作，则每周上课十节计。

工资待遇：凡新教师从最低级起薪，一般教职工生活待遇很低，每月约三十多元。加上国民党滥发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早晚不同，使教职工生活更为艰苦。此外每月有学米一百八十市斤。但当时二中学米存在米铺，经校务会议，以米息每人每月补助一百市斤。虽然如此，家庭人口较多者，他们的家属仍不得不去卖小菜（如组员周天枢的爱人）。或者去摆烟摊（如教师敖起絮的爱人）。以此来弥补家用。

学费：每学期学生所缴交的学杂费外，另收学米三十市斤（私立中学如龙中高中部则收学米五百市斤）。因此，工农劳苦大众是难以送子女入学的。

开设课程有：国文、数学、英语、植物、公民、历史、地理、图画、音乐、体育等。修业期限，三年毕业。

其他方面：人事任免权，完全操在省教育厅。虽然一般任用教职员可由学校呈报任用，但终必须得省教厅批准。当时对中学教师的资历控制颇严，非大专毕业的，一般不易批准担任中学教师。在解放前任过二中教师有：莫若一、曾亚中、彭隆均、吴毓贤（女，莫若一的爱人）、敖起絮、韦香草、覃肇鹏、柯义、叶超群、曾水寒、钟声华、刘灿曦（女）雷淑兰、（女）蓝松筠、查静玫（女生辅导）、张岳天、任士奇等。他们在解放后仍继续从事教育工作者不少。

四九年下半年，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全国解放之势，业已形成。九月广西省府来文，令柳江二中迁往偏僻乡村。衡

量形势，即使能照办，又将如何？最多农村较城市解放稍迟而已。何况无钱无力，将学校搬至农村，谈何容易？只一笑置之。十一月间，柳州解放前夕，我接到粤桂边区纵队司令员梁广来信，大意为柳州形将解放，应将学校建筑，一切财产，公文档案妥为保管，凡愿意为新中国事业服务的公教人员，都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是我接受共产党的第一次指示。当时觉得既激动又安慰，从而意识得国民党造谣惑众的“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是别有用心。那时除个别外地教师已离校外，其余教职员工仍然留校。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国民党军队，纷纷经柳州向南宁撤退，当时人心浮动，恐怕解放军入城前出现真空。于是我对全校教职员说：有愿意暂避一时的，可到乐山乡拉梭村我家暂住。在校教职员及家属共三十人到乡下住了两、三天，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柳州解放后随即回校。

四九年八、九月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方觉慧，通过他在二中任会计的亲戚孙醒依，把准备转移出境的三辆运货汽车载运来的书籍暂时寄存学校。当时学校窄小，教室不能存放，在走廊下堆满了，还有一部分存放在谷埠街我大哥陈显扬住家的楼上。柳州解放后，经报请文教接管部接管。据后来清点，其中盖有北京图书馆印章的上万册古旧书籍，经转报北京图书馆派员来收回去。以后北京图书馆赠送一部分书籍给柳州图书馆、博物馆，其中有柳州旧县志（民国年间翻印乾隆版），柳州府志（北京图书馆用油印翻印）。以后方觉慧由香港来函询及此事，对如上处理，认为满意。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即柳州解放一个月，二中有

一十八名学生考入军政大学。不久，文教接管部来校接管。批准我原职留校工作。五〇年二月，我离校工作以后改名“柳州市一中”。丘行同志接任校长职务。

丘行同志接任校长初期，市文教局长沈章平同志到校邀集原建校常委七人到校座谈经过，会后聚餐。对地方人士热心努力，筹建学校，表示赞扬和感谢。

陈显达

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柳江图书馆的遭遇

董 威 熙

1925年，新桂系统一广西后派广西陆军第二纵队司令伍廷颺驻扎柳州兼柳庆清乡督办。1926年，四乡土匪基本肃清后，他即着手地方建设工作。由于柳州是广西的心脏，交通的枢纽，因此他以交通建设为中心，开辟各条公路，但他对柳州文化教育的建设，也还关心。例如为了培植建设人材，他创办柳州工业专门学校，校址东门城外粤东会馆，即今日柳高右侧新华楼一带。为了提高柳州人民的文化水平，他曾派人到广州请技术工人刘旺来柳建造柳江图书馆。馆址即今日公园路柳州市文联。建成后，是当时柳州规模最大，面积达600平方米的一栋砖木结构其中全无间隔的三层楼房。之后，柳州张任民趁赴南京开会之便，特请于右任（国民党中央监察院院长）写了一尺二寸见方的“柳江图书馆”五个大字带回柳州，把它镶嵌在二楼大门上面。可惜从1928年建成后至1948年20年间，迭遭兵燹火灾，馆内没有一书一报，从未开放与群众见面。

1928年秋，柳州大火，从龙城路以西的大街小巷全烧光，设立在旧学院即今日的柳州日报社的柳江县立中学，随着付之一炬。莘莘学子，休闲在家，校长董玉成束手无

策，只得让位。

1929年春，新任柳江县县长兼县中校长陆希澄，借用图书馆为县中临时校址，恢复上课。当时县中仅设有中一，中二，师范三个班，笔者就是中一班学生。

1929年，两广发生战事，张发奎率领第四军从省外进入广西，与李、白联合反蒋。他们为了与蒋介石较量，问鼎中原，便在柳州成立**军校**，派四军师长薛岳为军校校长，培植军事力量，遂霸占图书馆，开办军校无线电班，县中已被撵去公园搭起篾蓬作课堂。

1932年，军校迁往南宁，县教育局和民众教育馆相继借用图书馆。1934年，桂系七军驻防柳州，图书馆又被七军占用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白崇禧、李宗仁先后进京做官，七军开赴上海作战。以往被封建割据、闭关自守的广西，与蒋介石势不两立，现在门户洞开，让蒋的军统、中统、以至金融势力如同潮水般涌进广西。在柳州他们也看上了这当时算得上宏伟、壮丽的建筑物——柳江图书馆，未经与柳江县政府签定租约合同，便搬了进去！兴建柳江图书馆的创始人，其用意在提高柳州人民的文化水平，如今却被滥发钞票的中央银行占用，变成为四大家族敲人民之骨、吸人民之髓的地盘了！

1944年秋，日寇侵入广西，11月9日，柳州沦陷，图书馆遭受敌人的践踏，自不待言。1945年，日寇退出柳州时，丧心病狂，四处放火，把整个柳州（除边远的零星房屋外）烧成一片焦土，图书馆也逃不了被焚毁的厄

运。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柳州光复。逃难到外地的市民陆续归来，映入眼帘的尽是颓垣断壁、街头横户！国民党的军政大员，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去多发接收财，哪管人民的死活？更遑论修复图书馆这件事情。

46年，本县人杨义做了柳江县长，刘克初做了参议会议长，他们亲眼看到图书馆的兴建，又看到它既遭兵燹，又经火灾！他们在地方人士关注和敦促之下，于是拨款修建。时值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滥发钞票，物价高涨，包工商人古英布乘机挟款潜逃！县府迫得另行招商承建。47年夏，柳州宜兴营造厂经理苏望如，在卸任县长刘栋平支持和担保之下，承包是项工程，继续兴工。同样原因，战火扩大，通货澎湃越厉害，物价一天三变，承包商无法应付，再次停工。

1948年7月，新任县长韦瑞霖有见及此，要请地方人士组织修建委员会，以刘克初、龙伦甫，郑兰生、张振民、韦瑞霖为委员，拨公粮1183担，仍由宜兴营造厂承建。是年12月，又拨500担，乃告竣工。但，修复后的图书馆，较原来的矮了一截，不再象从前那样宏伟壮观了。重修经历志于馆门外两侧墙上石刻可供考证。

当时，笔者任柳江县教育局局长，眼看到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如潮水般地涌向广西，又担心修复后的图书馆再次遭受蹂躏，便商得韦县长同意，把原在公园柳侯祠内的教育局搬进图书馆。三楼作办公用，二楼作民众阅览室，楼底作职工住宿。并添置报章杂志，加上原来县府在东门城楼开办的

阅览室存留下来的数千册《万有文库》，一并开放给群众阅览。这是图书馆建成二十年后，第一次与群众见面。

1949年夏，韦瑞霖奉调任桂林市长，他离职前，我向他请求准我辞掉教育局长职，专任柳江图书馆馆长，并请拨款银元1千元，作购置图书和开办费用。韦瑞霖慨然允诺，于是大门外取下了教育局的招牌，（继任教育局长覃志暨局内职员迁到县府内去办公了）挂上了柳江图书馆的招牌。（原来在二楼大门上“柳江图书馆”五个大字已被焚毁）。

馆内编制：设馆长一人，馆员三人，笔者任馆长，馆员是罗理明（地下党外围人士），韦越（爱青会员）、翁志贤（女）从此柳江图书馆正式开放与群众见面。后来趁龙中教师李立民赴桂之便，托他带数百元去桂林文化服务社购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文艺书籍，如：《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李家庄的变迁》，《王贵与李香香》，《列宁全集》……同时罗理明在柳州各书店也买了一些新书。待李、罗买回新书后，还不敢公然摆在书架上，借给群众阅读，原因是当时柳州的特务多如过江之鲫！横冲直闯，搜捕进步人士。

临解放前两个月，国民党的中央图站，迁到柳州，便无法迁往贵阳、重庆去了。他们运来如山似海的图纸，连人带枪闯进图书馆来，我们聊聊数人，哪里阻止得了他们。

1949年11月25日上午九时许，图书馆后面的城楼上，一声炮响是（国民党炸毁他的电台）宣告柳州解放，先是解放军的十数名尖兵进到体育场（即现在市政府宿舍）十

时许，解放军大队伍进城。市民送茶送水，热烈欢迎！图书馆大门，贴上欢迎解放军解放柳州的标语，同时商得图站站站长同意，由罗理明到解北带来了五名解放军，接收了图站的长短枪共约20枝。11月26日，图书馆便将购买回来的新书陈列出来，借给群众阅读，当时图书馆内人山人海，座无虚席。12月，我们已领到军管会文教部发给的工资，笔者领到550斤谷子代金，职员领到约400斤谷子代金。（不少于解放前国民党发给的工资）一天晚上，军管会文教部长何子健亲自到图书馆，翻阅新购图书，问明图书情况。1950年1月3日，军管会正式接收图书馆，并把它改为柳州市人民文化馆。笔者被留用为馆长，另派马天禄为副馆长，原有馆员全部留用外，还新增加杨嗣松（爱青会员）于辉云、何纪明为馆员。从此图书馆脱胎换骨，，回得了人民的怀抱里。真正尽得了它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职责。

附石刻：一

民国三十三年倭寇陷境柳市屋宇什九被毁图书馆亦被毁三十五年杨义县长力图修复嗣以款项不继未能竣工三十七年七月组修复委员会聘刘克初龙伦甫郑兰生张振民及瑞霖为委员拨县公粮谷一千一百八十三担继续兴工十二月又拨五百担乃告竣工当兹县粮极感乏絀之时能抽拨大批数目以建图书馆具见地方人对文化事业之重视也爰志之以供参考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元月韦瑞霖书志

二

柳江县图书馆之建筑屡遭厄今幸完成可告慰于地方人

士矣昔本工程于三十五年兴工中途停顿迨三十六年夏在柳江县杨前县长任内望如始续建工料费国币一亿八千二百二十一万元事缘县款支絀未能如约支付致遭工料涨价无法应付遂得停工使我地方人士殷切期望落成之图书馆几成泡影同年十二月陈前县长与参以县政过忙未暇顾及致本工程一悬而再悬使地方人士一再失望三十七年夏韦县长瑞霖公莅任洞察民隐顾全公共利益邀集地方父老组成建委会筹拨在乡稻谷一千一百八十叁担为本工程续建费奈以运输梗阻迭遭生活奇变迫得将情呈报而韦公及地方父老共体时艰继拨稻谷五百市担按照预算仍不敷开支付望如身为小民在县长韦公领导下应本服务地方建设精神不惜毁家荡产始将本工程建筑完成兹适完工谨志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一日柳州宜兴营造厂经理苏望如

注：原碑嵌于柳江图书馆二楼大门外两侧墙壁

拓片：一、 46×64 二、 42×66

建国前柳州各报纸简介

邓冠濂收集 整理

市党史办供稿

《柳州日报》和《广西日报》（柳州版）

柳州日报的创建，有着较远久的历史，是柳州新闻界历史最长的一家报纸。它还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史。报纸创办的初期，即大革命时期，就有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报社内活动。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一批地下工作者进入报社工作，在报社内先后两次建立过党的组织。先后在报社工作过的我党地下工作者达七十七人之多，还有一批爱国文化人士也在报社工作过。柳州日报虽被地方势力所把持，但我党掌握和控制期间，利用新闻的合法地位，力图讴歌进步，鞭撻时弊，宣传抗日，与黑暗反动势力作斗争，成为抗日和进步的一面旗帜。它还为我党培养和积蓄了一批骨干力量。有的同志至今仍战斗在新闻战线上。

柳州日报的前身为柳江日报。该报创刊于1926年8月，为三日刊，主持人是杨思振。伍廷飏曾任过社长。当时我地下党的负责同志陈岳秀、罗琴谱任该报编辑，发刊词是由罗琴谱起草的。他们在团结、引导一部分进步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起过一定的作用。1936年国民党第七军进驻柳州，接管

了柳江日报，改为《柳州日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第七军撤离柳州，柳州日报改由伪柳州专员公署接办，先后由陆雁峰、高天骥、马典符、黄炎桑、董咸熙担任社长。

四十年代初，我地下党在报社内建立支部，开始由柳州特支书记路璠同志联系，李文浩同志从广东来后，负责特支宣传工作，报社党员联系交由李文浩负责。报社支部书记为谢文思。党员有：张白萍、沙君涛、秦仲明、林继茂。组织关系不在柳州的还有：何碧波、陈作钧、钟士民、黄石文、钟天赐、张素梅等。1941年春，报社社长由林继茂代理。1943年1月，广西“1.15事件”发生后，林继茂被国民党逮捕。同年报社社长再度改由黄炎桑担任。

1942年6月底，广东地下党员罗培元同志（现任广州市政协主席）到柳州日报社工作，担任总编辑。罗培元同志到报社后，团结报社党员和进步人士一道积极宣传抗日。1944年夏，罗培元升任社长，他利用这有利时机调整报社内的人员，把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对思想反动的职员逐个调离报社。被我党掌握的柳州日报以新华电讯和新华日报社论精神为指导，坚持革命立场，有理、有利、有节地与敌人作斗争。在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传播进步文艺和社会科学理论，努力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在报社内建立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组织，壮大了党的力量。

1944年11月，日寇侵占柳州，报社转移到融安、罗城、柳城一带，在艰苦生活环境中，坚持出版油印的《柳州日

报》。并与融水党组织、司马文森的文化支部等党组织组成联合工委，在敌后一手拿笔杆，坚持宣传党的主张，一手拿枪杆开展武装斗争。柳州日报社的革命活动受到南方局的肯定和赞扬。

1945年6月29日，日军撤出柳州，七月间，报社迁回柳州继续出版。为了摆脱地方势力对柳州日报的控制，便于斗争，1946年初柳州日报改为广西日报（柳州版）。吴克清应罗培元之邀，到报社担任总编辑。同年6月，反动当局改组了柳州版，派张洁担任社长。罗培元等接到上级指示，陆续撤出柳州日报，离开柳州。

1948年张洁调任广西日报社社长，由编辑主任黄志勋继任社长至柳州解放。柳州解放时由军管会接管报社，初期只出新华电讯。

《中正日报》

该报原名为《阵中日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每个战区都由“政治部”主办一个《阵中日报》（也有用其他名字的）。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于1939年7、8月间在广东曲江创办《阵中日报》。初期为八开三日刊或周刊。在战区内发行，对象是“阵中”的官兵。新闻完全以战事为主，也刊登有“命令”、“通知”之类，很少有地方新闻。副刊也是属于“军中娱乐”的性质。

1940年春，《阵中日报》随四战区迁来柳州出版。后因经费有些困难，出版或断或续。1942年6月6日改为《中正日报》，社长由政治部主任梁华盛的主任秘书王侯翔担任。梁华

盛通过在外跑生意弄到一些资金，扩大报社，增加人员，增添器材。报纸改为对开，每日出版。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仍为国民党第四战区之喉舌。1944年11月，湘桂大撤退时，《中正日报》随四战区迁往昆明出版，日本投降后，该报又迁往广州出版。

《立鱼峰报》和《鱼峰报》

1941年间，天津《大公报》柳州分销处负责人莫贵朋与该报驻柳记者陈凡合资创办《立鱼峰报》。该报系三日刊小型报。以内幕新闻为主，兼一些综合性报导。开辟副刊版，刊登小说文艺之类，另有一些地方掌故之类的文章。该报能吸引读者，销路颇广，最高达七、八千份，一般都在四千份左右。1943年陈凡调职，由新任驻柳记者侯本真与莫贵朋合办。后因两人产生矛盾，意见分歧，就此《立鱼峰报》停刊。1944年春夏之间，莫贵朋雇用了《中正日报》记者林宿儒等，自己办起了《鱼峰报》。柳州将近沦陷前，因登记手续不完备，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而被停刊。

《前锋报》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报人云实诚在肇庆出版《前锋报》，三日刊，销路不错。1943年，云实诚与在柳州的《正中日报》记者任永年、谢庭等在柳州开办《前锋报》，作为肇庆《前锋报》在柳州的分版，以免其登记手续。该报取材侧重内幕新闻，广东方面常有资料提供，内容较为丰富，小说和

杂文颇受读者欢迎，因而销路很好，最高额曾达一万五千份，一般都在五、六千份上下。柳州沦陷前，因登载广东伪省长的内幕，被主管新闻机关，以登记手续不完备，而勒令停刊。

《大 中 报》

是个小型三日刊报纸，自己没有印刷设备，是委托私营印刷厂印行的。报导一些社会新闻和黄色琐事，也报导一些伪政府人事动态等。该报能迎合小市民口味，供茶余饭后消遣，拥有一部分读者。该报于日寇沦陷柳州时停刊。该报社长陈万华。

《民 声 晚 报》

该报于1945年9月创刊，由周卓襄出资，刘云甫负责纸张和印刷，林锦涛任社长，周卓襄自任总编辑。1946年特务头子钟可庄强行接管该报，交由朱沧浪任社长。该报有的职员到学校兼任教师和学生指导，专门监视进步教师和学生的活动。该报先由四开小报发展成对开报纸。第一版为国内外新闻，全是鼓吹反动言论。第二版是国内外通讯，是剪别的报纸来“炒冷饭”的。第三版是文艺版，由社长朱沧浪把持，由他撰写和审定。第四版是省市新闻，多登黄色新闻和商情，颇适合一些资产阶级的口味，销路尚好，最高达三千份。1949年春，得到本地商人募集了一批资金，在中山东路建筑了社址。该报一直发行至柳州解放。

《真报》

该报从1941年夏开始筹办，1943年元月发行。系对开日报。社长彭树椿，经理曾敏之，总编辑陈雄子，副刊编辑何家槐（中共地下党员）。该报发行了一个月后停刊。1943年夏重新复刊，改为四开三日刊。1944年2月改为晚刊。桂林疏散后，黄宁婴任副刊编辑。知名文化人士司马文森、陈残云、叶春常等在该报发表文章。1944年4月该报停刊。

《正义晚报》

1945年日本投降后，劫后的柳州还没有什么报纸。刘雄与《柳州日报》记者查仲轩创办了《正义晚报》，是四开油印的。刘雄任社长，查仲轩任副社长。电讯来源由省电台的林志伟提供，报社设在庆云路三达文具社内。办报的时间很短，《柳州日报》从融县迁回柳复刊后，该报便停刊。

《新录报》

创刊于1945年冬，柳州光复后不久。是个小型报刊，由于其他原因，出版不久就停刊了。

《大时代报》

该报系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夏威所办。创刊于1946年。拥有自己的印刷厂，基础较巩固。该报亦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喉舌，大体上仍遵循反共反人民的路线，但有时亦故示

开明态度，对国民党当局有大捧小嘲之表现，欲以此来迷惑读者。该报在知识分子中拥有一部分读者，对学术理论，常有特约稿件撰述。由于该报经营管理不善，亏累巨大，时停时辍，终因无法支持，于1948年停刊。

《大 华 报 》

于1947年左右创刊，社长孙维源，副社长徐来。该报的立场十分反动，是同行进行反共反人民宣传的皎皎者。因有特殊的关系，发行不久，即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登记证。但亦因立场反动，地方新闻多载黄色新闻，销路不佳，经营不善，亦曾中途停刊。后又重整旗鼓，恢复出版直到柳州解放。

《立 言 晚 报 》

该报于1947年创刊，系柳州机器工会主办，由覃连芳出资经营。社长由机器工会的理事长徐雨川担任。当时覃连芳在柳州竞选立法委员，曾利用该报作宣传工具，宣扬其政治主张，德政等。覃连芳竞选失败后，因经济亏累，该报即停刊。半年后，覃连芳重新投资恢复该报。并由原来的三日刊改版为晚报。宣传路线是根据覃连芳的指示多赞扬国民党之友党友派（覃系民社党广西委员），有时对国民党也大捧小骂。地方新闻多以黄色新闻为主。该报以小报之泼辣风格迎合一般小市民读者。该报有自己的印刷厂及工人。改晚报后一直发行到解放，后为军管会接管。

《西南日报》

该报系柳州专员公署与三青团合办之报纸。创刊于1947年左右。社长就是三青团柳州干事长冯培仁。系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喉舌。着重宣传专署各县之政令，每有不另行文的通知、通告等均在該报刊出。因无自己的工厂，印刷业务由商人承包，发行数月后即告亏累倒闭。

《南天日报》

此报系当时在柳州驻军56军军长马拔萃所办。马于1948年任柳州警备区司令，负责检查新闻出版事宜。他本人也热衷于名利，亦出版了《南天日报》。初期为军中报纸，后扩大对外发行。宣传理论向来颂扬反动统治，巩固反动政权，大力宣传剿共总体战方针策略，极端反动。该报发行至1949年秋，解放前夕停刊。

《钢报》

由原来《民声晚报》记者罗福义筹办，于1948年春发行的小报。最初为三日刊，后改日刊。该报曾得过覃连芳的接济，但终因无经济基础，销路不好，日销不足千份，只出版了两、三个月后即停刊。

《言报》

该报系1948年从梧州迁来柳州出版的。但因经营不佳，

开支过大，出版数月后，即倒闭不复发行。该报原在梧州发行时，因销路不佳难以维持，连工厂一并迁来柳州。该报主要面向工商界，有一部分固定篇幅供工商界报导商情动态，但时出时停作用不大，影响亦差，在读者印象中默默无闻。该报社长梁升俊（伪广西省参议）。

《柳江日报》

该报系地方报纸之一，为柳江县驻省参议员韦建明主办。于1948年创刊。该报有地方特色，宣传目标亦系鼓吹地方力量，颂扬国民党地方法政。因基础薄弱，经济力量不足，交商人承印，亏累甚大，出版数月即告停产。

《大生报》

大生报是1949年2月创刊的，是四开纸的三日小报。由几个失业知识分子黎工勤、朱静秋、徐情筹办。因没有电台，所刊载的新闻多是剪其他大报的，副刊稿也多是剪其他报纸的。报纸交由私人的凤凰印刷厂代印，销路很差，维持不了，不久即停产。

《商人报》

该报顾名思义，是柳州市工商界人士出资筹办的。于1949年春创办。主要报导工商界的一般商情，以大量篇幅刊载动态行情起落。也跟着反动政府的尾巴作反动宣传，有时

也有较进步的文艺刊载。该报多在工商业资本家中发行，销量有限，亦遭到经济不景气影响，于1949年秋宣告倒闭。

《朗报》

于1949年春创刊。初期为《广西日报》编辑部同仁所办，后因无力支付而被迫停刊。后《民声晚报》的记者陈炳文出资继续出版。该报亦因未成领获国民党之登记证，立场、观点上多讨好国民党当局。地方新闻以黄色为主，无印刷设备，委托商人代办印刷。销路虽不好，靠向外捐募和外力的支持，一直维持出版至柳州解放。

《群声日报》

该报于1949年2月左右从贵县迁来柳州复刊的。迁来柳州时曾招过一批记者。该报是民社党的机关报，曾刊登过民社党的纲领（覃连芳系广西民社党的主要负责人）。该报极力鼓吹走中间路线，伪装进步。该报分编辑部、电台、印刷厂、营业处等四个部分。社长常克扣拖欠职工工资，因而该报常遭到印刷厂工人的停刊，出版断断续续。

《新潮报》

该报于1949年7月创刊，由原来《群声日报》营业主任罗运源筹办。社址设在柳新街。是四开三日刊小报，没有电台，电讯稿是向别的报社报务员买的。没有印刷厂，交由凤凰印刷厂代印。

《武汉日报》

系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长江中游最大的机关报，为蒋介石反革命宣传的直接喉舌。临解放时迁来柳州出版。该报各项设施齐全，有全新式的印刷机器和电台等。柳州解放时，因临急乘机逃跑，电台、印刷设备均无法带走。

《中央日报》

该报在柳州设分销社，于献强是分销社的主任。

补：《扫荡报》

是抗战胜利前夕创办的四开油印小报，出版的时间不长。

陆荣廷时期高等审判厅片断经历

阙绳武 口述 陈显扬 记

广西，在陆荣廷统治下，司法方面虽任用法政专门人员，但不出桂系范围。中央司法部派来的，总是很快被踢回去。民元至四年，无从记忆，民四以后，广西高等审判厅长，都完全由陆荣廷任命的。规章制度，也有它的特性。

我没有学过法政。凭了高等审判厅长阙宗骥(字德轩)，是我的房族叔祖关系，从民八年到厅里学当差，一直干到民十三的年头才离去。现将经历回忆记录：

当时最高司法机关高等审判厅在南宁水闸门内马草街。民四年起由陆荣廷的军法处长阙德轩任厅长。他是前清拔贡，国民党老司法界，为陆重用，民八年他去跟孙中山当大理院长，广西高等审判厅长由他推荐黄用中接充，民九年阙回来重当厅长，民十政变与陆荣廷离开南宁。阙去后，初由叶冠生(岑溪人，前清举人，法政毕业)继任。孙中山派马君武来当省长时，派郑烈(福建人)任高等审判厅长，不够一年。民十一年自治军前敌总指挥蒙仁潜进南宁，派他的参谋长莫廷光(字藩阶)当高等审判厅长。民十二，张其煌当省长，则委何庆云(广东人)当这个厅长。不久，又是叶冠生复任。民十三年头，我向叶请长假，离开了审判厅。叶冠

生在李宗仁及其部队进南宁后，仍继续任职。

高等审判厅设书记官长一人，执行秘书长职责。下设书记官多人，分管：文牒（民、刑庭以外的往来文件）、庶务、出纳、会计、内外收发、管卷、监印、状纸科、缮校室等，候补书记官、书记官各负责一部分工作。但不干民刑诉讼案件。书记官长：民八年至民九上半年是魏继昌、民九下半年至民十上半年是阳春农。郑烈当厅长时是他的哥当书记官长。以后的记不上了。

庭长和推事：民八年民庭庭长黄用中；他升厅长后由曾贯一接任。推事王心佛、刘久逸。刑庭庭长赵树岚，推事罗章甫、韦承高。赵树岚去大理院后，王心佛接充。民九年叶冠生接厅长时，庭里人员不变动。民十，郑烈厅长兼民庭庭长，推事张谦……。民十一，民庭庭长申守贞，推事何建逵、梁轸。刑庭庭长唐尧卿，推事张君度、罗章甫。民十二，民庭庭长仍旧，推事不变，但后来张君度去上海当审判厅长。

高等审判厅等同高等法院，当时地方法院多未成立，各县置承审员就是厅的基层。所谓诉讼程序，二级三审：地方法院以及县承审为一级一审；高等审判厅及高等法院分院为二级二审，这两审，当事人双方都要到庭候审，最高法院是三审，凭由下层送来案卷审理，原被告双方不须到庭对审。司法部规章，厅长及所有人员不得与外界往来应酬，特别不许与律师往来。尤其在瞿叶两厅长任内，他们又是广西同善社的正副社长。他们在同善社举办国学专修馆。夜间上课、亲自讲课、改文稿。两厅书记官都来上学，办得很认真，不

收学费。还有外界的同善社员数人来参加。

厅里人员薪俸：民十前，厅长八百元。（月薪下同）民十起改为厅长四百元。书记官长八十元。书记官三十至六十元。庭长壹百六十元。推事壹百贰十元，候补推事八十至壹百。都由厅长决定。不知道外省情况，是否广西自定的。我从民八年开始，月领十八元，当时旧桂币十足通用。我当录士（抄写），以后当外收发、管卷、监印、升为候补书记官。再入民庭当书记官，跟推事出庭记录。后来管状纸科兼缮校室。升主任书记官。提到月领四十元。以后离去。

阙厅长很为陆荣廷信任，并认为他素来廉洁，没有储蓄。民九年下半年，加派他当一任柳州统税。由他负责，指派一位亲信人员去税局出名当局长，实际是帮他抓钱。但阙厅长见时局不定，一旦粤军打上来，难以应付，迟迟不派人去接事。厅长、局长从此结束。

当叶冠生接厅长，何庆云离任后，留下出纳会计等人员办移交，被叶扣留。追究何任在厅的前院修理花园，利用犯人劳动，贪污公款。结果，省府证明，用费已经报请核销有案，何本人已经离去，不了了之。

民十动乱中，仓西门大街的一个成衣皮货店，父子俩暴病死亡的疑案。报上登载过。叶冠生上任后，借打坐梦见阴魂报冤，将凶犯妇拘押，报请司法部检验。验出尸体喉头骨（算盘子）承现绿色。认定为中砒霜毒死。处凶犯妇杀夫与子，处以绞刑执行死刑。又粤军从武鸣败退时拉伕，民伕逃跑时被一士兵追到，用刺刀刺死。为群众扭送审判厅，被处死，用绞刑。这是在南宁见到绞刑的第二案。

当自治军时期，厅内制度松弛。我与同寮们晚上常雇轿子坐出去偏远的游艇上，打麻将、吃花酒、玩鸦片。我的薪水少，花钱多，但生财有道：我管缮校室，律师办理民刑案件，报请书记官许可后，来观卷，提出要抄缮一些案情，由缮校室估数计抄录费，每次冒估三两千字，可多收三两元，律师代当事人交费，从不计较，这是一项；在民十二年间使用林俊廷总司令发行的钞票，因贬值，厅公布收状纸费为“四币六现”。即四成钞票、六成银毫。各县乡下人来告状，购买状纸，全部收银毫，我从上缴数中捞银水，又是一项收入。如是我每月收入与推事不相上下，有时尚能多花一些。最遗憾的是，当时鸦片烟上了瘾，从此磨折我近三十年，好在解放得快，给我戒掉了鸦片。幸福地继续生活，今年逾八旬，往事回忆，不无错漏，敬希识者指正！

柳州法院早期概况

文史室

我们为了探索柳州法院之兴建及初期情况，最近去函融水询问阙绳武老先生，1984年七月卅一日来信称：①柳州法院是在柳州大火灾前数月兴建，时为民国十七年初。②广西高等审判厅（广西高等法院前身）委派来柳筹建法院的负责人是王心佛（融水人），时间是民国九年。至民国十七年来负责兴建者是谁？尚待考证。③柳州法院第一任院长是唐运龙，桂林人；第一任检查官为林公鄂，宜山人；书记官长阳新农。当时要我介绍医官，我介绍曾寿松（有名中医师）柳州人，去当医官。

我们又就地走访法院附近的云岭街程亮老先生和谷埠街宁国辅老先生，他们都说，法院是民国十七年初兴建的，因为他们有祖墓在法院建筑的范围内，迁移坟墓的时期是在民十七年头。兴建期不会错。

我们又访问了最早在法院当录士的曾宪书老先生。他现住柳江县进德乡四连村土垢屯，有儿女在市内工作，他常来往。他是民十八年到职。他说：第一任院长是唐应（运）龙，任职不到半年。书记官长江夷臣，检查官林馥玉。（但阙函谓系林公鄂是否馥玉即公鄂待考证。）第二任院长为李庆春，书记官长为王焕生，检察官林馥玉继续。秦炳焕是第三任院长，后来他被告发，他的答辩书，是叫我抄的。

至于秦炳焕被告发案情，我们走访了当事人戴福欽老先生。他住曙光西路44号。他是民国十九年进法院当学习书记，月领薪20元；学习不久，升候补书记，月领薪30元；其后任书记官，月薪40元。他与梁朝寿（百寿人），王秀民（融水人），同时到职，都当到书记官。秦院长诬指他们三人“通同作弊，有贪污嫌疑为借口，叫他们辞退。”但他们得律师们支持，收集秦炳焕十大罪状，三人联名发出“快邮代电”，向上级告发。经高等法院派检查官陈锡瑚来柳审察。秦炳焕毁灭收费收据的存查、报查联，短报诉讼费有据，被调省候用；并给以戴等三人不起诉处分。戴等三人以为继续做下去希望不大，适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宁分校第八期招生，他们同到南宁投考去了。时为民国二十五年。这是法院内部发生的人事案件。反映当时用人是听从主管官意志“任人唯亲”，没有别的任何取才标准。

回忆解放前的柳州法院

李又新 覃登试

笔者李又新，毕业于广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于一九三一年到柳州法院工作，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离职。覃登试则于一九四四年毕业于广西法专，一九四六年到柳州法院工作，一九四八年八月调到梧州高分院，一九四九年又到柳州法院工作，直到柳州解放才离职。可以说我们在柳州法院成立到结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回忆纪录如下：

一、柳州地方法院成立

柳州地方法院未成立之前，所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都由县政府兼理，由承审员经办。到一九二九年柳州地方法院成立，才有专办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机构。即办理民法和刑法案件。所谓民法是指：债、物权、亲属、继承四法。债，是规定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律。物权是规定关于田地房屋的所有权及其他权益的法律。亲属是规定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之间的关系及结婚离婚等问题的法律。继承是规定公民死亡后应由谁继承其遗产及如何继承的法律。这些民事案件统由地方法院办理。所谓刑法，是指凡

规定要处罚犯罪的法律的总称。刑事案件由法院受理的只是刑法上明文规定的各种罪刑，称普通刑事案件。其他如广西当时公布的《惩治盗匪条例》、《兵役法》所规定的罪刑，则称特种刑事案件，就由军事机关办理。

柳州地方法院

组织机构，分院方、检方两部分。院方设院长一人，处理行政事务，审核民事、刑事诉讼的裁判，对外代表法院。设庭长二人（分民庭、刑庭），院长兼一庭庭长，另一庭庭长，由一推事兼任。庭长职务是分配案件给各推事承办，如组成合议庭，庭长为审判长，审判后召集参与审判推事开评议会来确定判决。设推事若干人，办理民刑案件。以后由于诉讼案件增多，推事人数也随之增加。设书记官长一人，办理文牒及院内行政事务。设书记官若干人，每一推事配备书记官一人，负责记录、传案、整理及保管卷宗。有的书记官负责经管收发文件，或办理会计、出纳、庶务等事务。设执达员若干人，负责送达民事传票及民事判决。有警务室，设警长一人，法警若干人，负责警卫、送达刑事传票及刑事判决，并执行拘票。设检验员一人，负责检验。另设有公证处在交通方便之街道上，以利群众相互间立约公证。

检方是检察处只管刑事。设首席检察官一人，检察官若干人。首席检察官负责分配案件给各检察官及审核各检察官侦查的案件。检察官侦查刑事案件的结果，如认为被告有触犯法律行为的，即行提起公诉，将案件移送法院审判。如认为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就为不起诉处分而了结案件。院方

对刑事案件审判时，检察官要出庭陈述提起公诉的意见和理由。院方判决后，如检察官认为不当，可以提起上诉于第二审。设主任书记官一人，书记官若干人，主任书记官负责办理不属于办案的行政事务。每一检察官配备书记官一人，负责的事务与院方承案配给推事的书记官同。

柳州地方法院之下，设有一看守所，有所长一人所员若干人，负责看守在押未决人犯。设医士一人，专为在押人犯看病。因柳州没有专设的监狱，所以已经判决确定的监犯，也在看守所内执行。抗战期间，时有防空警报，为了保护人犯安全，每发出警报即由所长所员会同法警将人犯集合带领到法院大门前右方的防空洞里躲避。后来柳州要疏散了，就将所内人犯分别押送回各该管的县政府看管。

二、广西高等法院柳州分院成立

广西高等法院柳州分院是一九三七年成立的（初名为广西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法院内部也分院方检方。院方设院长一人，庭长二人，推事四人，书记官长一人，书记官若干人。检方设首席检察官一人，检察官一人，主任书记官一人，书记官若干人。他们的职务与地院各级相当人员的职务相同。高分院院方另有会计室，设主任一人，助理会计书记官二人。又有统计室，设统计员一人，助理统计书记官一人。其他缮校室、收发室人员的职务与地院同。警务室的法警属高地两院共用。

柳州高分院是第二审的法院，归它管辖的有：柳州地方法院，和雒容、象县、来宾、融县、柳城、中渡、罗城、迁

江、忻城、河池等十一县的县司法处。凡不服柳州地方法院和上列十一县司法处判决的第一审民刑案件，都可以上诉到柳州高分院。《惩治汉奸条例》案件则以高分院为第一审，如石补天汉奸案，就是由柳州高分院审判的。

高分院办公地点与地院同在一起，院内左边楼房及地下，由高分院使用。右边楼房及楼下，由地院使用。每逢星期一上午，两院人员合并并在礼堂举行纪念周。除由院长报告外，并由两院各经办人员汇报上周收结案件的统计数字。

三、抗战发生后的柳州法院

在抗战期间，当柳州防空司令部发出空袭警报时，所有两院人员即停止办公，急往法院对面山牛仔岩躲避。并将电话机带去，随时转播敌机进袭情况，使群众能够及时躲避。解除警报后，仍回法院办公。一九四四年八月柳州疏散，高地两院也同时疏散，向融县、三江方面退避。当时只顾避难，已无法办公。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溃退，抗战胜利，两院人员才迁回柳州原址办公。当时柳州的房屋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被敌人烧毁，法院原有房屋，幸未被毁，略加修理，即可使用。日寇是非常残酷的，我们回柳时沿途看到所有村庄的房屋都多被烧毁。在路上听同行的乡亲们说，日寇溃退时，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乡亲们走避不及，不论男女老少都被抓去当伕役。有年老体弱的被抓来了，挑累了，走不动的就被刺死。我们非常气愤。在我们返柳途中，当远远望见马鞍山时，大家都非常欢喜，认为就要快到柳州了。突然，前面一声巨响，烟雾冲天，秩序大乱，啊！原来是走在

前面的乡亲们中有的误触着敌人埋伏的地雷，被炸死了！敌人的残酷，是言之不尽的！

四、法院执法人员的制服

法院推事、检察官、书记官出庭执行职务时，必须穿着制服。制服都是黑色的宽袖、对胸长衫。审判长及推事的制服同一个样，从圆领到脚边有两寸宽的一道蓝边。检察官的制服是一道红边。书记官的制服是全黑色没有边。律师也有制服，也是黑色的，只是边是白色的。

五、柳州法院历任司法人员名单

柳州地方法院

院长：唐应龙，桂林人，第一任几个月离去。

李庆春，第二任，一九三一年离去。

秦炳煊，1931——1937，后由高分院吴仁才兼。

朱炳奎，1938——1939。龙锡禧1939约一年。

张光翮，1940——1948，调龙州高分院院长。

陈孔诚，1948——1949柳州解放前夕潜逃。

书记官长：江爽臣，第一任。王焕生，第二任。以后有朱永新。朱党民。秦为宁。李辑五。

李又新，1931——1937调高分院任书记官长，1938年离去。吴能膺，1938年到解放后离去。

检察处

首席检察官：

韦××第一任。莫春芳第二任。黄德馨第三任。李彩华

1940——1949年离去。

广西高等法院柳州分院

院长：吴仁才，1937——1948年离去。

展恒举，1948至解放前夕潜逃。

书记官长：李又新，1937——1948年离去。

后来者已忘其姓名。

检察处

首席检察官：卢佩铨，1937——1940年离去。

苏业富，1940——1949解放离去。

笔者、覃登试1946到职任地院推事，至1948调梧州高分院任推事。以上名单，因年代久记不清了。柳州高分院和柳州地院十之七八是广西法政专门学校各届毕业生，其余十之二、三是广西到省外学法科的大专毕业生，外省学法律而来到柳州做法官的，只是极个别的。各级法院人员的任用，一般先由广西高等法院派代，再报请司法部派署。

司法人员的工资待遇和当时行政机关人员对比，略为优厚。按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命，分为委任、荐任、简任三级。法院的推事检察官，从任职之时起就是荐任职了。有任职多年的院长首席检察官，还有晋升到简任职的。高分院书记官长也是荐任职。高分院书记、地院书记官长、书记官，则是委任职。当时在县政府任秘书职务的，还只是委任职。因此在县政府工作人员很羡慕司法人员的待遇。

六、 律师

律师不属于法院人员而是自由职业。凡是法律系毕业，

经司法行政部的律师考试合格（曾在法院任过推事 检察官的，可以免予考试）领有司法部发给律师证书的，都可以申请当地法院批准登记执行律师职务。律师可以接受民事当事人委托而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可以受刑事被告的委托为被告的辩护人。在刑事审判时，被告辩护人的律师得出庭为被告辩护。依法规定被告所犯罪刑必须有辩护人才能审判的，如被告自己并不委托辩护人，就由审判法院轮流指定一律师为其辩护人。这是律师应尽的义务。曾经在柳州高分院和柳州地方法院先后登记执行律师职务的有：王运恒（心佛）、杨树桑、余嘉谟、韦宝辉（用光）、张兆元、张毅、李汉、翟念劬、江浩、翁振翼、李恩光、卢必寿等。

住谷埠街有一位律师，抗战胜利的两年前，原告请他代理诉讼，后来被告再来委托他代理诉讼，他又受理。被法院查觉，判处他半年有期徒刑。案情虽不知其详，但知法犯法，传为笑柄。

七、柳州法院的结束

柳州法院在1949年11月中旬以后，柳州临近解放。当时在法院工作人员大为震动，无心办公，彼此见面所谈的内容都是：共产党来了、怕不怕，走不走，走往哪里？等问题。11月23日、24日、柳州高分院院长、首席检察官、柳州地院院长、首席检察官都先后潜逃了。负责人跑光了，留下的职员，也就无所事事。11月25上午柳州解放，职员也就不能不星散。看守所的所长所员也走光了，看守所成了真空。在押人犯也在这天乘机破门越墙逃走一空。到12月上旬柳州军管会

派来雍国邦同志找到法院留柳人员，了解情况，并商谈移交军管会接收之事。以后高分院由留院推事张璠、地院推事兼庭长覃登试负责将原法院留柳人员姓名册及法院遗下财产造册送交柳州军管会经收。到此原柳州法院就告结束。

附一点补充：我们又听过覃登试老者说及，在广西法专入学之初，闻学校老工友传说：法专办过一期全是县老爷来学习的班。但已忘其年月。我们再于前月去信融水向阙绳武老者访问。经获复信云：“关于举办县知事集中短训一事，依我的记忆，那事在民国十五年后。当时集中司法教育的参加者，有：黄旭初代主席的老太爷（以后被委派任同正县长），杨盟（先后被任融县、柳江县长），夏学优（被派任柳城县长）。以上概略，仅供参考。”特作如上补充。

文史室

柳州电报历史资料小辑

文史室

立鱼峰有块摩崖石刻，上面写道：“光绪癸卯（1903年）仲夏之初，由省门造电线来柳，六月八日始克告成；而庆远一役，旋于八月九日大功告竣。心焉喜之。偶值渡江登临胜境，谨就此勒石志之，以垂永久云。”1982年8月，我会就此去函宜山县政协，询问电报界老前辈，调查马其芬在庆远史迹。得何作柏、梁奕两委员复信：“关于柳州电报局历史，经走访崇富侯老先生，承告知梗概如下：

柳州电报局第一任局长马其芬，任期大约由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到光绪末年。当时局内共有职员六人，即局长兼领班一人，副领班一人，报务生四人。我（崇老自称）是副领班。因为马是我的老师，对外事务都交我办，所以人们多误认我为局长。第二任是梁式恒，广东南海人。宣统末年由何刚接替。何刚做了几个月又交给李雨轩。李是柳州人，为李春晖（字惠如）之弟。大约干了二、三年（民元至民三年）。我在李任期间，曾经代理局长职务蛮久。

谷埠街周麟生老先生对该局历史或许比较、了解清楚，如尚健在，不妨走访，当更详实。”

崇老先生亲笔写了一些关于柳州市电报局的资料，兹并附上供参考。”

柳州电报的创建

崇富侯遗稿

查柳桂交通展设电线通电时日，因代远年湮，一切证件均已损失，无从稽考。回忆当时工程委员马其芬（号鹤朋），于工竣开局通电后，曾有刻石为记一事。此记约数十字，刻于立鱼峰岩口，即花婆庙通过后岩之口，回头举眼而望，上面楼亭一座，亭后石壁间，此记载有通电年月及简略事迹。寻见此记即知当日情况。

局址：设在柳州东门城楼即“出乎震”楼中，安机通电承接来往官商电报。随奉两广电报总局来电，以马其芬充任柳州三等电报局领班兼局长职务。马系广东番禺籍人，回族，年约三十以上，北洋天津电报学校出身。

官职，分省补用县丞。

惟忆当时，大都在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度之间，正广西游土各匪披猖之际，两广总督岑春煊奉旨督办广西军务，柳州设有营务处。

局址系由道台委马平县指定的。

旋查清末光绪最后五年，宣统三年止，此时期中，地方“贼盗如毛”（原文如此——编者）“哀鸿遍地”，交通梗阻，并无外国人敢来投资办企业的事。邮电情形，在这种时期当中，邮、电无合办机会。邮、电两家都是各自为政的。

此系大略情形，聊以书奉。

一九六二年八月于宜山

柳州电报局一鳞半爪

王乃昌

余于“七、七”芦沟桥事变之次月(一九三七年八月)入柳州电报局工作。闻同事前辈谈及：柳州电报局始创于清朝末年，由县官老爷兼办；遇重大事件，摆公案审理。惜也，语焉不详。

电报局之地址，始于东楼（即东门城楼），后曾相继迁至李贞人庙（湖南会馆隔壁）、挑水巷（今曙光中路近小南路口），惟年代均无法考证。约于民国二十二、三年由当时国民党政府将座落斜阳路电灯公司旧址拨给电报局使用，从此局址始定，直到柳州解放。一九五二年局址迁今之龙城路。

电报局初期，设备简陋，人员寥若晨星，最初时固不待言，迨余进局时，上自局长下至杂差，仅十余人而已。抗日战争中后期因沦陷区扩大，电报人员相继向后方疏散，柳局人员增至两百余人。而解放后业务发展，技术进步，装用先进设备，职工人数较解放前增数倍。

电报所用机器，从最初“莫尔斯单工收发报机，”沿用至一九四二年始改用“韦氏登三柱凿孔双工收发报机，”一九四七年再改用“钻盘凿孔机，”提高了工作效率，当时可

谓一大进步矣。而解放后相继改用电传打字机及自动翻译电码机等先进设备，更为解放前望尘莫及。

一九四〇年增设长途电话，局名改为电信局。因敌机不时来柳轰炸，电信局遂迁至窑埠雄狮岩，斜阳路原址仅作宿舍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柳州沦陷前夕，柳州电信局仓促撤退，全局职工逃散，各奔东西。抗日胜利后，由前交通部第六区电信管理局总工程师施仲阳率领无线电员工数人来柳州斜阳路原址复局，疏散各地之人员相继回局报到。

抗日时期三易局长：由黄治才而叶松如而麦荫多，均广东人。抗战胜利后由施仲阳（上海人）而陈可贵（广东人）。

业务长、领班的老一辈有崇富侯，一九四〇年后，敌机昼夜空袭，回宜山家乡休养。一九三七——一九四二年，海叔举任业务长。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颜仁昌任业务长。一九四三——一九四八年业务长改为报务课，唐田璧任课长。一九四八——一九四九解放蒙启明任报务课长。

解放后，一九五〇年，柳州邮局、柳州电话局与柳州电信局合并，局名改为柳州市邮电局相沿至今。

解放前，电信局之局长（最高主管人）及业务长（最初称领班、中层主管人）或课长，抗战以来，均无副职。此其特点之一也。人员薪金（工资）因工种不同而异。余虽曾任人事、文牍、文书（兼任）因制度不健全，统计阙如而无法回忆。只记得每年按考绩加薪。分上、中、下三等；考列上等者升二级，列中等升一级，下等者（成绩最劣者，此等人极少或无）不升，由主管人员考核。薪金在140元以下者每级10元，140元以上者每级20元。年终奖金按年资（即工

齡)核算。每滿五年加發半月薪數。此其特點之二也。電信人員分：員、佐、差、役四等，前二等除犯嚴重錯誤外，雖最高主管更替與之無關，不隨主管去留。此之謂“鐵飯碗”也，而後二等（差、役）則非也。此其特點之三也。電信人員重在技術，有中央、省、本單位培訓者，均須考試及格始能錄用及轉正。各級主管人員均為本企業專長人員，此其特點之四也。

柳州电话局的创建及其沿革

朱继珍

建 立 机 构

柳州杨蓬侣先生奉省令委派筹建柳州电话局工作，自1925年冬开始建立机构，开展工作。其组织成员如下：杨蓬侣任主任，技士杨恩，领班应克，电话生（后称电务员）、卢秀（女）、李翠容（女）、董显君（女）、涂焕文（女）、卢德馨、朱继珍、霍子贵、吴冠球、李杰、黄国忠、肖锦中，文牍员朱午迟，财务员刘俊英（女，杨蓬侣之妻），庶务兼收费员李凤楼，工目陈英全，线工谢金廷等四名（有三名记不清姓名了）。除炊事勤杂人员外，全局只有员工22人。局址设在东门城楼，河南设一分处，处址设在车仔行（今前进路15、17号）是临时租用刘用廷的房屋一间作处址。鱼峰马路建成后，于1928年间，分处即迁往鱼峰路新建的楼房，该楼房在柳州沦陷时已被日寇破坏，即今牛奶门市部地点。

设 备 安 装

我局在机构组成及局址确定之后，即分别进行机线设备安装工作。总局及河南分处，各装设瑞典磁石式100门人工

交换机一部。杆路采用杉木杆，八线木横担，波形隔电子架设。杆路走向，根据业务预测用户分布情况，确定在北区建立木杆两路：一路由东楼西面引出，木杆设于旧城基上，至大南门转至沙街一带（今柳江路）；另一路由东楼北面引出，沿旧城基上设立电杆至第四中学（今文化大院）对面，再向东西两方延伸，东面经粤东会馆前至公医院（今湾塘路地区专署，西面经县前街（今中山东路）庆云路（今中山中路）至苏杭街（今小南路）。另于粤东会馆前空地及对岸水南村，设立飞河杆线一路，架飞河线三条，作两岸交换机中继线用。南区杆路，由河南分处向北引出至鱼峰路口，再分东西两方延伸，东面经驾鹤东路至水南村飞河杆相接；西面经驾鹤西路转至谷埠街。两岸共立杆木约八十余根，杆程约3.2公里。用户话线用1.6公厘径镀锌铁线，作单线式架设。话线是随用户装机时陆续架设，线程多少未统计，这是市区杆线设备概况（长途杆线不计在内）。

接管长线

柳局在交换机装竣后，先后接收了柳庆区属长途线路多处，计有柳州至柳城；柳州至长安；柳州至大塘、宜山、怀远；柳州至石龙、武宣；柳州至鹿寨、榴江。并在该县镇设立电话通讯处。

宣告成立

柳州电话局筹建工作，于1926年初已告终结，于是正式

宣告成立。名为柳庆电话总处，并开放营业。市民闻知极为高兴，争先恐后纷纷申请安装电话。1926年底，北区实装计费用户话机达70余户（不包括中继线、长途线、局用机等占号），北区总局形将满装，南区总局也装了计费用户20余户，这就改变了柳州千百年来通讯靠人奔走传递、或书信往来的落后面貌。对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值得人们庆幸难忘的一件大事。

电 话 收 费

用户安装电话，除话机由用户自备外，所需工料等费，按实用工料数量计算收取费用。电话月费，自通电话月起，每月收电话月费五元。初时用户与局属各县用户通话，不另收长途话费。自1930年中收费标准重新修改，除装机费不变外，电话月费改按甲、乙、丙三类。无营业性住宅用户属于甲类收费五元；机关、团体、学校、商店属于乙类收费七元；酒旅店及公共场所使用电话较多者，属于丙类，收费九元。长途通话，以每三分钟为一计算单位，不足三分钟者，按三分钟计算，每单位收费二角，加急加倍。如对方受话人没有电话，须要局方派人传呼来局接话者，每次收专力费一角。长途用户需预交长途话费押金五十元，即可通话，月终按实际通话次数结算一次收费（不包括部办的长途话线）。销号时押金退还。

建 筑 机 房

由于业务的发展，人员机器不断增加，总机由原来一个

坐席(100门)已增至三个坐席。东楼房屋窄狭,不敷使用,经报准利用东楼戏台地点建筑三层楼房一幢,于1934年秋建成,随即迁入新址办公。机房设于二楼,三楼作职工宿舍用。

开办电话讲习所

柳局在接收区属各县镇长途线路后,人员缺乏,于1934年中,在柳开办电话讲习所,主任满季颖兼所长。聘请杨斐然为教务主务,教师由局技术员陈起源兼任。所址设在二圣庙(今解放北路40巷58号对面)。在柳招收具备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学生40余名,进行培养,学习半年,毕业后分派到各县电话处工作。

抗战措施

自芦沟桥事变之后,我市不断遭受日寇飞机空袭,飞机场及市区房屋,遭受炸毁不少,居民死伤很多。为保卫通讯安全,进行必要的防卫措施。主任卢德馨决定在我局屋后空地,建造一个可容纳廿余人的防空洞,以备职工躲避。又在驾鹤山半山酒店旁边及小山(现一中广场南边)修造岩洞各一个,将河南两部总机分装于两个岩洞之内,以保护机器和值机人员的安全。并指定专人负责传达防空情报,监视敌机动向。如有情况,随即报告防空指挥部,以便及时发放空袭警报,疏散市民,指挥作战,尽了通讯人员应尽之责。

话局被炸

1939年7月22日,接前方监视哨传来情报,发现敌机九

架，由雷州岛向西飞行，即转报柳州防空指挥部及专员公署。接专员在电话指示：鉴于上星期日（7月15日）柳州公园及映山街大树脚一带，遭受敌机轰炸，居民伤亡很多，命我局人员在防空警报发出后，应该疏散郊外躲避，以免无谓牺牲。想我局在过去警报时，机房的工作，都是交由主任卢德馨和班长朱继珍两人接管，让职工疏散郊外躲避。当天专员命我们在警报时疏散离局，如果照过去坚守岗位，有违领导指示。离局又恐耽误通讯，一时难以决定。两人商量之后，才想出解决矛盾之办法。即用交换塞绳将北区与防空有关的重要电话，如首长及公安消防等电话，放进河南总机，由河南总机值机员负责接转，这才放心离局。此时敌机已进入我市警报范围，发出空袭警报，我俩人即锁门逃避。卢德馨骑单车向铜鼓岭盐水冲一带躲避，朱继珍向窑埠疏散。当船只将到南岸时，又发出了紧急警报，不能再走了，只好在河边大树下躲避。一会儿机声隆隆，敌机已入我市上空，盘旋一周，投下炸弹多枚。遥看东门一带，烟尘飞扬，话局房屋为烟尘遮盖看不见了，心里十分着急，即想回局观看是否被炸。当时警报尚未解除，等到敌机离开市区时，即取出通行证袖章带上，雇船回局。登岸时看到东西房屋（即42工厂仓库）被炸燃烧。进入东门城，又见东门街唐培初的房屋被炸倒塌。电话局两扇大门，被震倒，二楼机房三部总机全被震倒，砖头瓦片木板压在机上。西北角房屋被炸塌一角，由三楼崩至二楼约丈余高，屋角引入电杆炸成两段，线条断在地面乱如蛛网，见了十分痛心。到局后观察，发现一人坐在芭蕉树下，年约四十多岁，对他询问检查，在他身上搜出一

面方镜，约2×3吋大小，怀疑他是汉奸，用镜子给飞机指示目标，把他抓送警察带去审问。解除警报后，我局职工陆续回局，晚上召开职工会议，拟订抢修计划，次日按计划分成机线两班，进行检修。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把机线全部修复通话。损坏部份房屋，亦即购料雇工修理。这次被炸损失很大。但是当天如果没有专员指示疏散，那么卢、朱两员的生命存亡，就难以想象的了，说来也是不幸中的幸事。

疏 散 逃 难

1944年11月间，日寇快要到来，我局奉命疏散罗城。全局职工每人发给疏散费16元，局方号召职工随局前往。并说局里还有点存款，可供职工伙食需用一年，希望大家放心同去。但有多数职工，由于家有老小牵累，人口众多，随行困难，各自四散回乡逃避。随局押运器材前去罗城的有主任王祥禄，技佐杨祖庆，会计朱思明，事务员王祥甫，话务员梁进华、赖有才、杨普罗、陈志荣，线工冯宗泳、谢庆奇、何义瑄、庞百贵、冯亮等十三人。职工家属同去的也有十多人。到了罗城不久，再迁到银村定居。由于局方只供应职工伙食之需，有些家庭人口多的职工，以本人一份伙食，供应全家食用，生活就发生了问题。有个别职工，逼着去搞点小买小卖度日，过着悲惨的生活。又如杨祖庆一家八口，靠他一份伙食养家，其生活之苦，不言而喻。因人地两生，告贷无门，被迫跑到三防专员行署，要求尹专员帮助。得到尹专员的怜惜，同意收留，派他做些工作，生活才勉强维持。因我没有随去罗城，对疏散罗城的情况，了解不多。上述的

事，是柳州光复后，杨祖庆对我说的，特代纪录，留传于后。

恢复营业

1945年秋柳州光复了，我局于十月间，由罗城迁回。离局职工先后陆续回局报到，清理局所及街道残存杆线。河南分处楼房被破坏全部倒塌，总机无处安装，暂在鱼峰山北麓戴钦墓东侧，建造临时房屋一间，装设总机。经过三个月的修理和安装工作，到了1946年2月中才恢复营业，接装用户。经过一年时间，河南总机100门已装满，北区总机已装有用户二百三十余户，因木杆高度所限，当时每杆已装有线担十八条，不能再增担挂线，还有很多用户申请装机，都装不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为了满足用户需要，当时筹划设装电缆，扩充容量，将原单线式改为双线式，以提高通话质量。

机构改革

柳庆电话总处于1928年3月，移交陈建平（陈杰）接任，改名柳州长途电话筹备分处。不久陈建平去南宁建厅，主任由覃之英代。1931年中，广西省电话管理局成立时，柳州长途电话筹备分处改名柳州电话局，本局所属各县镇电话通讯处，亦改名电话营业处，改由省话管局直接领导。1937年4月，柳州电话局与柳州电报局合并，改名柳州电信局电话营业处。这是因为省话管局张绍文局长去职，省话局交给省电信管理局梁式恒兼任，由于上级机构改变，故柳州亦随之变化。到了1938年间，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在柳州窑埠

(今卫校内)召开了一次通讯会议，有关部门都派代表参加，我局派卢德馨、朱继珍两人出席开会。会议内容，主要的是长官要求各通讯部门，要加强领导，密切联系，协助部队做好战备工作。会后回局汇报，局长听了汇报后，感到报话事务繁重，而且分散几处，鞭长莫及，向省管局汇报请示，省管局同意报话分立，并派卢德馨为柳州电话局主任，于是就分了家。直至柳州解放后，1949年12月，柳州报话两局，又再次合并，名柳州电信局市话股。

“防奸”组织

1949年2月，柳州电话局接省话管理局通知，为了保护局所安全，要柳州局组织一个“防奸”小组，指定主任王祥禄为组长。组员四人，由组长选派充任。当时王祥禄通知黄天蔚、朱继珍、文定周、梁镇潮等四人，到办公室谈话，将省话局通知传达后，就说组员四人，由你们四人兼任，即报省话局核备。“防奸”组成员，每人月支給津贴四元。“防奸”组成立后，那时桂北地区共产党地下人员非常活跃，柳州至长安电话杆线时遭破坏。最严重的一次，竟锯断电杆木十几根，剪断话线约一公里多。王祥禄非常着急，加派技士卢德馨长住太平中站，负责抢修。同时又请公安局派出武装警察五名，分住本局及河南分处，日夜轮流守卫。并在局前后及河南分处周围设置铁丝网栏，不许闲人擅入。规定每晚十一时后，非有特殊之事，不许随便开门出入，这是“防奸”的措施。

历 任 领 导

本局自创建起至柳州解放时止，历任领导人员，按先后顺序如下：杨蓬侣、陈建平、覃之英、吕凤山、陈光慈、王复畴、满季颖、谭阁绳、黄治才、卢德馨、王祥禄等合共十一人。

关于《柳州电话局的创建及其沿革》 的几点补充说明

卢 一 民

柳州电话局前辈朱继珍老先生所写的《柳州电话局的创建及其沿革》拜读后，就我所知道的一些历史实况，作几点补充说明：

（一）李杰又名江火生，家住磨盘街（现罗池路十六巷）。一九三一年，先父卢德馨为领班时，与李杰以街邻友谊，荐充临时电话练习生。后因酒后当班失职，被解雇，非最初时候的电话生。

（二）柳州电话局开办时最初设柳庆长途电话筹备处，筹建完成于1926年初，宣告成立柳庆电话总处。后裁并入柳州电报局，改称为柳州电报局电话营业处。抗战初期，卢德馨奉命重新组成柳州电话局，后改名广西省电话局柳州分局。解放前夕广西省电话局撤销后，改名广西省柳州电话局。

局址设在东门城楼上，三楼是机房，安装电话交换机（即总机）和领班处（兼领班宿舍）；二楼即供奉关公塑像的大殿和其他诸神塑像；两旁偏殿为办公厅、会客室、主任室、技术员室（兼宿舍），会计室、收费室。平日皆以木板屏障间隔塑像于内，每年旧历五月十三日单刀会、庙会时，

打开屏障，让群众祭祀，事后照常围封。城楼边缘楼房为电务室及员工宿舍。楼门沿阶各小菩萨塑像亦用木板围封于内，分作传达室、员工宿舍。城门内戏台作员工宿舍。电线总杆设在城楼西端城墙上。

一九三三年因当时电话用户增多，设备、人员增加，东门城楼已不敷应用。扩建电话局，也是发展柳州建设，时代变迁，菩萨靠不住了，群众觉悟提高了，拆戏台扩建电话局，大家也没有意见。由满季颖呈经上级在戏台原址兴建类似方形的三层楼房一座，于次年秋建成。

（三）柳州电话局被日机炸毁的情形和处理善后经过，忆述如下：

在柳州电话局恢复成立半年后，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敌机对我市进行毁灭性的轰炸。特别是大树脚（现映山路北端中间）公园一带，树木成荫、人多躲避的地方。事后柳州专员公署作出以下措施：此后，凡遇空袭警报，通讯机关员工，可全部疏散到山岩或郊外避难，勿庸留人看守总机。因为以前每当防空警报发出后，卢德馨总是让值机话务人员跟局里同事们一起疏散出去避难，他自己和领班朱继珍留局当班，转接防空情报（局里两部磁石式瑞典有塞绳电话交换机150——200门，准确数字忘记了），维持于敌机在市区上空投弹时的通讯联络。共同抱着与局和总机共存亡的决心，尽忠职守的忘我工作。

当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防空情报是敌机九架由粤省向柳州空袭的动向时，鱼峰山顶和马鞍山顶，挂一个灯笼的预备空袭警报信号，要人们尽早的疏散。这时卢德馨预料

到市内又会遭受一场大轰炸，因而几次才劝走平日不出去躲避敌机的继母李冠莺，到驾鹤山乡村电话总机山岩去躲避。接着空袭警报的汽笛声响，鱼峰山、马鞍山同时悬挂了两个灯笼，表示紧急疏散。

因卢德馨身负两个局处的主管重任，今天仍然在接到专员尹承纲的电话指示后，才不得已与朱继珍锁上局大门出去。因朱继珍没有自行车，他过河到窑埠去躲避。卢德馨是第一次在警报后离局。为了方便联络指挥起见，他随身携带军用皮盒单机一部，乘自行车向北郊外去。这时居民拥向北郊外奔走。人多路狭，走得很慢，当行到水东岭（铔品厂附近）时，已闻紧急警报的汽笛声响了，（按防空情报的规定两个山顶悬挂的灯笼同时降下了，）这时已是下午时候，日机九架从东北方作人字队形侵入市空，在市区上空盘旋一圈后，投下大量炸弹。当鱼峰山的柳州防空指挥部接到马鞍山顶的广西第六十三防空监视队对空监视的瞭望哨报告：东门城楼附近被炸。柳防总机随即通报河南总机、乡村总机，接着他们即对河北总机摇叫，均叫不出来。因卢、朱二人离局为时短暂未及通知河南和乡村两处总机，是他们二人不注意联络，延误，致使两个局处的员工事前不知道河北总机已无人看守。在乡村总机岩洞避难的，有我的继母和弟妹，他们认为父亲照常坚守在工作岗位，这次遭受伤亡是无疑的了，都悲痛起来。当市区被炸不久，卢德馨走到水东岭上，用单机，将话线挂在广源乡通回龙村（即白沙村）的话线上，与乡村总机联络通话，当时乡村总机值班话务员黄彬（今已去世）

向卢转报马鞍山防空监视队的瞭望报告，说东门城楼附近被炸的消息，黄彬一面转告我继母、弟妹说：“卢伯”安全无恙现在白沙村附近野外避难。（卢德馨从到柳州电话局以来，同事们很少称呼他的职称，其实他虽二十六、七岁，一般人对他就尊称“卢伯”，而习以为常，即使父亲与他们通电话也说我是“卢伯”，后来他调到桂林省局及奉命出巡全省各地电话局，电话营业处，同事们亦多称“卢伯”。）当继母听到这消息后，才和弟妹转悲为喜。如今每与继母谈及昔日情景历历在目。继母李冠莺解放后为柳州美术工艺厂刺绣老技工，她今年七十六岁，早已退休，现与全家老少四代共二十余口人，正为曾孙们绕膝欢度晚年。

当卢德馨得知东门一带被炸的消息后，内心不安，不顾警报尚未解除，即返回向城里走，到北门城口时，汽笛一声，解除空袭警报，（鱼峰山、马鞍山悬挂起一条长的黑布——解除警报标识。）他抄走近路赶到东门，此时朱继珍也同时回到，看到局的两扇大门被震倒地下，二楼机房设备和两部总机全被震坏，震倒。狼狈不堪。卢德馨对于电话局仅重建半年多的时间，竟被敌机炸毁西北角三楼二楼，毁坏全局建筑物四分之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而总机、设备被毁，总杆断成两段。他遭此沉重打击，悲愤填胸，心如刀割。

卢德馨沉着应变处理善后。一面将局里原住在三楼、二楼的人员、家属作好临时的安排，一面将两部总机加紧整理置放原处。

当晚卢德馨召开员工会议，河南机房除留值班话务员一

人外，一律到河北局里参加会议，商讨处理善后工作。

会议决定将全局人员除河南机房留一个话务员值班外，一律回局参加抢修。分两个班：一是机房设备，总机，内线修理班；一是外线，更换总杆修理班。因关系全柳州电话通讯，得到柳州专署、防空指挥部、县政府等上级机关的支援，电报局、县乡村电话处亦派出大批同行人员来协助。

卢德馨带头日夜进行紧急抢修，（除空袭警报避难时间外）各人不畏酷暑，辛勤工作，经过大家努力，仅用一个星期时间，终于换上一条长15公尺尾径25公分的杉条木新总杆；所有机房设备，两部总机和被炸断的全部用户外线完全修复通话。在这段时间里，员工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最艰苦繁忙，再遇到敌机空袭炸断街线时，还要抽出一部份人员去及时抢修通话。

（四）自一九四七年后，当时柳州电话局称为广西省电话局柳州分局，后至解放时，局里仍设有工务处、领班处、事务处，电务室工作改由领班兼管，人事多有调动。朱继珍是工务处负责架设工程的技佐。由于市内电话不断的增加，话务工作繁忙，话务员有王善植（女）、杨普罗、徐万钧、庄玉刚、卢一民、曹礼全、梁进华、梁转兴（女）、杨竹新、刘寄丰等，电话练习生有麦汉贞、冯瑞芝、冯奇娜、廖铮、余小庄等五位女同事，可惜还忘记部份值机同事的姓名了。

桂林广西省电话局还调派卢德馨、梁庆先两位技士来柳州工作。

有关上面这些补充说明，是根据先父卢德馨生前遗留一

些笔记和我亲身经历及见闻所回忆。

卢一民

写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

柳州县乡村电话的创办及其 成立后的十年

卢一民

(一) 创办乡村电话的义意及规划

一九三二年，广西省政府为使全省九十九个县，每个县及其每个乡、镇与邻县、乡、镇电话的畅通；南宁设省营广西电话管理局，柳州、桂林、梧州设有省办的广西电话管理局。同时在商业繁盛的交通要道，如：贵县、芦圩、迁江、大塘、河南（柳州的河南）、长安（今融安）、富禄、石龙（象县属，金鸡石龙）、桂平与贵县交界的桂贵石龙、桂平、玉林、龙州、鹿寨、榴江、荔浦、平乐、八步、蒙山设营业处（蒙山处后并入县的乡村电话处）。负责电话通讯和话传电报（简称话报）营业，为政府机关及工商各界服务。

因此举办各县的乡村电话，（即县办电话，以期造成全省有线电话（话报），通讯网。

广西乡村电话以柳州为试点，培养一批有线电话的技术人材。一九三一年开办柳州电话人员讲习所。由柳州电话局主办，局主任满季颖兼所长，领班卢德馨（笔者的父亲）

兼磁电学、电池学教师，领班陈文鸿兼教师；技术员 陈起源、陈启权也兼任教师；另外聘请上海厦门大学理工系毕业的杨维章（字斐然，雒容县洛埠人），任教务主任；聘请省四中学军训大队长诸葛曙兼军训教官；局里文牍员黄静山老先生兼公文程式老师；至于事务工作皆由局里人员兼理。有部份教职员，已忘其姓名。上述满季颖、卢德馨、陈文鸿及以后调来柳局任技佐的杨祖庆都是由广西省政府公费选送上海中国电气公司学习三式电话（即磁石式、共电式、自动式）技术，回广西不久的共七位同学，其余三人均已忘记。讲习所在北门内城脚二圣庙开办。

学生，有由各县选送来的，有由各电话局（处）在职人员带薪受训的，也招收部份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力的学生，经考试取录近五十人。虽然只限于招收柳州属各县员、生，但因满季颖是荔浦县人，陈文鸿是蒙山县人，通过他二人的关系，如荔浦的满福永、满福润，蒙山的何如兰、何如南，一并录取。学习半年毕业后，回归原来的局（处），由县来的回各县，招考来的分发到各县去，为各县开办乡村电话工作。

那时的柳州县管辖今柳州市与柳江县。柳州县是一九三七年才改称柳江县，为便于记述，下文仍称柳州县。

一九三一年县长陈春光，为加强地方建设，设立柳州县地方建设委员会。聘请本县热心地方公益的老前辈为委员，高成忠（字景纯）老先生任会长（均义务职）。建委会认为卢德馨具有电话专门技术，年富力强应选他担任柳州县乡村电话处主任（仍兼话局领班），负责创办本县乡村电话。斯

时他年仅二十七岁。

（二）组成机构人员、设备：

乡村电话处设在县财务局（今柳新街日杂公司）二楼。按编制，设主任一人，话务员三——四人，由卢德馨推荐在柳州电话人员讲习所毕业学生：刘家葵（进德乡人），熊继模（成团乡人），陈国栋（本城人），柯传泽（广源乡人）充任。柯专责外线及修理工作。用柯传源为事务员（负责文牒、财务、庶务工作。巡线工卓桂廷、蒙钧廷二人，杂工韦志德（六道乡人），厨工吴启华等组成柳州县乡村电话处。报经县府备案。

组成后并经县府第四科（管理交通建设）会商，与有关人员拟制总机房的设置及一切材料配件的采购及架设施工计划报建委会、县府备案。即向沙街（今柳江路）广益、人和两家五金店（当年轻此两家）订购瑞典最新式产品“无塞绳30门桌式电话交换机（磁石式）一部及瑞典磁石式电话单机（桌机、挂机两种）。同时订购电杆杉条木。

（三）安装架设施工情况

由于卢德馨兼任电话局领班的人事关系，得到电话局以及电报局同行，在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援；尤以电话局满季颖、陈文鸿、陈起源、陈起权他们除在设计、技术、人员、工具方面的援助外，还亲自参加机房设备、总机的安装进线、总

杆、二号杆、河南北两岸的飞河线的架设等最重大、艰苦的工程；另外还从局里派出对外线架设最富有经验的师傅雷启林等人参加施工。

所有架设的各项工料费用，属于县的由县款开支，属于各乡镇的由各乡镇自行筹集，解送县地方金库备用。

当时城内各街道路面，不许随意破路种植电杆的实际困难，并为节省架设费用起见，先征得电报局、电话局同意，所有城内各机关、乡镇公所及通往郊外话线附挂在电报局、电话局的报、话专用杆上。

为了各乡来城人员及外界人士与各乡通话方便起见，在金库警卫室安装一部瑞典挂机作公用电话，免费使用。

为了便于县长兼民团司令对各乡镇发号施令，在县长室增加一部电话。又为节约工料，在一个号牌内安装两部或三部话机共一条话线。如城西镇公所、广源乡所、回龙村所，他们三个用户摇叫总机为一长声，总机摇叫他们则：城西二长声；广源三长声；回龙为四长声以资区别，而利于传达县令，通报，代电，话报等工作，在一个时间里传达到几个乡镇了。至于其它共线各用户摇叫均按此规定，以示统一。

飞河线测定于河北五显庙码头覃连芳大楼房侧、河南龙头石上面河南警察分局门前高坡上（今滨江饭店对面）。电杆用15公尺长，20公分尾径杉木，种入地2公尺，用八号线架设两条线。接通两岸然后通往各乡镇电话。

架设各乡电话，首先勘察测量线路杆位。电杆一般为五公尺长，十公分尾径的小条杉木，用五号小瓷瓶（ $1\frac{1}{2}$ 寸）

十二号线。通往各乡话线有沿公路，有经乡村大路或小道绕山过岭。均植专杆。

卢德馨在带领员工架设洛满线时，在新圩——洛满中途跌伤左膝部，晚上回住地敷药后，第二天带伤继续工作，鼓舞了群众，更加积极，完成县处总机、县府及所属机关与有关机关的中继线，以至全县的：城东、城中、城西、滨江、屏山、广源、平川、同德、里雍、白沙、六道、大荣、成团、三都、里高、盘龙、水源、百朋、沙河、镇西、嘉禾、小山、思贤、文笔、飞鹅、进德、乐山、中团、穿山、南强、洛满、流山、土博、福塘、长宁（乡公所设在新圩）等三十五乡、镇和回龙村（广源乡属）电话全部工程。

其后为确保各乡镇电话畅通，加强管理，呈请县府先后批准在思贤、中团、洛满、六道、三都、成团等六个乡公所内设立电话分处，各置瑞典五门有塞绳电话交换机一部（即小型总机），将附近各乡的电话接入。

同时也接通了本县与邻县的电话：东南面的中团分处经穿山、石龙通武宣县城；东北面由广源乡经鹧鸪江、洛埠通雒容县城，再经雒容通鹿寨至榴江县城；南面拉堡分处经百朋凤凰通来宾县城；西南方面由三都分处经里高至大塘，思练至迁江县城、再延长到芦圩、宾阳、可与省会南宁通话；又由三都分处经里高、大塘接通忻城县城；西北方面由洛满分处接无忧通柳城县城（现凤山），也可由广源接长塘、沙塘通到柳城县城；又由洛满分处经流山接山岔通宜山县城；北面可利用省营柳州电话局长途专线直通长安至融县县城（公务通话可免费，因我处由洛满通柳城县城的线路经常借给柳

州电话局作长途电话营业之用)。

仅仅两年时间，总计完成了全县三十六个乡镇(村)，以及各邻县的相接话线共计长达五百九十余公里的有线电话架设、安装工程，也完成了广西省政府所规划的本省境内县与县的有线电话、话传电报通讯网的重要使命，也就是我们广西省首先创办的县乡村电话处之一。

(四) 关于变革情形和卢德馨辞职他调

原来本省各县乡村电话名称均不统一，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有的县称为乡村电话管理总处，主管人称为处长。有的县称为乡村电话管理处，设主任。有的县称为乡村电话处，设主任(如本县)。有的县称为乡村电话通讯处，设管理员。

本处在一九三七年当省府将柳州县改名为柳江县时，按省府统一规定，各县乡村电话一律称为县乡村电话通讯处，主管人称管理员，增设佐理员一人，协助管理员负责技术，工务工作，话务员名额以各县实际工作需要，按电话交换机大小(即用户多少)，分处多少个，由县自行规定，事务员一人，线工亦以工作需要由县规定人数，所设杂工、厨工各一人不变。至新增设的佐理员一人，由卢德馨推荐在上海时的同学陈文鸿充任(曾任柳州电话局领班)，事务柯传灏后因另有工作他往，请委龙济生接替，未久龙以年老辞职，又请委派黄天爵接充。

后来因抗日军兴，部队需要大量通讯人材，前柳州电话

局主任满季颖①调到桂林!广西省电话局任技士,兼任第五路军通讯兵团教官主任,通过他和卢德馨、陈文鸿的同学关系,陈文鸿、刘家葵、熊继模、陈国诚、柯传泽等五人先后到通讯兵团任教官或部队任技佐、技术员,不久,卢德馨又请满季颖保送处里年仅十余岁的勤慎好学的杂工韦志德到通讯兵团受训,韦毕业后由通讯排长、连长、营长、升至副团长。

佐理员陈文鸿去职后,请委曾任通讯排长的吴桂生接替。随着原有人员大都调动离职,全县六个分处,每个分处需要话务员,线工兼杂工各一人,因此处里人员也作了大量的增加补充,新请委用的话务员男女青年都有,他们是黄汉高,王芝云(女),于华秋、梁镇潮、黄庭椿、韦秉廉,刘淑慧(女)、黄彬,钟其光(钟以后也到桂林在绥署交通处任处员职务),张学礼,李树群、杨广福等人。(杨原系柳州电话局工人)卢德馨对他(她)以耐心的教导,使他们实地的边干边学,以老带新、学习对总机,单机,架线维修初浅的技术知识,以便派到各分处独当一面工作时,遇到机,线故障不至束手无策;至于派到各分处的话务员,线工他们一般以三个月或半年轮换一次,回县处或另去其他分处,藉此增进县处与分处,分处与分处之间相互了解情况,利于同事间工作协调,因事隔数十年、平日接融较少的人、也就难以回忆了。

对三十门总机的附件、无绳塞,作了革新代替;因该总机的无绳塞子原件是用胶电木制成,使用时间日久,就会磨损,控制失灵,在购入原机时无多余配备的情况下,经大家

共同研究，改用角质（即牛角）仿造成功，使用性能相同良好，因此得以大量补充配备，此事曾得到县政府的赞赏。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与需要，一九三九年初省政府令派卢德馨为柳州电话局主任，重新组成柳州电话局，省府又重新恢复组成广西省电话局，作为全省各地电话，电话营业处的主管机关。后来柳州电话局改称为广西省电话局柳州分局从而结束了柳州自开始有电话以来的十多年，河北河南两岸电话分开管理局、处不相统属的局面。从此由卢德馨一人负责两个机构任务。

当时的柳州电话局组成、机构、人员摘要叙述：局主任下分设工务处，领班处，事务处，电务室。工务处负责架设工程的技佐是张维贤，后调桂林广西省电话局任技士、机务主任（今在南宁广西邮电学校任工程师职务）。负责修机的技佐有杨祖庆，文定周二人，（杨祖庆解放后病故、文定周久无联系）。领班处负责机房话务管理的领班 朱继珍、庄严、许荣森三人：朱继珍解放后继续任职，退休后 健在柳州；庄严退休后今年夏天去世；许荣森解放后去世。

这几位前辈，都是卢德馨的得力助手。事务处文牍员黄良，会计员刘炳荣，收费员李凤接，是从柳州电话机构开始的老收费员，后来又将出纳、会计、庶务分开专职人员。领班领导的电务室，设电务员一人，专管话传电报的收发和翻译。全局员工共计四十多人，笔者已多数记不清了。

抗日时期，增设有柳州防空指挥部，到一九四〇年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又从曲江迁驻柳州，因我局、处还兼负军事通讯和防空情报的传递，任务更为繁重。

电话、话报营业，为工商业服务也很重要，特别在抗战期间，物价变化无常，电话、话报起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作用。电讯传递市场各行各业的信息，“信息灵，百业兴”，说明它对人民生活与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在卢德馨统一负责的情况下，使他对柳话局和处的话务员得有调剂的优越条件。因县话处的话务员任务不繁，值班不忙，可以作为训练技术员的后备人员；柳话局话务员的任务重，值班繁忙，在需要补充增员时，由县话处的话务员择优过渡而来，可以驾轻就熟，以免新任到来的话务员生手，还得见习一段时间，才能正式当班。调动手续由两个不相统属的机关按人事规定办理。

卢德馨曾由县话处过渡三名较优的话务员增补到柳话局来，他们是于华秋，派到河南机房值班，河南机房就是将原来的河南电话营业处改成，派一位领班在机房管理。梁镇潮、黄庭椿二人派在河北机房值班。这时还照顾一个因家庭生活困难的县话处事务员黄天蔚兼理柳话局文牒员，（用黄良名字上报，兼职兼薪解决他的经济困境）。

抗战时期，由于敌机不断的空袭，为了加强对电话通讯机关、总机和机房设备的保护、避免技术人员的无谓牺牲，卢德馨呈报县府批准在驾鹤山近北面半山酒店处开劈一个岩洞，将县话处河北总机及机房设备迁入岩内安装，就是整个县话处全部迁到岩里工作了，这个岩洞虽然地势不太高，但可看到河北市区，尤以沿柳江河一带的面貌，还可以住部分人员。这时候县府办公厅已迁到驾鹤山半山脚下岩里办公，其后又迁到柳邕路香山慈小后面岩洞去。

随后卢德馨又呈报省电话局批准，在河南县二中（现市一中）广场南边小山上劈大石岩，将河南总机及机房设备由鱼峰路迁入安装。所有局里重要器材，物资也疏散到岩洞保护起来。遇到敌机空袭时卢德馨才随同局里人员连同值班话务员一起，将局大门锁上，用局里自备小船渡河进岩避难。

此后，市区遭受日机狂轰滥炸，三处岩洞的值班人员及其他员工均安全无恙，人机俱存。在空袭警报解除后，卢德馨都亲自带领员工，分头全力以赴投入紧急抢修线路，得在很短时间内，使各军政机关的电话即刻修复畅通，一般用户随后修理，曾受到长官部、专员公署、防空指挥部省电话局、县政府等上级机关的嘉勉。

此时佐理员吴桂生辞职，卢德馨请委曾在部队通讯连有通讯技术的江瑞成接替。

卢德馨于一九三四年春将全县各乡镇（村）和县府及县属机关和有关机关的中继线的电话架设畅通竣工后，趁奉调南宁广西电话管理局参加安装自动电话时，呈报县府辞职，未得允许，着仍兼主任职务，薪金照发；为此他将处务交由话务员刘家葵代理，遇重要事务用长途电话联系，必要时通知他由南宁赶回处理，为时一年整，这是县府对他的信任和优待。

一九三五年卢德馨在邕工作完毕，奉调回柳州河南电话营业处为管理员。

卢德馨由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整个十年中，兼任县话处主管工作，经历更换了陈春光、张春霆、李荫唐、杨盟、梁晓钟、朱瑞元、萧劲华七任县长，按照当时惯例每当

新县长到任后，卢德馨均具呈辞主管职务，而未获批准，均勉以安心继续供职。

直至一九四一年春末，抗日战争中军讯繁重，因感个人肩负整个柳州两局处的主管职务，任重力薄，诚恐贻误戎机，再三坚请呈准辞去广西省电话局柳州分局主任职务，调桂林广西省电话局任技士。所遗主任职务，经广西省电话局批准，由卢德馨推荐省局技士王祥禄接充。并推荐处里原佐理员江瑞成升充管理员职，亦经县府批准，始赴桂工作。

关于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桂林吃紧，先父卢德馨临危受命，率电讯员工留守桂林，配合抗日部队维持最后通讯的情形，另行专题详述。

回忆先父卢德馨自创办县话处成立之日起，在广西电话界近三十年的工作作风是：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尽忠职守，谦虚和蔼，平易近人，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经常不定期的步行到各乡分处巡视线路，检查加强机器话线维修保养。适当帮助解决职工的困难。使大家安心工作。还经常在深夜对各处总机进行电话上的检查，查值班人员在夜铃响后接线答话的速度快慢或在要用户有否差错等等。

记得河北总机的话务员欧武，值夜班时睡觉不醒，来话时夜铃响了也不知道，先父就起床把欧武叫醒（平日先父都在局里总机房隔壁宿舍住），要他回宿舍睡，自己代替欧武值夜到次日早上交班，每逢过年过节吃饭的时候，多为值班人员顶替，让他们吃好了转来值机后，自己才回家吃饭。每当空袭警报后，到山岩避难时，遇敌机在市区上空盘旋时间较长，而对各有关军政机关的电话和防空情报传达繁忙时，

有个别值班的话务员应付不及，自己就亲自代替值机，迅速而准确的转接传达，以免贻误军政通讯报导。

有人曾劝过他，不必去代替值机，卢德馨总是笑着回答：因我一个人，身负柳州电话局和柳江县乡村电话通讯处两个主管职务，如遇电话不灵，影响军事通讯、防空情报、话报的传达，造成贻误戎机的重大责任事故，上级长官只知道负责主管人是我卢德馨，按军法追究，当然是我读职失察所造成，都是责无旁贷，我应该做的。

（五）结尾语

笔者当年对父亲所干的电话这行工作很羡慕，所以当他同电话界的前辈在安装总机、修理话机时，我也跟着处里的人员在旁听讲技术学识。在他带队作南北两岸飞河线架设工程施工和在近郊架线时，都跟去见习。加之每当父亲在家饭后闲暇，经常对我们讲他工作时一些经历，因此更想以后能跟着父亲干这行当时被人称的“铁饭碗”的电话职业。可是父亲不肯任用自己子女，这个愿望延到一九四五年我在百色时才能如愿的进到广西省电话局工作。又因从乡村电话处成立后，我一直在处里住了几年，藉此能在课余时得到刘家葵、熊继模、陈国诚、柯传泽等四位师兄的辅导，获益非浅，因为相处时间较长，对当年创办的经过情形给我终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先父卢德馨负责处务的十年里，有的人干了不久就调动工作，或改行离去，有的久失交往，因事隔数十年人事变

迁，现就我所知道的，昔年与先父一起最初创建县乡村电话现尚健在的人：年逾古稀的师兄刘家葵，退休后住在柳江县进德圩。柯传灏老师住在本市。六旬开外的韦志德先生，早年退休现在昆明市与儿孙们欢度晚年。在先父主管县话处工作期间，共事的现尚健在者：于华秋（少海）同志，是本市工艺美术厂退休人员住本市。梁镇潮先生现在香港。（他们二人是先在农村电话处工作，后调到柳州电话局工作的话务员的其中之一人。）韦秉廉同志现住本市。王芝云（女）同志现住广州市。

可惜先父卢德馨因患高血压病，退休后，于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

上述事实是根据先父的遗札和自己当时的见闻，惟时隔四十余年的回忆，遗、错之处，恳请阅者教正。

①注：满季颖于一九四四年日寇入侵广西时，回原籍荔浦，任县抗日自卫队联队长，在该县青山乡曹村附近与敌作战，壮烈阵亡，殉职时年四十六岁。

②注：陈文鸿曾任通讯营长，于一九六〇年在原籍蒙山县病故。

③注：先父卢德馨自一九二五年放弃小学教师工作，改行从事电话职业。由电话练习生，至电话生（后称话务员）经当时的省府公费选送上海中国电气公司学习电话专业回广西后升充领班，管理员职务，担负技术、业务、行政各方面工作。一九三一年兼任柳州电话人员讲习所教师、后即受命为柳州县乡村电话处主任，负责创办县乡村电话。一九三九年提升柳州电话局主任（第十任主管职务）。抗日战争时期，更是临危不惧忘我的坚守岗位工作。

卢一民写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

柳江县电话沿革(1949年—1979年年表)

刘家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〇年四月

11月25日，柳州城解放。12月至一九五〇年四月，柳江县迁到拉堡圩（柳州西南十公里）最初建立柳江县政治中心，成立柳江县人民政府。

电话由张文海负责，工作人员共六人，县总机容量10门，单机四部，路线长60公里。市内架空明线5公里。自解放以来，所用交换机、单机均属“磁石式电话”，其中有瑞典、德国、英国、日本及国产上海等厂制造。

一九五〇年

五月，剿匪时期，436团部队派通讯排副排长林中文带领二名女工驻县协作，专接军用电话。电话工作人员：张文海、刘岳勋、黄继昌、刘锦成、刘文中、张文礼等6人。

1950年10月—1952年。土改、清匪、反霸时，电话先后由苏其、韦成英负责，工人增加到10人：苏其、韦成英、黄继昌、基寿保、何其昌、邓子山、张瑞祥、梁安柱、谭老葵、刘家葵。

一九五一年

市内总机容量20门，架空明线10公里，县乡总机容量15门，线路长72公里。

一九五二年

下半年，县人民政府建设科为了提高电话人员技术水平，在电话处设立柳江县电话人员技术补习小组。由邓子山、刘家葵二人负责辅导。印发各种电话机图解、线路架设等课程，学员人数18人，由各个总机轮流调来。一个月一期，共办三期。

县电话总机20门（德制）单机10多部，路线长120公里。

1952年底，柳江县电话处暂告一段落。

一九五三年

元月，柳江县电话与柳江县邮政局合并为柳江县邮电局。

市内话机容量50门，架空明线28公里，县乡电话总机25门，路线长168公里，通话公社21个。

一九五四年

县总机50门，单机二十多台，乡总机6处，路线长177公里，电话人员增加八名：韦以强、练时忠、莫云祥、莫云集、刘铁城、刘玉杰、韦占仪、覃福安。连上年10人共计

18人。

一九五五年

县乡总机51门，路线长223公里、通话公社32个，单机53台。

一九五六年

市内总机容量50门，架空明线50公里，县乡总机143门，路线长671公里，通话社队116个，电话机238台。

一九五七年

市内总机容量100门，架空明线62公里。县乡总机159门，路线长677公里，通话社队117个。邮电支局二处，邮所八处，代办所三处。乡邮路1270公里。

一九五八年

县乡总机200门，路线长854公里、通话社队117个。

一九六一年

县乡总机304门，全县邮电网已基本建成，除一部份大队以外，基本上社社有总机，队队通电话。（摘自县四届一次会议上报告）

一九六三年

全县调整区乡体制后94个公社有90个公社已通电话。（68年12月调整改为九个公社105个大队）全县九个地区、公社、大队恢复，使用会议电话终端机。（摘自县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大部份路线已改装电缆架空或埋设。

一九六六年

公社总机八处，容量350门，电话机总数191部，会议终端机八部，路线长735.4公里。生产大队94个已通电话。

一九六七年

原电杆久经风雨腐蚀，制备水泥电杆代替（6—8—12米高），已陆续更换水泥电杆。

一九六八年

公社总机9部，容量360门，话机总数220台。会议终端机9部，路线长781.4公里。已通电话大队104个。

一九六九年

柳江县邮电局分开为柳江邮政局、柳江电信局。电话网情况同上年。

一九七〇年

柳江邮政局、电信局合并为：柳江县邮电局。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

县总机120门（包括长农话），市话单机96部（包括局用）会议终端机七部。公社总机213门。农话单机230部。

一九七四年

县话局56人，各支局所55人，合计电话工作人员111人。

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

通往柳州市及各公社电话总机九处装上载波电话。

刘家葵1984年8月23日于柳江进德

广西柳州市灾区图

柳州市图书馆供稿

《广西柳州市灾区图》（原件：60×42），系市彩调剧团演员周家玲同志老家收藏多年的地方文献，她于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三日捐献给柳州市图书馆。政府为了表彰周家玲的爱国献图行动，石琪高市长于七月二十六日亲自给她颁发了柳州市人民政府奖状：“周家玲同志，响应政府号召，献出地方珍贵资料，精神可嘉。特此奖励，以资表彰。”市图书馆还发给她一百元奖金。

《广西柳州市灾区图》是幅记载了五十六年前，柳州城内发生的一次空前大火灾“火烧半边城”的实况，是目前收集到的一张较早的柳州城区图。该图是幅红、兰双色套印石印版图，红色标示受灾区，兰色表示安全区域，从图示受灾面积占了半个柳州城。图的右上角，记载着：“民国十七年旧历九月十四日上午十二点钟，沙街失火，烧至三点八个字止，共毁去房屋三千余间，死三百余人，伤六百余人，共计财产损失三千万元。实为空前之浩灾。”

该图绘制较为详尽，如实反映了当年城区的面貌。当时的街道、码头名称，以及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电讯等重要设置和明代修建遗留的城廓位形，均有标记，这对有关部门编纂地方志和研究史实，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保存图书文化遗产是图书馆的特有职能。广泛搜集，妥善整理，保存文化典籍、革命文献、地方历史文献等是图书馆的职责。市图书馆为了进一步搜集、核实当年柳州受灾的有关史料，于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邀请当年目睹灾情的年逾七十的政协委员陈显扬等十余位地方老者、地方史研究工作者进行座谈。广西电视台同时进行实况摄录及播放报导。该图现藏市图书馆。

会上，据地方老者回忆，《广西柳州市灾区图》是在灾后第二年由觉非石印社印制出版的，绘图者是当时柳州文人李勉哉先生。由于绘制出自于非官方，图中刊载有关数据及受灾区域，仅就目睹者的估计和目测而绘制的。现经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们走访街坊老人，进行实际调查、并撰文作了补充。

于辉云整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

《柳州市1928年大火灾区图》

灾情资料补充

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市图书馆收获的民间珍藏的《广西柳州市灾区图》（以下简称《灾区图》），是我市今年征集文物工作的重要成绩之一。石琪高市长亲自颁奖，激励了我市文物管理工作和我会文史资料整理、研究工作。经联系社会人士参加市图书馆召开《灾区图》座谈会议外，并邀约我会钟美全、刘郁卿、梁镇海等委员回忆灾情，并走访八十几岁老先生俞发记、袁国贤、伍子祯、朱深，以及七十多岁老先生吕传忠、刘代华、朱焕章、李忠群、中医师钟海波等进行了解有关情况研究，整理如下：

火灾时间：民国十七年戊辰九月十四日，公元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二点至十五点四十分。

灾区：柳州城厢，西南半壁。

起火地点：义渡码头与五显码头之间。沿河一带铺户，以木柱、板壁、盖板、板木结构者居多，便于防洪较易拆迁、重盖。

起火原因：罗兴发，手工业个体户，修造农具铁器。正在打铁、拉风箱鼓风，火星飞扬，旋风骤起，把火星撒入紧邻，落于正在敷散棉花松弹之际，棉花立即着火，燃烧的棉花火球趁风卷上板壁、屋顶，同时燃烧，燃烧的木板破片乘风飘落左右对面屋顶，砖墙瓦屋的天面，都通通燃烧起来，无法扑灭。

火势：罗兴发起，烧到东边五显码头、五显庙上边止，火随东南风转向。既非一家再接一家，并非一路连过一路，而是沙街燃了！米行、番摊馆、木行——木板铺及沙滩上、上堆的木架通通燃起！板木断片乘风飞落到上关柴行、西门水码头同时着火。小南门码头尚未燃烧，寿板街已起火，四德庵也烧燃。城里流水沟、左营塘、火神庙、苏杭前后街，城外燃着的板木飞来，燃起后，苏杭绸布燃着飞上天空，破碎布片被旋风卷向四处纷飞，像成群“火鸟”，飞落哪里燃到那里，吓得人人心惊胆颤。飞过人字街、考棚街、西门大街，其中樵家巷、铁局街都燃了；又飞向斜阳街、王家大院、细柳巷、西门口、西城街、南岳庙、白马庙阻不住，由小桥头直冲过大桥头，上坡；左边余家大门口、着了，右边烧光符隆栈杂货店为止。

再由罗兴发对面是广益五金店左右都是砖瓦房，对面板木房大火逼烘过来，瓦角瓦檐燃了，东边燃到五显庙，上沙街的西亚酒店烧过挑水巷到陈忠和转角延进三角地，教育局、华容寺、财务局，整个弓箭街烧到龙角街口龙安盛。这边地势高，风向西扫过桃花庄东边，烧到蚂蚁塘：钟家祠、何家祠。桃花庄南端被人字街火势蔓延，斜阳街烧过马草行，接

上花门墩、细柳巷、常平仓直到北城脚西头止。

以上火势所及的灾区，形成整个柳州城厢西南半壁。一片焦土。

按现在市的城中区地图，从南朝北，正是：龙城桥头以西——曙光中路78号转柳新街51号北进，连柳新街75巷、91巷（连对面），跨过中山中路柳州照相馆、红会医院，蔓延映山街全街；包括东边两巷到春柳屋后；西边55巷连接景行路西端接斜阳路全街。映山路北端之东，接龙城路北端连至北城巷西端。再接过西城巷全巷，达西门外西柴街接柳荫路全街及小巷，过雅儒桥，上斜坡达雅儒路南端39与36号为止。上述为灾区东、北线。

江边由龙城桥下西边起，经航运码头、长青路沿河滩、达西柴全街（包括小巷），北至马草坪边缘为止，为灾区西南线。两线连接即是半个柳州城。

伤亡人数：

左营塘边，陈尸一百多具；西城门口，三十多具，城上二十多具（是火逼死的）；花门墩两个女孩尸；映山塘里三具；刘启记一家人，他的妻舅全肇祥和两位买鸭子的客人，一同躲进他店里的地仓，火息后发掘出来十八具尸，皮焦肉烂，分辨不清，找见金表壳在全肇祥腰间，才证明是他。刘启记只剩一个儿子刘迪忠在上海读书，幸免于灾。《火灾图》附记：“死三百余人，伤六百余人！”是有可能。死者惨状，目不忍睹。

在火海中出现奇迹：西门大街陈家（向北、平房、细柳巷对过西边几家），砖墙盖瓦，门窗檐口屋内房间及天井所

种花木均未受损。屋里一位老奶，安然无恙。更为不幸中之幸也。

斜阳街的电灯局机房一间还存在。黄学（现市二中）大部份建筑早已毁坏，剩下明伦堂未着火。电灯局机房还存在。

“水龙”：二十年代算是落后，在柳州也是仅有的手摇“人力龙”——救火机。对河圩、谷埠各有一个组织。在十多年前，从佛山各自买来一架四轮手摇水柜；配帆布喉两条，约三寸大，50—100尺长，水笔（水喉末端射水管）两支；此外就是水桶，铁皮制的，有抽手可提起跑，因木桶留久会变形，急用时漏水。出动时，出勤的人，必须带竹匣帽，以代替钢盔，防火星及瓦片木碎伤头。还有拆卸队配备十对八对火钩火叉。

人力配备：水柜两旁一班需十至十六人分于两旁上下摇动水泵抽水，经帆布喉，前端水笔射水，扑灭火焰。以体力强健者掌水笔，以一人持藤排（盾）保护射手。提水供应水柜的起码100—200人。自动来增援的当地群众见义勇为也是常有的。各街筹设太平水池——大小不等，若无设备储蓄太平水，只好就近寻找水源，鱼塘使用。因此，有时水龙到达灾区，无处取水不能开喉，只得见火兴叹！城内外也有几架水龙队组织。陈显扬当年24岁，早已参加谷埠的水龙队。这次由大南门过河到达灾区大约已十三点钟。由大十字街进入龙角街。开喉，等水，时有时无。惟有拆卸队靠桃家庄方面的屋后进行拆断火路。作用不大，原因是缺水。

当时的灾情也是亲见的。这次访问，得悉苏杭街烧坏水龙一架，西门大街烧坏水龙两架，还有两位队员，被火逼，走

不掉，牺牲在水龙边。群众防火组织。特别在“人力龙”队中，每年常常出动二、三次，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灾情。历史上也没听说过。但愿今后永不再见！回忆当时用的水龙，不久也被机器水龙代替了；大概在1932年，柳州城市建设机构，办回机器水龙（汽车上装上救火设备）一架。之后，人力水龙逐步消失（可惜博物馆里看不见它）。

损失财物：据《灾区图》附记，“共毁屋三千余间，财产约三千万元”是当时估计数。旧社会有句谣传：“沙街三年水不泡，火不烧，母猪带金耳环”。说明沙街富庶。。这次大火，上沙街、中沙街烧毁要占沙街三分之一多点，损失已经不小；苏杭街几十间绸布百货；广芝堂、大同春、五洲大药房，名贵药品；木板行、寿板街，河滩上堆架起的木材和店内的棺材；各行各业生产资料；常平仓内几千担稻谷。财产损失，根本无法统计。

人心惶惶 疑神疑鬼：燃着的绸布破片乘风飞舞，说是“火鸟”。旋风势大，烧燃的成块成条板木同时在空中往来，说是“火神”举着火把点火！第二天谣言：“伍廷魔放的火”。“烧光了好规划建设新柳州……”。“西门街姓陈的一家，敬的观音菩萨显圣，脱灾脱难”。

我们访问吕传忠，他说：“大火时我亲眼看见伍廷魔穿着衬衫，有两个卫兵跟着，在街上维持秩序，指挥救火”。我们现在研究，这个谣言的来源，火灾第二天，伍廷魔布告：苏杭街不许照旧建筑。鱼峰路北端（西面），立即开工兴建第一批骑楼商店，供苏杭（绸布、洋杂）营业；东面同时兴建消防大队部（现在鱼峰粮店）。当时可能还不得人心

的。若说敬有观音菩萨的人家，当时半个城不下千数，也得陈家一个观音显圣；其余千百个通通烧光了。那些怨天尤人的幻想，都不符合事实的。

灾区图原件 60×42 复印于末页

梧柳河道航运概况

龙文熙 遗稿

珠江流域水系甚多，从西江上游广西梧州起，大河上至桂平，分南北两大河流，南河通南宁，北河通柳州、梧州——柳州的航运，从二十世纪初有轮船航行时期起，我在航线上身历其境并向有经验的老年人了解所得概况，叙述如下：

梧州航线未有轮船航行以前，木帆船是货运与客运唯一的交通工具。由柳州顺水而下，七、八天左右可至梧州；逆水而上，则无一定船期，普通要一个月左右。

梧——柳水情及水运概况

梧柳河道分梧州至大湟江，大湟江至石龙，石龙至柳州，三段来叙述：

梧——柳河道情况复杂，根据有经历的老引水（又称带水即领航员）讲，全航线有深水和浅水滩360个。河水涨退一、二尺，滩的形势各有不同。木帆船的动力靠人力，水流平静时靠风帆及划桨，急流中靠拉缆，拉缆也不能上的靠绞缆。要绞才能上的滩，水流必然湍急，如果绞缆一断，是万分危险的。轮船虽然有机动力，在“中（读众）正水”（航行术语）的滩也靠绞力帮助上滩。

（一）、梧州至桂平、贵县无论水涨或枯水（浅水，水上人讳言浅），“湿底”（粤语；普通话叫“实底”，蒸汽机轮船）可以常年航行。险滩亦少。如平南附近的姑翁滩，虽然巨石横江，在翁石嘴处设置航标，轮船可以夜航，大安（地

名)以下，非到天亮不敢航行。人和、赤水(地名)一带，河面特别宽阔，满河暗石，附近渔民，把大个的卵石运到河中，堆筑成塔形的石塔，人们叫它“鱼倒石”，河水涨时，河里的游鱼在石塔的下面休息，渔民利用这种条件，抛网捕鱼。这个地方“鱼倒”之多，范围之广，比之三国时孔明在长江三峡布置的八阵图要大过千倍。

(二)、桂平至石龙：这是全线航行最危险的一段。桂平上不远，便是有名的大藤峡，河水涨至封峡(封峡是引水人员按一向认为水涨程度航船不能在峡内航行的术语)时，轮船、帆船，一概停航。大藤峡里程长，两面高山，河床深窄，石头纵横，滩高水急，水形混乱，汹涌澎湃，木帆船和轮船在峡内遇险沉没，死人之多，闻之胆寒。过去未有轮船航行的时候，船家交代搭客说：夜间行船，只管睡觉，船边有什么形影不要管他。事实上当水涨时候，轮船航行过峡的情况，身历其境者，真是铁胆心寒。航行的船，如遇水涨“封峡”，上水在桂平停航，顺水在武宣停航，等待水势退至可航行时再行，以避免危险。

(三)、石龙至柳州：水涨时期，滩被淹没了，淹没不过的亦不太危险，就算是鸡喇下的横滩(这个叫法或者是壮语)，水涨时可以在滩面上近北岸边航行。枯水时，沿线都是浅滩，“湿底”已不能航行了。电船(内燃机轮船)亦要把本船所载的货物分载在驳船(另备有的木帆船)上，看水的深浅情况，分成一艘或二至三艘，由电船拖着带走。浅水滩河底多数是卵石，亦有暗石，在水上看不见的，稍偏航一点，就会碰烂船，只是不会没顶而已。如在横滩或武宣上的“大

横沙”、“小横沙”遇险的话，仍然有没顶灾祸的。看不见的暗石，领航员是靠看水面上的水纹，主要是靠老于航行，经验多。最令人丧气的是遥遥可以望见柳州的水东滩，滩水甚浅，满河底的卵石，只有一条较深很小的水槽，这条水槽有时会受水冲刷而变动。轮船虽有机噐，在滩上亦不敢开车，要用缆绳绞上，因为开车，水被螺旋桨推向船尾去，河水变得更浅，连船也浮不起来了。而且车叶打在卵石上，经常打烂车叶。枯水时期，航行石龙以下的换上深水用的车叶，航行石龙以上的换上浅水的车叶。上一个水东滩，有时也要两天才能到达柳州，真是闷死人也。迁江河即红水河为珠江的干流。发源于贵州省境内，流经河池、迁江、来宾到石龙流入柳河，水流泥多，色红，常年如此，故名红水河。抗战期间，广州撤退物资，绝大部分交轮船运载，溯西江，经梧州，而上柳州。可是冬春两季，石龙以上，河水枯浅，滩急水浅，满载疏散物资的轮驳，难越“横滩”、“水东”为此开辟了大湾港，梧州上柳州轮驳，到石龙时，向南转入迁江河道距离石龙20里的大湾靠岸，再由大湾用汽车转运柳州各地。运费是增加了，但每次船期缩短了2——3天，并且解决了水浅轮船到不了柳州的难题。

引水人员的来源和引水人员的分工

梧柳航线引水领航人员分梧州——大湟江口、大湟江口——柳州两班(航行梧州至南宁的不分)，这是因为引水领航的人才，最初是由木帆船的舵手充任的，以后有轮船航行，一个头手领航，必然要找两个助手，另外水手人员上舵房学习，经验多了，逐渐懂得河道情况，由此培养出来的人才越

来越多。更因为梧州——大湟江、桂平、贵县的轮船多，来往密，需引水人员更多。海员工会成立以后，为了维持梧州至大湟江航线的引水人员，避免失业起见，才把梧柳航线的引水人员分为两班。于是引水人员多数住在桂平和大湟江，以便船到时方便互相交接班。

蒸汽轮船在第二段线的灾祸

初航柳河的轮船是湿底(即蒸汽机轮船)，二十世纪十一年代开始有湿底航行。据梁镇海了解：第一艘“实底”由梧州开上柳州是清宣统二年，领航员是柳江县进德乡四连村的曾胜才。有载货物的拖驳船，有不拖驳船，单行客运的轮船。由于湿底不够稳定，在船的两旁扎两捆茅竹，作稳定轮船之用。当时的湿底轮船，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公司组织，零星组合者多。这种湿底，枯水时期只能航行至石龙。以后广东粤桂航业公司才逐渐航行梧柳线，前后共有十多艘。有人想改造比较浅水的“湿底”争取多些时间航行石龙以上，改装一艘明车轮船，如同航行广州的“高亚”、“的利”明车一样，把推进器安装在船尾水面上，使它吃水量浅些，但由于始终是锅炉蒸汽机，吃水量不会太浅，枯水时期仍然到不得柳州。而且这种船的推进力弱，亦不太适合于急流滩水航行。

最初航行柳河的轮船是“贵富”，它最后一次从柳州顺水而下，过了武宣经过勒马，驶入大藤峡，河水正中红石滩，水势汹涌，掌握船舵技术失灵，被水冲压在滩石，船身迅速下沉，水流急，河床深，整艘轮船无踪无影，船上六、七十人的生命，瞬息丧尽。

“香洲”轮船，亦是顺水而下，在大藤峡内的“大顺滩”下的三角滩，水势流急，转舵不灵，被水冲对石角，船沉没，死数十人。

“柳平”轮船，亦是顺水而下，航至“石拢滩”，碰石沉没，船上的人员及搭客死难者近百人，船机能够捞回。

就是那艘明车轮船，装有百三、四十名士兵，顺水而下，由于载量过重，驶至峡内的“白浪滩”，被一口爆水冲上，船身两边摇摆，船上人多倒向一边，也船身翻沉，百三、四十名士兵，几无一幸免。旧社会的带兵官草菅人命，把士兵尽量塞上船舱，超额装载，造成惨剧，能不为之痛心哉！

“富马”轮船，是逆水而上，至大藤峡的碧滩，在左手石山边伸出的石角下面，为了避开急流水，然后开足马力冲出石角外转舵冲上，（引水人员总是这样做法的），当船一冲出急流中，被一口爆水冲出河中心的急流中是无能力驶上的，当时的形势又不可能急转回头向下，恐怕翻船，领航员一时慌乱，船很快铲上对岸的沙滩，船上的人，吓出一身冷汗，以上所举，均是湿底轮船，灾祸惨重，其余事故小的，不胜枚举。

为什么遇险惨祸是顺水而下的船多呢？因为滩高水急，滩位窄，顺水而下速度快；轮舵慢会碰石头，转舵太快容易翻船；船身的重量开车推进，加上顺水的冲力，势不可当，一碰到石头，难以幸免了。至于上水则本身有机动力，可以与水对抗，主动权多一点。

内燃机轮船的兴起

事物新陈代谢的规律，免不了反映到航业上来。蒸汽机轮船航行，比之木帆船优胜得多，航行时间缩短了。缺点，是吃水深，枯水时期只能达到石龙。木帆船虽然航行慢、时间长，但可以直达柳州。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内燃机应运而生。航商为了图利，适应需要，改用内燃机浅水轮船。当初的内燃机是大头火胆形式的，升火要先烧热大火胆，时间要20——30分钟，机器仍然相当笨重。用内燃机船底可以装浅些、宽些，吃水量比蒸汽轮机浅多了。船本身可以载货，可以搭客，但内燃机轮船也不能完全代替蒸汽机轮船，因蒸汽机轮船靠拖船，拖驳载货量比较多，仍然可以搭客。它的能源是木柴、茶麸之类，价钱便宜，沿途有卖，这样他就可以降低运费，水涨时期，条件对它是有利的，不过航线的行权，并非随便申请便可得到批准。

内燃机轮船航行柳梧线最初是“永昌”、“永南”两艘兄弟船，装配形式，在船头上面伸出两扇如“鸡翼”，船头上面有一个绞盘，绞是人力绞的，一面开车一面绞。永昌轮船以后顺水过完大藤峡之后，在一个不重要的“羊寮石滩”

“触石沉没，幸未死人。”“永昌”、“永南”之后，天和洋行一举建造四艘内燃机轮船，取名电富、电贵、电生、电财，以后人们都叫内燃机轮船作电船（以后简称电船）。这四艘电船，是靠天和洋行外资力量的。传说四艘电船的资本家，其母亲是中国人，和天和洋行的大班（即天和洋行领导）结婚所生的儿子，凭借天和力量而做的。当然他并非单独这四艘电船，天和洋行的势力，单讲航业方面，在珠江三角洲河网地带，香港、澳门，甚至英美等国家都有他的轮船航

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无微不至的。富、贵、生、财四艘电船载重量大都是80吨，机器马力为160匹，是适应梧柳河道情况而设计的，四艘电船到梧州停泊天和筏，不知者以为是天和洋行的财产，其实不是。

当时中国资本的航商集成公司，亦有轮船航行港梧、穗梧及珠江三角洲各河道，在梧州亦设有一个集成筏（这种筏等于浮水码头），集成公司也不甘落后于人，也有四艘电船航行梧柳线，取名利国、利富、利民、利强，载货量及机动力与天和的四艘相等。

以后这条航线的电船如雨后春笋，形成盲目竞争。电船越来越多，货客运费不能不受影响。实际这条线因水涨与枯水情况，无一定的航行期间，如雇用民船拨运货物，时间长，燃料耗用量大，并非十分理想；再来一个竞争，黄金时代过去了。因此天和洋行的轮船，对此已不感兴趣，把这四艘电船调航别处，或者可卖则卖，急流勇退，别作良图。中国航商集成航业公司，亦有同样的观点，把“利字派”国、富、民、强四艘轮船另作安排。不知是否鸿鹄之志，不想吃那条河道小鱼。

后起的均安电船，航行柳州不久，溯江而上，航行至大藤峡内的红石滩，驶近石角下的倒水中，从石角下的倒水冲出急流中转舵驶上，顷刻之间，一口凶恶的暴雨把船头两扇机翼掀去，船身摇摆不定，船头被卷入大漩涡中，船头下陷，船尾翘起，随漩涡急转，船的尾楼脱离开去，六七十人的生命，见海龙王去了。脱离开的尾楼，随水漂流至桂平，有两三个客人死抱尾楼的窗口，庆幸得救，在桂平验收尸体的家

属，哭声震天，惨不忍闻，电船的惨祸事件，以均安为最。

均安电船惨祸发生以后，航轮吸取了一个教训，在船的两旁准备两只救生艇（过去是一只的多），用活动的旋转吊螺，吊在船之两旁。上落险滩时，每艇有两名水手站在艇上，手握使之平衡，对电船起了稳定安全的作用。其余如

“欧洲”等电船在大藤峡内遇险，没有造成重大的惨祸，不一一赘述。

以后如新广源、新广才等电船陆续产生，有些船出了事故之后，改名换姓，避开人的耳目。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柳河电船出事故者，比比皆是，问题在于情况的严重与否耳。诸如马临电船在师姑滩打烂，沉没于勒马河床，经过修理，改装海龙等。启泰、新东和两轮船是同一个公司的。鸿德公司有五艘船，三艘航行南宁、泰丰、泰德，两艘航行柳州。鸿德公司的船，亦并非艘艘新装，有两三艘是买旧船改装的。永恒、利行是合资的单独船。新敬安是代理美孚石油的贞记公司吕氏家族的船，是柳河电船最大的一艘，马力亦是最大的。西江有名的百万富翁梁廷秀在梧州开设一家银钱店，他对航业感兴趣（他的叔父牛仔锐有四五艘船航行香港——梧州，广州梧州），马临电船沉没之后，他买了马临的旧船，改装为海龙电船，后又再装一艘新船取名柏林。桂平商人董煥卿，已拥有一艘新利兴，他也不甘寂寞，又新装一艘新泰兴。

柳河电船最大一艘是新敬安，载量100吨，200 马力，枯水时期亦到不得柳州。如果不是停航，势必要改航线，停航既无收入，又要支付看管船上人员费用，只能够在水涨时

期货运量足，收入较丰，否则，马力大耗燃料多，费用大，实际上不适合于柳河的客观情况。泰丰电船载量90吨，180马力，但它船身比较单薄，开航时震动很剧烈，搭客不习惯者，肚子也被震痛，讲话的声音也断断续续。船大不是赚钱的好办法，雇得一名好引水人员行船安全，适合枯水情势，160马力，船身轻捷，这才是好办法。新广才、启泰、新东和、海龙这四艘电船载量皆是80吨，160匹马力，这种电船是比较适合柳河航行的，已有160马力上滩亦可矣，枯水时勉强够水航行。当然，上很多浅水滩仍然要绞的，就算船小些、马力小些的船也要绞。至于新敬安加绞亦不够水位了。新利兴、利行、永恒、泰德这四艘载量60——70吨，130——140马力，它们虽然小一些，过浅滩时比之80吨、160马力的船优胜不多。柏林电船的机器，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一艘潜水艇的发电机，不是烧大头火胆的旧式内燃机，马力写称200，但不见得比其他的船快。柳河最后装的新泰兴，载量90吨，180马力。发动机在柳河轮船中，可算是最新式的，名叫风油机，机身轻细，船身大，可以多载货量。新太兴由于他以后换了引水人员，终于在武宣上的小横沙滩沉没，死五、六十人。在小横沙滩很少打烂船的，这是由于引水人员技术不够熟练。及认为非险要的大滩，交由助手领航。助手未够熟练而至造成事故的，已数见不鲜。

枯水期，有时河水特别浅，所拖的驳船两艘或三艘，仍然不够过浅滩，有些木帆船预计必有此种情况发生，它们就专停在浅滩处，等待轮船雇用，做这一个滩的转拨生意，这样轮船亦不用多拖一艘驳船，两家划算。

英国摩轩浅水炮舰试探柳州河

摩轩、摩富是英帝国在珠江流域横冲直撞的浅水炮舰。那时候广东江河盗匪甚多，来往轮渡常被抢劫，来往香港——梧州，广州——梧州的商船，特请两摩作护航，当然要酬保护费。两摩护航，海盗是不敢动他的，亦不敢用水雷炸他。海盗的目的是抢物资与钱，而这些炮舰本身无物资可抢。而且护航是商船先行，炮舰在后，如果强盗要放水雷，首先炸沉商船，炸不着炮舰。如果双方作战，对强盗而言没有什么好处。两摩护航，很生效，但商船多，两摩是无法应付的，两摩在珠江流域护航，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耳。1935年之间，摩轩想到柳州试探试探，由人介绍雇得一名老引水，名彭继，及一名助手，几经协商之后，订定每天工资100元，但据计算，不论航行与停船，工资如数照付，船既开行，彭继与助手到舵房领航，坐在彭继背后的两个鬼子，手执手枪，大概是监视以防彭继破坏。摩轩航行到人和、赤水，河面特别宽阔，满河石塔林立，四望无路可通，好似走入八阵图一样，英人拍了照片，向彭继竖起一个大拇指，表示尊敬，由此，对彭继两人的监视放松了。

摩轩航行至桂平，适遇河水暴涨，水势已封峡，轮船不能再上。彭继对该舰长说明，舰长自恃船坚马力大，有四副机器可以一齐开动，船身大，船面入水也进不得舱，吃水深六尺，船面轻，翻不得船，要彭继试航，彭继了解情况之后，同意舰长意见，大胆一试，入了峡，水势如排山倒海，天色阴暗，彭继打钟联系机房开足马力，与左右冲击的洪水

搏斗，航到四方石滩（四方石滩水封峡才成滩，水退下不成滩），被一口凶恶的瀑水顺着急水势把摩杆压过岸边，幸得马力大，彭继技术高，转舵与凶恶瀑水对冲，斯时的情景，英人亲眼所见，面色也吓青了，彭继说不能再上，英人鉴于实际情况如此；只有尊重领航员的意见，退回桂平等候水退，不敢再作违反规律的瞎指挥了。在桂平停泊七天，水下退，升火开航，一直驶到柳州。在柳停泊几天停泊几天，水势下退，舰船吃水深，恐怕不够水航行，不敢久留，返航至石龙，又遇迁江红河水涨，水势汹涌，此时彭继对摩杆的性能，已胸有成竹，舵房的舵灵敏度好，大胆出峡，驶至峡内的银楼角滩，起了一个凶恶的大瀑水，把船冲过一边，大量的水在左边涌上船后，流向右边而出，使这英人亲身体验下，柳河是不可能横冲直撞的。而彭继亦得领航这艘炮舰，训练一下自己的技术，得了一笔高工资，摩杆回到梧州，不晓得他怎样对他的大班汇报，以后亦没有再航柳州之举。

大藤峡内一股土匪勒收行水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大藤峡内有一股土匪在红石滩下的中塘地方，拦河勒收行水（卖路钱）。匪首陈五、陈七两人，其收行水的办法，是按照船上随货同行的海关税票金额照收，如同关卡一样，轮船经过，要拿货票上去核算，并带款上去缴交，否则开枪射击。在这河面窄，滩水急的地方，无可奈何，只有如数照交，亦增加在货运费内照收，船上没有什么损失，只有加重托运者的负担罢了。以后广西政府派兵清剿，匪首陈五，终于在别处被捕归案，斩其首级。

挂在武宣县城示众，陈七逃亡不知去向。航轮与货主皆大欢喜。陈五、陈七土匪消失了，但沿河仍有小股土匪企图抢劫。这些小股土匪是流动性的，兵来匪走，兵去匪来，经常在武宣石龙之间及铁帽山等处活动。近石龙的红河口更为活跃。航轮从此加强船上的自卫力量，在船头的舵房周围，在发动机舱两旁安装铁板，还在梧州向警备司令部缴交护航费，请求派兵在船上护航。如遇土匪袭击，领航员在舵房有铁板保护，照样操舵前进，机房有铁板掩护，安心开车。卫兵在船上无路可走，只有开枪还击，经过一个短暂的时间，就可以脱离土匪的射程了。在旧社会当兵，其苦难情况为尽人皆知的，当兵而能被派在船上护航，在旧社会来讲，可算是幸运儿了，假若没有人事关系，想当船上的护航兵，也是梦想。土匪打击商船，迫使商船向警备司令部请兵护航，也是替警备司令部开辟生财之道。

航务局的成立，关税征收的情况

(一) 广西航务局的成立，约在1935年之间，一个广东姓林的来开办，人们都叫他林局长。当时桂系的官僚资本，亦有搞航业的，航行香港的“天定”、“天一”等轮航务局林局长上台不久，因与桂系官僚有利害冲突，逼得辞退，启程回粤之日，航商依依不舍，船在梧州者，均升火开船与林送行但船不能超过海关界线，航商这种举动。林下台后，航务局长是桂系的陈雄兼任。

(二) 谁都知道，海关的税收，是庚子赔款而设的。在旧社会中广西的货运税收，是跟海关税收额征收一个七五税

(75%)，以后又再加一个二五税(25%)，合起来就是海关一翻税额，税款并非由船上代为缴纳，而是货主自己办理，船上的责任是承运所有的货物，要货票相符，税票要跟货物同行，以便沿途关卡的查验。

当时的关卡除梧州、柳州外，桂平一个，石龙一个，运江一个，下水是查鸦片烟的。对于沿途的关卡，大家都讨好关卡人员，关卡人员托去别地买些东西，答应总是“得得得……”；买到东西交予时，关员问需要多少钱，船上代买者又说“甬甬甬……”。“下次再算”，再托买又是一样。这样搞得烂熟了，拿住这扎货票去到关卡的办公桌上，自己拿起验证的印章猛盖，盖完说声完就走了，也不邀请关卡人员到船上检查，关员也心照不宣。但有时也到船上走走的，船上报关员，拿起税票，奔回船上，人来到船就高声大叫升火，这就是行船争解纜，争先到站，争取搭客的手段之一。

货 客 运 的 竞 争

由于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盲目竞争，货运会时多时少，柳河轮船目的主要靠货运，货物满载客运少，仍然有利可图，货客皆多，则赢利更丰，遇到客货均少时，采取措施：货运费暗中对托运大批者打个折扣，运费赊帐；货主搭船，除了免收客票之外，又不收膳费，更待之以美酒佳肴，甚至有些货主的亲戚等人，都向代理售票处免票，这种手段，并非绝技谁就能做，这样造成货主自以为是天之骄子，有些为了搭船，故意付几千斤货，取得免票与“白食”，旧社会的

虚伪性，航业上也是一样的。货物多运时，货主争订舱位，货物少时，货主始终选择航行一向安全者多付，其余又不得不留一点余地。

运费赊帐的陋习，被货主利用了航商的弱点，有些拖欠甚久；航商购买燃料也可以赊，但赊的限期很短，油渣是轮船最大宗的开支，外国石油公司规定不能无期地拖欠；船上人员工资虽然非一次支完，亦不能拖欠过月，工人提出要支就支，货运费如不能及时收还，资金周转困难，因此轮船成立一个组织，团结起来，理想扭转拖欠局面。成立电船组之后，梧柳均派有专员收理货运费，但没有一个规定的限期，由于拖欠已成为习惯，其初虽然支付比较快一些，经过不久依然如故了。旧社会的私营企业，由于绝大多数没有真实雄厚资本，外强中干，依靠一个老实与信字，实际上是否真正的老实人，老板心中有数，什么都打一个“银跟斗”，这些赊一下，那些拖一拖，以达到他无本生利的目的，

电船的工资与伙食的内容

电船的工资最高是引水人员，其次是机房，水手第三，管理人员最少，杂役人员更少。杂役人员靠搭船客人打赏的小费。引水人员的工资，差别较大，技术高的老引水员，行船一向安全，无事故发生者，或者有极少微细事故发生者，这种第一二名的引水员，老板是愿以高价雇用他，雇得这种引水人员的轮船主亦不轻易放他“跳槽”。其助手是由领航头手选择的，头手占引水全部的工资一半有多。全部工资有些每月二百多元，有些一百六、七十元，不是平均的，按

技能自己分配。机房工资按机器马力大小而定。管理人员工资二、三十元之间，另外如有白银或钞票付寄，所收得的手续费，是归管理人员及公司一部分人员分配。

厨房是承包制（一般是合伙承包），全船各部分的粮食，完全由厨房包办，行夜船有夜餐，船上员工每月只给一部份伙食费不够半数，那么包伙食的钱怎么得来呢？这是每水（次）船准许厨房带五、六千斤货，不收他的运费，这些货不管他帮人带或者自己买货做生意，如果他接不到人家货，自己买货又亏本，这是承包者倒霉。除此之外，旅客的膳食，由包伙食的厨房卖。搭过船的人都晓得，饭是给你吃饱的，菜是少得可怜了，与市面饭店的菜相比较，等于大巫小巫之分，船上这种制度，迫使包伙食者不得不如此，包伙食的人，不断来运动，有亏了本退出去了，第二个又上场一试。

民 船 迷 信 造 成 的 灾 难

过去木帆船民，甚为迷信，尤其是妇女，因迷信拜神引起的灾祸屡见不鲜，甚至家散人亡，他们不吸取教训，相反以为受灾者不诚心拜神，遭神降以灾殃。如运载汽油，必然由民船装载，由轮船拖带，再三交代小心烟火，不准烧香拜神，但那船婆偏要拜神，以为在船头最外边焚香烧鞭炮可保无事，谁知一点火，烧燃了充满汽油的空汽，燃烧之速，不容许人们有拿走东西的机会，装汽油的船是不准靠岸的，船民只有跳水逃走。此外，岸上有神庙的滩，如鲁滩、横滩、船过滩时，在船上烧香、烧炮、烧纸钱，被风把纸灰吹

近篷，引起燃烧者亦有。

抗日战争轮船重新组织

抗日战争，军运频繁，如果没有一个统一调度机构，由各机关各自封船，国家对航商都是不利的。1938年秋，分别成立了轮船、民船同业公会，对军运、民运、交通以及运费等统一由公会协商解决，当时物资最多的是广东石井兵工厂的设备，这是中国四大兵工厂之一，为了拆迁石井兵工厂快速拆卸设备，秘密装上木帆船，虽然日寇不断派飞机到石井轰炸，日机走后，轮船把木船拖到梧州，梧州以上由电船组接拖，石井兵工厂改名为“天堂坪”（广西融县的一处地名），并在梧州、柳州设天堂坪办事处，负责拆迁事务。电船组当时任务最多是运载天堂坪物资。电船组将民船拖到柳州，或上到融县，若是水浅不能上滩，则将物资分交柳长线民船载运。拖运柳梧线的燃料由天堂坪发给，伙食费规定一个数目，亦由天堂坪办事处交付，这是等于封用船只的计算，如果附拖，只收拖船费。1938年广州沦陷，货运更少，电船很少生意可做，航商只要不用自己再拿钱出来，船身机器如何损坏在所不计。在驻柳办事处的人员无工作可做，只是每月与天堂坪结帐而已。

日敌陷广州后，日机不断沿河低飞扫射与轰炸轮船，被炸沉或燃烧了上盖者不少，船上人员被打死者有之，当时好似群龙无首，各自逃避。国民党消极抗战，日退千里，有些轮船见河就走，沿江而上，有些躲避在隐蔽地方，总之谁认为这样安全就怎样办。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无法谋生，逼

得把船上可卖的东西拆卖，以维持目前生活。逃难往贵阳从榕江沿途而下时，在松江夏江之间，就看见有电船这样遭遇，珠江航运的衰落，不堪回首。

抗日胜利归来，原日的航商有些无能为力，有些力量亦非常薄弱了。原日搞航业的人，合资收买或租用旧船，加以修理，重操旧业，既集合一些资金，又必需亲身劳动，领回一份工资，以求解决生活。亦有原日的航商，把旧船修理，恢复营业者，出租旧船者亦有之。

结 束 语

一唱雄鸡天下白，祖国大陆解放了。航运权掌握在国家手里，旧社会无法治理的河道，经过新社会不断治理，形势大不相同了。例如鸡喇下的横滩，现在已不是航行在卵石的“之”字路线，而是在滩的北岸边，炸开一条直直的槽道，轮船民船通行无阻，沿河设立航标，很多地方能够夜航。而且货船与客船划分清楚，机器新式轻便，马力充足，能够定期航行，所有这些，旧社会是无能力办到的。对比之下，联想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诗的这两句，真适用于航运的今昔。我是旧社会航运业的过来人，今日回顾船上的管理人员或领航人员在柳州者，连我不超过三人，抚今思昔，从没有退休的社会转到新社会退了休，无！微笑。

解放前柳州市南北两岸之交通

梁镇海

本市南北两岸之交通，从抗日战争前二十年说来，只靠人力划船。两岸船家分布的码头，有：大南门码头（原浮桥码头，今大南菜市及立新路两个斜坡汇合处）；小南门码头（今龙城桥上边与航运码头之间）；义渡码头（今航运码头）；黄村码头（即黄村与渡口对岸）；窑埠码头（东台路东端即东门沙角与窑埠对岸渡口）。各码头渡船船家收钱（渡客付与的酬劳）、及渡河秩序等情况各异，兹分述如下：

除了义渡码头外，渡客从各个码头渡河，同样应付船钱（过河钱）。当“五四”运动时期，成年人渡河一次，付铜钱五文，到二十年代初期，增至十文（一个铜仙或铜螺铜板当十文）。到二十年代末期，过河钱收到二个铜板（小孩减半）。大、小南门码头渡河船钱都是一样。

由于船钱一次渡河的收入，与每船一次渡河人数有关，船家希望每次都满载（也有一定限额，不能超重）不惜费时等待，并争在船头叫客人上船，渡客则愿赶快开船，不愿久等，而发生争吵。也有慷慨的渡客自愿拿出十个八个人的船钱给船家立即开船（所谓包艇），大家得些便宜。也有身无半文的渡客，得不到船家谅解，而发生争吵。又由于船家接

渡客人，都是自由集合到码头上来的，每过河一次，回转过来，又抢着停泊渡口，争取继续再渡而发生争吵。因此，码头渡口终日喧嚷不休。后来建立制度，轮流停靠渡口，大家按秩序开渡。以上属于小南码头渡船情况。

大南门码头，位于小南门下游，对河三天一墟，墟期更加紧张。因此，产生投机的包头。原因码头一带地产权属湖广会馆，船家纵然是湖南乡亲，在此渡口摆渡的仍须向会馆交租。那包头用手段向会馆把渡口地盘全部承租，并投资增置渡艇，雇用船民开船，船钱作四、六分成，剥削船民。笔者亲见，1926年前后，大南门码头附近就有黄某，把这里渡船码头包下来，赢利不少，这些现象直到架起浮桥才消除。

大小南门码头不同之点，在洪水期间：大南码头上自柳江路路面，下至水边，比较高又很宽敞，船只停泊比小南码头方便。小南码头平常离水面低，洪水略微上涨船只便不能停泊，就要断绝往来，只靠大南码头维持两岸交通。

义渡码头：抗战前还有一两只义渡，用长大的驳艇，往来渡运担头农产品，肥粪，牲口。不收船钱。是一些大商号捐资、置艇、雇用船工负责。因载运量大，往返时间较长，渡客不多。

窑埠码头：其渡船为前舱无篷的长大驳艇。市区所有到郊外山上砍柴割草为生的，往来必由之路。傍晚回来各人一大担，非用较大驳艇不能容纳。这些人付船钱，以准备好的七八、斤柴代替。其它一般照收船钱。抗战后上游已有浮桥，窑埠船家组织集体，统一管理，担柴过渡也同样收船钱。这里过渡收钱比上面两码头较高百分之五十到一倍，因

这里河面较宽，渡客已较少，经常不过三、四只船。

黄村码头，仅供黄村、白露与河西一带村落的乡民往来，只有一只渡艇，由一位熟悉水路老船民渡过险滩。渡客不多。

以下叙述柳州浮桥

抗日战争爆发，同年九月敌机已首次轰炸柳州机场。北岸的居民群众，无一不恐惧万分住居南岸的居民可凭籍山岩躲避，北岸需到山岩避难的人，非渡河不可。在闻警报，同一时间群众蜂拥奔到河边，争挤上船，有的呼天叫地而不能过，因渡艇不能适应紧急需要，为此，柳州防空指挥部，开始筹架柳江浮桥，柳州始有浮桥。早在“民十政变”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自称自治军总司令的旧桂系军阀林俊廷盘据柳市时，架设军用浮桥，（老百姓亦准过往，是强抢木商停泊在西门外水面的木排用作桥身。两岸桥头设有哨卡，监守。老百姓过河需要丢一两个铜板于钱桶内、该桥设立不久，林俊廷的军队开赴南宁后，木商收回自己的木排，桥即消灭，依然用横水渡船过河。

民众防空浮桥是于一九三八年尾由防空指挥部架设的，桥身是征借木商的木排。由柳州民团指挥部司令尹承纲兼防空司令官，派出该部上校参议覃鸿斌为第一任桥管处主任。该桥一遇空袭警报时开放，（不收过桥费）。平时群众过桥要收费，桥的两岸，设有卖票亭，购票过河，桥头设岗把守收票。但佩带机关公务员证章，则可免票过河。因此各行业的同业公会和工会人员也皆佩带证章（他们原是不能免费过河

的)。因而鱼目混珠，在桥头时有争吵，甚至打架，以后曾规定各业公(工)会不准用圆形证章，改用条形，以示区别。以利收费。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洪水暴涨，由于桥身是木排，排身密实，阻水，且初时的桥工是仓促组成，未有经验护桥，桥被洪水冲断，全部推走，幸在窑埠码头，得滨江镇江一村田盛友，发动渔民，飞驶鱼船抢救，计截获木排二十五张，飞捆绑在萝卜洲边，日夜派人轮守，水消后归还桥管处，满以为抢救有功，可以得到金钱物质奖赏，殊不知只得当时柳江县政府一纸公文表扬了事，当时这样做，是挫伤下面的积极性，不得人心的。

桥断后，这位上校参议兼桥管处主任覃鸿斌，应负完全责任，不但是桥管处的主任被撤掉，连上校参议的军职一并被撤掉。几经周折，才把浮桥恢复，转架起来。一九四〇年柳州市区，(当时还是柳江县所在地)成立动员委员会，该浮桥由动员委员会所属，在桥管处未曾物色人去接管前，仍由防空指挥部派人管理。在是年我已到柳江县临时参议会工作。因动员委员会的组成，系：民团指挥官(后改为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尹承纲为主任委员；县长为副主任委员；其余柳州师管区司令；县参议会议长；柳州警察局长；县党部书记长；县商会理事长；及增聘地方士绅张兆元(律师)马幹才等，均属委员。我们的议长覃采如，征求我的意见派我去担任桥管处主任，他认为我对水上船民熟识，可协助他们护理保桥，我感到覃鸿斌是上校身份，都难负得起这责任，我不同意去，后来他推荐冯直斋去做这主任。

柳江浮桥桥身，自木排冲走以后，陆续改变由大汽油桶为浮力，以后，又改变为大驳艇为桥身。都由马幹才委员主办其事。在冯直斋任职期间，桥已全用大驳艇结构了。本来他与桥管处的副主任陈焕章，及桥管处同事协作得很好。且冯老老成练达，勤奋工作，干了年多，渡过每年的洪水，而不发生事故，但他仍是忧心忡忡，坚决要辞职。在一次动员委员会的例会上，由师管区司令黄萝年，提出说是冯直斋要辞职，而梁伯贞想去做，两人都到来向他提出。而主任委员尹承钢事先知道这回事，是不高兴梁伯贞做的，但又不便拂黄之意，这次会议尹避不出席，由柳江县长萧劲华兼副主任，主持会议通过了提案，而被梁伯贞接替了。梁的工作能力远逊于冯，管理浮桥期间，连被洪水冲断桥两次，且断桥时用汽轮拖驳维持两岸交通，秩序非常混乱，尹承钢过渡亲睹此情景，一怒之下，把梁伯贞撤换，由会议通过调升副主任陈焕章接替。

陈焕章原是船民，当时是滨江镇河面江六村村长，他自幼熟悉柳江水性，自建桥以来他已参与其事，是最称职的人选了。不幸的是，在他任职其间（一九四二年）七月洪水暴涨，开桥后，两岸由汽轮拍着驳艇，维持交通，该驳艇是用两艇，横木扎紧，拍着汽轮边，装截过客，由于准备需要时间，开渡较为迟些，晨起，在南岸码头往北岸的人，等渡越来越多，尤以中正中学的学生，为了赶去上课，均争相拥挤，踩上驳艇，人多驳艇负荷量超过，扎艇的横木又被踩断，两驳艇如两瓣壳挟拢起来，人尽落水，死了三十多人。中正中学的学生，已死八、九人，造成了浮桥建桥以来，最大

的一次惨案。以后中正中学，开了一个追悼大会，各学校代表到会追悼，并一致声讨，要惩办桥管处为肇事凶首，后由柳州警备司令部，将陈焕章拘捕，不久转解桂林，交由广西绥靖公署处理。

陈焕章在桂绥羁押的第二年（即四三年）他爱人曾子华，到桂林探监并向桂绥署申请宽释，得桂绥副官处长唐纪，将陈焕章之案件，调来审阅，作为过失处理。来函给滨江镇长黄国华致意，由镇出面保释。当时我是该镇选出的参议员驻会，黄将此事与我商量，我促成此事，释放陈时，嘱他回柳，暂不露面，以免刺激民愤，后来陈焕章一直潜居河下，几与人们谢绝。

从此这浮桥管理视为畏途，人们不敢问津，尹承纲亦在会上说，管理这浮桥，是个烂事，率性找过烂人去做。提出由杨杰如去接受，（杨是张任民之舅爷，杨义之叔父，平日凭藉他们的势力，行为甚不检）杨亦不敢接，后来尹派苏焕章去劝他，说尹专员一万件事都批评你不好，就这一件事看中了你，还不去吗？结果杨到接管了。

本来杨杰如管理浮桥期间，虽无甚成绩，但亦未出差错。是年（一九四三年）柳江市政建设委员会，改变为柳州市政工程处，历任的处长是杨毓年，照例被聘为动员委员会的委员。在一次例会上，杨毓年提出，浮桥应属市政建设工程之一，应由他工程处所管。他领义务职兼任桥管处主任。于是会上各委员一致赞成，满以为浮桥得增添了市政工程技术员工力量，当有一番建树，岂料实得其反，以往浮桥的经常费，和断桥增添材料等特支费，规定提交动委

会，由审核组签证后，交财务组（县商会的委员）支付。一次断桥后的开支送到审核组审核，组长是参议会议长覃采如，以动委会委员兼任，而实际的审核业务工作，是由我处理，（我当时是议会驻会议员，业务分配是负责建设组）平时动委会的例会，多由我代表覃出席的。过去送来的桥管处收支数目，大致审核不大出入，在券上签注“核数相符”发还就算了。这次我发觉开支数目庞大，其中必有问题，我亲到桥上实地了解，桥身全长，在平时最低水位，用二十四组船敷设，每组由三只艇组成，三只艇扎拢的距离约长二丈四尺，艇与艇的空间横铺十块跳板，河面最低水位的宽度，约两百多米，水上涨时，两岸各加到三组船再涨就拆桥了。平时，桥上水面，抛的锚是十二门，下水面八门。经过实地查验得出了浮桥的基本数字。（附浮艇身长约五米，铺设人行的跳板约三米）再到汽轮机房核对使用燃料，当时的湿底汽轮是用茶麸燃烧蒸汽的每小时耗用二十六饼茶麸每天共多少饼及每门锚需用若干斤竹缆等具体数字。核对这次浮桥实际被冲走若干组船，随船损失的跳板，及锚和缆，用汽轮开渡的日数耗用多少燃料等。与桥管处所报各项损失及添置复桥所购的各项东西，虚伪报超出，从中贪污五十一万元（当时伪国币）这数目是相当惊人的，在我察对此事时，为了慎重起见，我特邀向来热心地方公益的马幹才先生（亦是动员委员）陪同一起，再仔细复查一遍，并按照他上报的购买竹缆、茶麸发票，向商铺查对，帐簿得他虚报加大金额的实据。以上各项整理成材料后，交由议长覃采如出席会议检举。在检举前，我还向覃采如提醒他注意，因杨毓年是李品仙（当时

国民党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的妹夫,不怕得罪权贵吗?覃说我不怕(后才得知覃之弟覃连芳在桂系中与李品仙是有矛盾的)覃邀我一同出席动委会例会,当会提出检举,覃则义正词严的,把桥管处的贪污事实,和数据列举出来,当尹承钢听完后,问杨毓年,说:你听过没有?你怎么搞的,杨答:我是派一个总务在下面管理的,我回去查查才知。后来尹叫他下次会议汇报,委员会为取得确证起见,再加派委员张兆元与马幹才及我,组织三人小组复查,认定证据确凿了,张兆元是律师,他甚懂得处理的法律手续,由他草拟检举文书,将这案遥送第四战区的执法总监,杨毓年与桥管处的主要贪污分子,均被执法总监传讯拘捕了,杨毓年为了市政工程处长,有他专职业务准他保释候案,接着不久柳市沦陷,四战司执法总监,已随长官部迁百色,胜利后又未迁回柳市,此案就不了了之。

我为了检举杨毓年的浮桥贪污案,动委会增聘我为委员,兼审核组。

自检举浮桥贪污案后,又由覃采如向动委会推荐严楷,去接理桥管处主任事,严是个军人,曾随黄梦年师,任连、营长多年,办事尚认真,无甚差错,惟在他接管后,时值日寇为了打通南北交通线,是必要争夺占领桂柳两城,因此柳市浮桥,为两岸最重要之交通工具,军运、商运、人口疏散的搬迁,日夜来往,络绎不绝,加上敌机空袭警报频繁,桥的负担甚重。柳州专署为了抗战适应需要,已迁去罗城县,原兼负动员委员会主任之责,交由柳江县长兼任,一九四四年九月,覃采如由柳江县参议会议长调任柳江县长,我

随去兼任社会科长，该浮桥交由我去负责监督。当时四战区长官张发奎，对此桥非常重视，时时发出严重的警告，如在这关键时期桥断并不能架成的话，有受最严厉处分的危险。故在此一两个月，我与严楷，日夜不停，巡在浮桥上面，无奈，在十月底，突遭一场洪水暴涨，人力实难抗拒，桥又被冲断了，冲去的桥船还可以抢救回来，飘浮的跳板亦可捞回或及时增添，最困难是冲断的锚缆，及铁锚损失无法要回。经过几日夜的努力，得到驿运站，和珠江茶楼水筏的支援，借用铁锚，才转搭起来。进于十一月市区内的机关单位和银行商铺都陆续疏散逃难去了，但我们未奉断桥撤退的命令，还是呆守桥上。六日上午住守在市区的作战部队，是二十六军，军长是丁式盘，突然派一工兵排排长，据他自称姓杨的，带来几名士兵，强行接管浮桥，我问他要命令，他说战时不讲这一套，不得已交给他，我即向柳州警备司令部，司令马维岳呈，说明交桥的经过，得到批准，我才放心，剩下留守的桥工十七名，由严楷率领向罗城方向撤退，沪桥的一只海福汽轮，我们早一天将它向上游疏散了。我完了浮桥任务后，回县府归队。当夜狂风暴雨骤发，七日晨，我到河边看看，此浮桥又被冲断，只剩江心中约三组船，看来这工兵排，来的人少，而又对柳江河水涨落毫无经验，怎不断桥呢？幸北岸的人已疏散完了，未造成居民困难罢了。

胜利后，动员委员会，及防空指空部已不复存在了，但浮桥已荡然无存。为了南北两岸的交通，该浮桥由柳江县政府从新架设起来，由县政府派张汉义为桥管处长。张在职期间，因贪污被专员公署督导员陈耀唐察觉，将他拘留在县

府，以后该浮桥曾有一段时间由马名驹（曾任柳城县长交卸后来柳）承包商办，后继由龙城中学接包承办，直至解放。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此浮桥，由于该浮桥来、往行人要收费。早在抗战期间，外地难民经此已啧有烦言，认为过桥收费，不独国内仅有，即世界亦闻所未闻。解放后，亦曾有一段时间收费，不久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设专职管理，准予人民群众免费过桥了。

自一九六九年柳江大桥建成“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结束了过去老百姓认为隔河如千里的艰难心里状态。车水马龙，换了人间一派繁荣景象，适在是年洪水将这历年多灾多难的浮桥又冲走了，大桥即成，它亦失掉再架的需要了。

附带说说：在一九四三年，柳江市政建设委员会，曾将全市所有城基公地标卖，将此款专作建设柳江大桥之用。后来成立桥工处，于柳侯公园之船厅，由闾德轩任主任，梁斗才任副主任。于中山东路城基地曾建造房屋一间，作彩标奖品（称房屋彩标）由来宾县大湾镇萧某中标得奖。第二次建造房屋于大南门斜坡处，为市民林敦度中标得奖，（他代表戏剧公会中标。）桥工处，以此方法，扩大筹款建桥，曾雇请广西省桥梁勘探队，在两岸（亦即现大桥之两岸）钻探桥基等工作，惜未具规模，柳市沦陷桥工处迁避罗城，胜利后。桥工处亦结束。

柳州市印刷业

市工商联供稿

黄尧卿 李希祐口述 刘郁兴记录整理

印刷术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自辛亥革命以来，柳州市印刷业已从木刻进入石印等现代印刷业。

柳州市第一家石印社，是 1926 年初，刘均生在弓箭街（现中山中路）开设的“同人”石印社，有学徒 2—4 人，业务范围很小，只是为当时香竿街（现曙光中路）的郭万福、仇同吉、覃福顺、吴万德等香铺印各种线香招牌纸，以及云片糕招纸及一些包装纸。后来业务发展，工人也增加到十多个。

石印是通过书写绘画，套上石板，用油墨复印，技术上较木刻印刷进步多了。

同人开业不久，四码头（现中山中路东段）又出现一家觉非石印社，经理人赵思云，股友有柯起渭、李勉斋，由于石板笨重，都得招收体强力壮的学徒，由两人手抬，将写好版面压上石板，然后手摇复印，也是较重的体力劳动。觉非除印学生习字贴，方洛本等还印制地图等等（1928 年印的柳州火灾图）就是觉非印制的。觉非石印社较同人石印社规模稍大，有工人五、六人。这时市面一般木刻印刷的学生

红字本，九宫格本以及学生习字本十行纸卷宗等木版仍然与石印并存。

1927年曾志诚、黄琳集资3,000元(东毫)在四码头开设生盛昌印务局。生盛昌资金较多，除有石印设备外，增加铅印，石印需用汽水纸汽水墨书写，汽水墨当时是德国进口的，写字要书法整齐美观，誊写后上石板才能复印，而铅字印刷，只需将铅字颗根据文字排版，校对复核，如有差错，可改换字颗排正，较石印便当得多，加以印刷精美，成本降低，因此，生盛昌开业之后，业务不断扩大，有职工15—18人。

生盛昌印务局为了扩充业务，还招收了一批亲戚或熟识朋友的子女做学徒，培养工人，但三年之后，有的学徒见印刷业有利可图，学徒期满后不干，自己另行开业。

1930年梁茂萱、黄尧卿、王明强等集资在四码头开丽泰印务局。有工人十多人。

1934年黄尧卿在丽泰石印社倒闭后又与刘云甫、肖坤集资4000元在中山东路开设大华印务局。职工也有十多人。不久蒋耀廷又在四码头开设三民印务局，也是十多人，这两家均备有石印机铅印机，铅字颗由广州或湖南长沙购进。是时柳州商号和机关学校、部队，因受广州通商风气影响，各种表册，信封、信笺、帐本招纸，以及学生用的习字本，练习本等，商品包装，广告传单，不论印刷数量多少，都是生盛昌、大华、三民、三家印务局承印的多，形成鼎足之势，业务也蒸蒸日上，当时确实是赚了钱的。

以后陆续开业的小型石印社还有蒋作才兄弟开的安兴、

安利，业务不大，只有工人二、三人。

七·七事变第二年京沪广州沦陷，机关商号，内迁柳州者甚多，市场日趋繁荣，柳州印刷业也蓬勃发展，日夜加班。1939年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迁来柳州，也附属了一个印刷厂。但业务不如生盛昌，大华、三民三家，因为这三家印刷厂，都是柳州人，开业时间久，熟客多，铺位又适中，第四战区附属厂也承接民间印刷，比较上面三家业务就少得多了。后来他们被当时的国风书店（经理王吉人江苏丹阳人）勾通，翻版印刷七联教科书（当时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及上海印书馆出版的《模范日记》、《模范作文》。被发觉后，上海八家出版商联名聘请律师向柳州地方法院起诉，1941年国风书店因犯违反出版和侵犯出版专利被查封。

1942年，当时柳州已有大小十 几家烟厂，如黄天泰、广全烟厂、三光、富国、大隆等烟厂，而当时的生盛昌、大华、三民以及第四战区长官部附属的印刷厂，设备限于石印，铅印，对于烟厂需印的商标烟盒，需要彩印的却无法承印。过去香港广州未沦陷前，各厂都在香港、广州印，自香港广州沦陷后，厂家已不能将印好的商标交车船发运，烟厂只能靠走私运进印刷品，这样不但商标供应，难以保证，运费也大大增加，增高成本。这时首先是黄天泰烟厂了解到桂林有家鼎丰美术印刷厂专印彩色商标，他派人到桂林一次就向鼎丰印刷厂定印双风牌烟盒十万个，提货时黄天泰还想把鼎丰包下来专印他的双风牌，独家垄断，但协议未成。印制彩色商标，为烟厂梦寐以求的，黄天泰在桂林提货

回来不久，三光、广全等烟厂得悉，就相继到桂林向鼎丰美术厂定印，解决了柳州烟厂彩色商标要走私运进的困难。

“一雷天下响”柳州市没有彩印，这样多烟厂需要鼎丰美术厂印刷，这样好生意，引起同行竞争。原桂林市一位石印小厂主廖润泉，就在桂林组织了几个股东，并邀请鼎丰美术厂的技术主力李希祐集资20万元（法币）来柳邕路山脚巷开设大成美术印刷厂。

大成美术印刷厂一开业，就受到柳州市各个烟厂的欢迎，只要大成能承印的就不再到桂林鼎丰印刷厂定货了。大成印刷厂的出现，是符合各烟厂利益的，它不但进货方便，而且降低了成本，促进市场竞争条件。所以大成一开业，业务就直线上升，它的业务上升，势必影响到桂林鼎丰印刷厂的业务下降，这样又引起了鼎丰厂当事人的注意。

大成美术印刷厂在柳州开业不久，鼎丰美术印刷厂的经理魏琴生，即在桂林邀集文星印刷厂和长沙市的民生印刷厂共同集资30万元（法币），来柳州屏山大道东（现柳州烟厂处）开设联益印刷厂，大成和联益两厂投产时间相差不多，生产设备，两厂都是一台火刀对开石印机，但联益印刷厂资金较大，因是桂林鼎丰厂联号，对顾客信用也较好，联益印刷厂投产之后，就想使用它的优势，垄断柳州市彩印。一段时间，它在市场上见到有合于印刷纸张，不论多少，全部购进，其它印刷材料也如此，目的想在印刷材料储备上卡住大成，另外暗中还对大成印刷厂的熟练工人拉拢，企图在技术上削弱大成厂。虽然在旧社会，在资本主义的同行互相倾轧，明争暗斗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积虑何其深也。但大成

印刷厂的工人完全是湖南老乡，资本虽少，技术工人都是小股东，与印刷厂休戚相关，凭着这种优势与联益印刷厂抗衡了一段时间，竞争是激烈的。直至1943年大成美术印刷厂因故改组，改组后的大成印刷厂，不但在资金上与联益平衡，而且在同行中购进了一批较优的进口油墨，提高了彩印质量，取得顾客的信任。这时原广西企业公司又在中正南路（现解放南）开设了一家彩色印刷厂即广西企业公司彩印厂，但是大成美术印刷厂仍以其各方面的优势，发展业务。

1944年夏秋之间，日寇加紧进攻湘桂，长沙、衡阳相继沦陷，桂林、柳州各商号纷纷疏散，大成美术印刷厂，负责人计划疏散较早，行动坚决，材料机器设备均先后全部租用汽车运输，虽然付出的运费从当时来说是高了些，但设备不受损失，他迁到贵阳后即能恢复营业。而联益美术印刷厂，广西企业公司的印刷厂，搬迁较迟，打算依靠铁路，减少支出，结果因铁路阻塞，疏散不及时，两厂机器设备全部损失。至于生盛昌、大华、三民印务局也因疏散较迟，同归一尽。

1945年六月间，侵华日寇将在广西的部队陆续撤走时，将柳州市区房屋，焚烧殆尽，但到日敌宣布投降时（8月14日）市区临时修建的房屋即有三分之一恢复。这时中亚烟厂，中孚烟厂，广全烟厂等也先后陆续开业，而与之相关的印刷业，形势完全改观，即生盛昌、三民两家印务局无力复业，只是大华印务局由黄尧卿独资另辟新址复业。彩印的联益及广西企业公司的彩印厂也无力复工。只是已在贵阳设厂的大成印刷厂，调来资金，从新购买机器，在本市谷埠

街东二巷以李希祐为经理筹组桂记大成美术印刷厂。

胜利后的柳州，一片复兴景象，印刷业一片繁忙，这时已有十几家烟厂，只有一家桂记大成美术厂彩印商标，业务就更忙。原来一般工厂是讨好顾客，逢年过节，向大顾客送礼的。而这时的大成美术厂，独家经营，有时忙不过来，各烟厂要求印刷厂赶印务，因此，逢年过节，烟厂都大担大担的烟酒礼物，送到大成美术印刷厂，这种情况，就可以反映当时印刷业的业务，真是喜人。因此到1946年下半年在黄竹巷出现新新彩色印刷厂，经理凌石泉，是合伙生意，有职工二十多人，机器设备不如大成印刷厂，仅能为新华烟厂印制比较粗的盒皮。以后光华、天成、华丰、华大、新华、凤凰等印刷厂陆续开业。

随着形势发展，大成美术厂于1946年秋还向上海安利机器厂购进一部胶板机，这在柳州来说还是最新设备，大成印刷厂由于机器设备较同业新，技术工人多，工人不外流等条件，在印刷业一枝独秀，到1947年职工已增加到六十人。它在生产时间，为了技术保密，即使同行也谢绝参观，因此，在彩印商标技术质量，保持优势，1948年它还分出部分资金，技术工人到昆明开设滇记大成美术印刷厂，形成滇黔桂联系优势。

光华印刷厂是在桂林迁来，经理朱文奎原是上海科学印刷厂学徒出身，有铅印印刷各方面技术，该厂迁来桂林时，改名为桂林科学印刷厂，朱是技术师傅，他来柳州时资金不多，设备很少，仅有一台四开机和一台圆盘机，一台手摇铸字机，初时有工人十多人，后发展到三十人。光华厂除承印

一般业务外，还承印报纸书刊，兼铸铅字，虽然它是小型铸字机，手扳一次只得一个字，但一天能铸几千到一万颗字，日积月累，就改变了柳州印刷业过去的字颗要从广州或长沙等地购进的情况，柳州本身能够配套了。

柳州市印刷业，由民国初期的石印社，改变了木刻印刷，经过十多年才有铅印，又经过成十年才有彩印，发展是缓慢的，但从整个行业看，除几家在柳州沦陷时全部损失，未能复业外，其余如大华，天成、光华等二十多家，经历了国民党的通货恶性膨胀，不但没有一家倒闭，而且得到发展，全行业25家于解放后1956年全行业参加了公私合营或者走上了合作化，在行业中是得天独厚的。

注：

柳州市私营新华烟厂简史

市工商联供稿

熊华章撰稿 黄炳桑整理

一、私营新华烟厂筹建经过

1、筹组烟厂之起因

广西卷烟厂的兴盛，使过去专美南方的南雄烟叶为之逊色！一九四四年日寇南侵，迫近广西时，龙岗烟厂迁到湖南晃县。至一九四六年秋，苏子牧为股友排挤，退出龙岗烟厂去到贵定。当时在贵定的福建同乡，开设很多烟行，如：建华、建成、黔桂、福兴、永安、民兴等。另由贵定几间烟行组织专为采办烟叶和销售烟叶烟丝的联号，计有：昆明之明德行、重庆之联德，贵阳之大德，柳州之同德、广州之同孚行等。苏子牧去到贵定以后，便与贵定诸同乡商议筹建一个卷烟厂，取名新华烟厂，决定在柳州设厂。因为柳州水陆交通都很方便。那时卷烟用纸要靠进口从广州方面运来。协商妥当后，遂派赖泽三来柳住于同德行，负责进行筹建新华烟厂的各项工作。

2、筹集资金的情况

在贵定的几家烟行，当初对筹建新华烟厂信心不足。因

此各人认股不见踊跃，最多是认千余万元（当时的国币，下同），少则一、二百万元。当时只筹得一百九十股，每股一百万元，合计得一亿九千万元。我最初只投资二百万元，后来要各股东增资时，我才再投资二百万元。以当时的烟叶价格计算，每百斤烟叶为六十万元，收集的股金只能买到烟叶三万一千七百斤。由于资金不敷周转，后由苏子牧向外地同乡先后招得六十五股，计六千五百万元，至此共有股东五十六户，计二百五十五股，股金二亿五千五百万元。就是新华烟厂开办时的全部资金。

3、开创时的机器设备及产量

我们股东看到当时柳市各烟厂的产品质量较差，原因是有的是大型卷烟机，有的是手工卷，至使烟支空头，长短不一，大小不均，松紧各异。股东们考虑到：要把厂办好，把牌子做开，就必须把质量提高，提高竞争能力。提高质量必须改变机器设备。于是决定购买一部进口大型卷烟机，免产生上述诸弊病。即派人到澳门购进一部大型卷烟机，同时购进两部中型切丝机。因此新华烟厂生产的香烟，烟支饱满，松紧适宜，消费者都感到满意，很受欢迎。其后又逐步扩充，共有大型卷烟机、切丝机各六部。产量由原来日产十五、六大箱，增至日产一百大箱左右。

二、新华烟厂的经营管理情况

1、原材料的来源

新华烟厂仅有资金二亿五千五百万元，除租房及购买机器设备外，已无钱购烟叶了。在贵定的各股东商议下，决定

另组织一个华德烟庄，专购烟叶供应新华烟厂，以满足新华烟厂的需要。这样一来，同德烟行的烟叶就不一定要运往重庆、贵阳、广州等地销售了。既解决了新华烟厂缺乏资金购料的大问题，又使贵定同乡各烟行的烟叶扩大了销售，做活了生意。同时各烟行知道新华烟厂要什么等级烟叶，都派采购员到贵定附近各乡镇去，选购著名的地道好烟叶，以适应新华烟厂的需要，做到行厂均利，公私获益。其后新华烟厂本身资力渐厚，购进烟叶亦多是贵定城绅、二贩的。大庄叶户也都自找上门兜售烟叶，甚至以半赊销或全赊销方式交易，期限都在一个到三个月才付款。至此新华烟厂所需的烟叶得到充足的供应，没有缺烟之虑了。而附属原材料如盘纸以及包庄用纸等，俱从广州方面运来。电报一发，款一汇出，这些原材料便源源运来，至此原材料供应已能运筹自如，可保无缺了。

2、销售产品的方式方法

建厂时在贵定股东会议上，研究产品质量问题，认为凡从事卷烟工业者，其经营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在开始销售一个牌子时，把质量搞得很好，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不胜不休，待牌子畅销以后，便逐步降低质量，提高利润，滞销之时，再创新牌子；第二种一开始就认真搞好质量，始终如一，保证质量。经股东决定，采取第二种办法。从1947年一月起，新华烟厂销售的大英雄和福星牌香烟，直到1955年公私合营时止，都生产这两个牌子。

新华烟厂除经常与各联号互通电信外，必须每晚上与贵定通电话一次，互报行情，决定卷烟和烟叶的抓放。行情查

好时则抓而不放，看淡时则反之。同时利用各地同乡烟店作为代销处，以扩大销路范围。尤其是接近解放时期，人们手中之钞票，唯恐贬值，纷纷购烟贮存，需钱开支再把烟卖出去。大家认为大英雄有涨无跌，可以保本有利，以致供不应求。

3、新华烟厂发展的经过

烟厂开办时，仅有大型卷烟机一部，中型切丝机一部，全厂职工有六、七十人，实行三班制，每天最多只能生产二十大箱香烟。后来卷烟机逐步增至六部，职工增至三百余人，产品随之增至日产一百大箱左右。到一九四九年时，新华烟厂在太平东街的门市部每天还未开门，已有成群购烟者等候，铺门一开，卷烟一扫而空，由于挤购，往往发生争吵，以后请来两位保安警察驻厂，以保安全。

4、新华烟厂职工的生活待遇

烟厂职工，每月工资初则四、五万元，随着币制贬值，逐渐增至每月九至十万元，伙食费由厂方供给。包装女工的工资是计件的，每包十条烟，初则一斤米，后增至二斤。但包的快慢不一，慢的一、二十条，中的三、四十条，快的六、七十条，中慢者居多。每天工作都超过八小时，伙食自备，厂方不供应，也无职工福利待遇。每月发工资时，按当时的柳州报纸所报米价计算发给钞票。当时大多数职员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但也有少数职员发了财的。

5、新华烟厂与同行的竞争手段

在一九四六年新华烟厂建厂时，柳州市上卷烟厂较大的有中孚、东亚、广全、大陆等数厂，其余还有很多手工卷

制的小厂，如美光、大联合等。新华烟厂的资金当初也是很薄弱的，在这样众多的烟厂中站住脚确不容易。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各种条件：经理人的本领要强，技术人员力量也要强，机器设备要好，资金周转要快，运输要迅速，销售地点要多，市场情况要明，抓放要准确。这样才可以争取主动。新华烟厂基本上具备了这些条件。有贵定几家烟行为基本，有各处同乡为辅；有进口卷烟机；原料采购力量较强；可通过贵定各烟行以最快的速度选购最上等的烟叶及时运到厂；产品除供应本市外，其余的即运到各地代销处。由于各个经营环节都配得很好，因此业务发展迅速，都超过其它各厂。其他各厂的条件较差，叶料多由柳市购进，价格高昂，质量差，影响了质量的稳定性，加之消息不灵通，产品售出后，无法将烟叶购回，处处被动等等原因，所以，新华烟厂在同行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

三、股东的互相倾轧及其他

1、一场股东的倾轧：

新华烟厂创办人苏子牧因患胃溃疡，不能管理烟厂各事，请来好友张介兴代行管理。一九四九年秋，苏子牧胃病加剧，到香港就医，在进行第二次手术时不幸去世。是年九月在柳召开了一次股东会议，成立董事会，选出董事五人，另选一个监察员。投票结果，最多票的为苏子升，其次是我，依次为黄国基、苏子行、苏钦明。苏子升得票最多，应为董事长。在会议期间，股东勾心斗角甚为激烈。如：股东苏群起想篡夺经理权，对张介兴进行攻击，迫使张介兴提出

辞职。然而，苏群起之用心各股东皆知，因其自私自利，如将卷烟厂交给他，无异将厂送给他一样，所以众股东选出苏钟泮为经理。

2、新华烟厂遭火灾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柳州市河南大火灾，我厂所有设备全部烧光。当时柳州市长魏伯到烟厂现场观察，问我怎么办？我说，想复厂。市长说，我支持，便将谷埠新华烟厂的一间房屋作临时办公室和对外联络处。准备复厂工作。但当时董事苏钦明等提出，复厂无前途，主张向保险公司领回四十万元保险赔款，分给各股东。我说服他们这种分光的错误想法，坚持在市领导支持下继续经营的意见，在市领导的大力扶助下，很快将原联合烟厂的旧址和设备拨给新华烟厂。在全厂员工共同努力下，很快恢复生产。

3、新华烟厂的积累

我们建厂时订下厂章，规定三年内不分股息，红利，以便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不准偷漏税款，确保正当利益。到一九五二年火灾前，全部资产已达五十多万元。及至一九五四年清产核资时还有四十三万一千五百元，它的利润达到投资的十七倍。又如发觉苏子仁等密谋以假税证营私时，当即将他开除。确实做到不偷漏。

四、新华烟厂走上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一九四六年秋开始建厂，到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宣布公私合营，首尾刚好十年。

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当时的柳州市卷烟公会理事长——中孚烟厂经理王定一，为了柳州市的卷烟厂要进行公私合营，特找我商谈。他希望新华烟厂首先参加联营，我说，我要回厂与大家商量才能决定。他又要求我，不必回去商量了，要我当机立断。我再次坚决回答，非商量不行。他也不敢再压服我。我回厂考虑：当时中孚、中亚、广全三家烟厂，均将倒闭，不但外债累累，连工人的工资亦无法发给了；所存又是一些破旧设备。若新华参与联合，一定会被他们拖垮。不如独自申请合营为当。报告呈上主管部门后，即派人来厂指示，政策是公私兼顾的，希我们放心！当时虽未获批准，但我们搞好生产，创造条件，迎接合营的信心更足了。

到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我和工作人员王子甫同志谈到为我厂要扩充厂房，预计要五万多元。我说，何必多花这笔巨款，你代我反映上去，我们与国营新新烟厂合营，我们设备齐全，足够使用。他着我打个报告，看上面如何决定。于是我便马上写报告申请公私合营，第二天就接到批准与地方国营新新烟厂合并，成为公私合营柳州烟厂。大大鼓舞了全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使新华烟厂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柳州中国植物油厂简况

钟美全

前 言

旧中国植物油料厂，乃官商合办之官僚资本机构，三座大山之一也。

此厂（以下简称中植厂）在全国各省、市，甚至小县，都设立办事处或炼油厂。专营桐油、茶油、花生油、麻油、菜子油、椰油、蓖麻油、棉子油、豆油等油脂，但经营的是以桐油出口为主。由于美国桐油产量极少，因此对美国来说，桐油是在工业油漆上必需之品，特别是在武器方面：为飞机、战舰、大炮、坦克，及各种枪枝，用量极大。由于用桐油漆涂上后，可以防腐、防水，使器物经久耐用，而且美国需要量大。中植厂在全国内组织一个庞大机构，收购桐油输出香港，提炼精纯以后，销售各国，特别是与美国签定长期销售合同，赢得了最巨的外汇，这个数字难以统计。以外中植厂还利用官僚的权威和国家的名义，在街头上加“经济部”三个字，即“经济部中国植物油料厂”，在外观上认为是国家的机构，“冠冕堂皇”，实则利用国家银行的资金在

全国各地产油脂区域大量收购桐油，营私之机构也。

中植厂总处在上海，其他各地设立办事处或炼油厂。抗日时期，总处迁到重庆。只就中植厂经营桐油一项，全国各地输出美国的数量是相当大的。据不完全统计，总在几千万吨，获取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外汇，总在数十万元。这都是全国人民的血汗，以饱私囊云尔！

一 柳州中植厂的成立

在一九三九年、上海总处派经理王龙生来柳州组织办事处，设在东门街，即陈炳堃旧军阀之公馆内。当时笔者由中植厂秘书龙寿生介绍参加入中植厂工作。而我当时是柳江路经纪行的职员，由于经营油脂略有经验，初入中植厂为营业员，后升为供销科长以及襄理等职务。

柳州中植厂设立办事处后，专收购桐油输出香港，提炼后转销美国。柳州初办时期，每年收购桐油数量较少，估计五百吨左右。由于王龙生有着外交手腕，与柳州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中国农民银行等各银行经理互相勾结，取得了信任。同时也打着国家的经济部招牌，向各银行贷款，此外还有中央银行总裁是张嘉璈。而中植厂总经理是张嘉铸，他俩是同胞兄弟，据闻亦有关系在内也因此在第二年业务扩大，在长安（即融安）、古宜、鹿寨、宜山、贵州榕江等地设立分处。从各分处大量收购桐油、茶油及菜籽油。根据每年柳州与各分处在内估计总在二、三千吨以上。

中植厂在柳州可以说无本生意。只是宴请各银行经理，运动银行贷款，凡有贷款问题无不迎刃而解。除贷款

外，还有一种“押汇”办法，即在柳州运出一批油脂，在银行领取一张“押汇”表，填上并附运输公司提货单，保险公司的保险单等手续，向银行作押货汇款百分之七十（即油脂总价壹佰万元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七十万元，这样就能在油脂启运时，已收回货价70%）。藉此又在市场上抢购油脂。由于国民党时代，金融贬值，物价飞涨，转眼之间则涨10—20%，大获利润，不待言也。

此外中植厂还利用油脂废品，在一九四〇年成立大型的“肥皂厂”。生产建国皂，经济皂，以及黑皂。当时商人经营肥皂厂大受其影响，均皆倒闭关门。而中植厂之肥皂畅销各地，获利甚巨。此肥皂厂旋迁梧州，解放后改为松脂厂。

柳江路是全市的经济中心，油脂市场所在地，每天油脂交易总在五百吨左右。广州、港、澳等地的出口商人都云集此地。每天收购油脂都要看中植厂的动向。武汉、广州失守后，油脂市场价格下降，出口商人不敢染指，但中植厂在这机会中，一个早上竟然收购桐油壹仟担有多。

后来由于日寇在武汉停止进攻，油脂价格又飞涨回来，甚至超过原来的价格。中植厂大获其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水运受阻，而中植厂所收购之桐油，则经贵县、玉林、肩挑到广州输出香港，仍然获利。

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部成立“复兴公司”，统制桐油购销，广西也成立贸易公司，在柳州设复兴公司统一收购桐油，在此情况下，柳州中植厂所收购的桐油就交与广西贸易公司。

关于广西贸易公司代复兴公司在柳州统制桐油收购情况简介如下：

①桐油价格，由该公司公布，每市担约50余元（记不清楚），但随时可以调整价格。

②商人售货必须先到该公司业务科登记数量，取得交货凭证，再由商人将货送到该公司指定仓库（梳子街旧统税卡）验收给回单据。然后商人执此单据到该公司业务科结帐收款。此种麻烦手续，使商人交货困难言之不尽也。

但商人登记售货后，不一定即时可以交货验收结帐。必须排队，至少也要等一周，多则等到二、三十天。曾记中植厂有一批桐油约二、三百吨，交货占了十多天，办完后才轮到一般商人的队伍去交货。

一九三九年一月，重庆中植厂总处万县（四川）中植厂从长江用木船十余艘把一千余吨桐油运到南宁。当时柳州中植厂经理王龙生奉上级命令到南宁与广西贸易公司联系交货，我也一同前往。由于当时日机轰炸南宁市区，该批桐油若停留时间太久，恐被轰炸，遭受损失，广西贸易公司立即命令仓库停止收购商人的货，用了十余天时间专验收中植厂的桐油。这也是官僚资本的权威所致。王龙生在南宁仅仅两天旋即返柳州，我则每天都到广西贸易公司仓库督促交货工作。直至交货完毕结帐后返柳。

③每天商人派员到仓库交货，要按业务科登记号数次第验收，桐油验收化验合乎出口标准则退货不收（其中商人给仓库人员送有礼者可以破例提前交货云云）。

根据以上情况，桐油乃我国产量最多的农副产品，而且

又是农村（或农场）收入最大的经济作物。柳州乃广西经济贸易中心，桐油集散之要地，同时又是穗、港、澳的巨商云集收购桐油地区。由于国民党中央财政部成立复兴公司统制收购桐油，从此垄断了这类产品。如柳州油农肩挑桐油到河南谷埠街售与小商贩者，而小商贩则按照复兴公司公布牌价压低收购。但是在未统制时期则不同了，倘若有港、澳、穗巨商到柳、而小商贩可以提高价格收购转手从中又获较大利润，而油农也笑逐颜开。

因此在我国内桐油市场，有着不景之象。油农因挂牌限价关系，丧失了信心，而桐油巨商，无权输运国外，则经营者亦少矣。

回忆在抗日时期，闻各地油农，由于桐油统制出口，价格限制，因此油农砍伐桐树，作为柴烧者不少。所谓“桐贱伤农”。

在此情况下，柳州中植厂在业务上则转变方向。一方面在柳州外围，以鹿寨、长安（即融安）、古宜、以及贵州榕江等地收购之桐油，运到柳州后全部交给复兴公司；一方面收购其他油脂为茶油、菜油、生油等，设立炼油设备精炼后输出香港。

此外柳州桐油市场，有一次×××商行突然比广西贸易公司挂之价格提高二、三元一市担，在市场抢购桐油，一个早上收购到一千数百市担，事隔三天，广西贸易公司公布牌价调高。该商人获利甚巨。据闻说系商行与该公司负责人暗中勾结作弊。

在一九四〇年，中植厂又组织铁工厂产生大型锅炉于柳

州黄村附近，但因设备等之问题，无法开展，以致停产。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寇在钦州和防城之龙门登陆侵入广西南宁，中央派第五军机械部队（杜律明所辖）到广西参加抗战。由于该部队是机械化设备，需要汽油，而且要的数量很大。该军负责人与柳州中国植物油料厂合作于全州创办一个“酒精厂”提炼酒精（96° 以上的质量）代替汽油。

关于提炼酒精是以糖浆（又名桔水）为主要原料。柳州中植厂与第五军机械部队合作协订，由中植厂负责出资金收购糖浆，第五军负责技术设备提炼。因此，中植厂委派商人在柳城一带大量收购糖浆输运全州。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时期，提炼酒精总在一千吨以上。

当时日寇非常猖狂，滇甸路国际交通线以及越桂路中断，汽油非常奇缺，无法输入广西，而以酒精代替汽油，支持了第五军装甲车发挥威力，打击了侵入广西的日寇，在昆仑关战役中得到好评，但是由于陈诚与白崇禧两人倾轧关系，终归失败。在中国三十万兵力，对日寇四万兵力反而吃了大败，殊为遗憾。

（二）柳州中植厂的政治活动

抗日时期，第四战区长官部迁在柳州窑埠盘龙山下。由于中植厂经理王龙生在交际方面非常活跃，整天都与长官部高级人员宴会，人事方面很好。第四战区长官部每月必需举行一次中山先生纪念周大会，召集全市柳州数十个单位参加，而且每月开会必需颁发奖旗一面，以资鼓励。凡参加单位得到奖旗者，非常荣耀。（此旗得之不易也）

有一次长官部高级人员将在下一个月纪念周取得奖旗的秘决告诉中植厂经理王龙生，中植厂王龙生即刻督促总务科买了一大批灰色斜布，同时聘请裁剪技师到厂连夜赶制中山装二、三百套，分发全厂职工，等待下月纪念周的召开。

后来在当月的纪念周来临了，中植厂经理王龙生在当天刚晓的时候，鸣笛集合，全厂职工由窑埠过河（当时是抗日，日本飞机空袭厉害，中植厂迁到窑埠办公），列队出发到达河北体育场，第一个报到者为中植厂。

八时左右，张发奎长官，策马到达会场，验查到各单位，第一个报到者为中植厂，职工列队整齐在前面，而且职工制服都是新的，精神奕奕，而张发奎长官面容微笑，随即宣布这次纪念周奖旗发给柳州中植厂。在大会场中，掌声如雷，张长官亲自举起奖旗一面，以资鼓励。柳州中植厂经过这次获得纪念周头奖旗以后，赢得了在柳州的政治资本，威信日高。其实令人一笑置之。

一九四四年，柳州沦陷后，中植厂在沦陷前一部分职工疏散到贵阳、重庆。一部分职工离厂，各散东西，柳州中植厂暂告停顿。

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植厂重庆总处，指示恢复，广西中植厂由杨增负责，。随即在梧州成立办事处，并发展炼油厂、松脂厂、肥皂厂。杨增委派桂林、南宁、柳州三地区为分处，奉上级指示此三地区分处属于梧州办事处管辖。桂林分处主任是杨任民，南宁分处主任是许嘉荣，柳州分处主任是钟美全（兼襄理）。广西区人事布置后，随即展开收购油脂工作。柳州中植厂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在抗

日时期已取得了相当高的地位，抗日胜利以后信誉地位更加活跃。首先在收购油脂来说：抗日胜利后，柳州商人在经济方面有困难，而中植厂得到各银行的支持贷款，这也是官僚权威占了很大便宜，因而在收购桐油及其他油脂都非常顺利，四川、贵阳、昆明等地油商蜂拥地将桐油售与中植厂（先钱后货亦有），每天收购量总在一千或八百市担以上。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我去香港旅行，路过梧州，梧州办事处经理、杨增嘱我在香港购买英纳格、阿米架、西马等外国产手表，并且又购最新式美国金质五一派克钢笔。返柳州后，则分送柳州中央银行王季桑经理。交通银行施永循经理。中国银行陆昌达经理。以及中国农民银行经理赖高年。总而言之，中植厂在柳州经营油脂业务，在经济贷款方面是得天独厚的。

中植厂在柳州油脂市场上有相当大的威信，例如收购桐油来说，不管你是何地出口商人，必需以中植厂为“马首是瞻”。每天早上必需先看看中植厂的一举一动，才敢开盘（即交易）。卖者看中植厂今天桐油出价若干一市担，买者则看中植厂是否压低或提高价格，然后作出决定。有时中植厂故意制造空气，今天油脂价格行情不好，要压低价格收购云云。岂知转过背来，相反地提高价格大量收购，以致出口商人束手无策应付。

由于中植厂是利用银行贷款资金经营的，他提高三元或五元一市担也不在乎，主要是抢到桐油在手，输往美国，这样，赢得的外汇，何止此区区之数呢？

以外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风云突变，国共和平谈

判，消息传来，柳市场油脂价格猛降，出口商人不敢沾染桐油一两。在此情况下，中植厂无动于衷，自动出牌价照昨天的价格收购，一天早上竟然收到桐油达千担左右，主要是四川、贵阳、昆明等地商人蜂拥抛出。但是到了第三天，由于国民党蒋帮出尔反尔，不接受和平谈判，和平消息已成泡影，解放军乘胜南下，解放南京，不久又渡过天险长江。国民党政府跨台大势已定。

全国金融波动，物价飞涨，在此时贵州、四川、昆明等地之油商大吃其亏，垂头丧气，每市担桐油价格损失估计在五元以上。

总之，中植厂在解放前掌握了柳州油脂市场，而商人称之为“油王”。而我也做了中植厂官僚资本的小卒，回忆起来，真是不寒而栗。在一九四七年间，奉上级指示，嘱我到沙塘镇访旧广西省政府建设厅长：伍廷颉。送中植厂股息给他。由于“伍廷颉”是中植厂总处的董事，养病在沙塘。

一九四九年，七月间，临解放前，中植厂广西区梧州办事处总经理杨增发来电报，召集桂林的杨任民、南宁的许嘉荣、柳州的钟美全等人到梧州开会，会上，杨增发言云：现在解放战争局势紧张，要布置广西各地业务以应时局之变，布置要点如下：（一）物资问题，各分处所存油脂，全部运梧州集中转运香港；（二）资金问题，各分处所存银行多余资金也全部运到梧州；（三）人事问题，各职工为故意离厂的（其实有些职工被解雇的），即发给职工每年一个月工资，按年资计算，如留守厂的发给职工三个月的工资，以作应变费用，

留厂守候，等待解放。后来杨增又亲自召我到他办公室座谈：

“你不要怕，如解放了，你将中植厂的财产制造表册，移交给人民政府就行了。工作仍然可以照干云云”。我返柳州以后，接奉梧州转来上级指示，发给职二遣散费，留厂职工发给三个月应变费。

但是杨增他思想早有携带资金逃跑香港的企图，会后不到一个月，终于他携带资金同全家老小不辞而别，已逃到香港去了。这是他的一个阴谋手腕。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五日，柳州获得解放了，我督促总务科黄运昌迅速制造表册，将柳州旧中植厂官僚资本机构全部财产移交与柳州市军管会，人民政府接管后，改为中国油脂公司柳州分公司，仍然派我为代经理之职。

一九五二年三、五反运动时期，错判我贪污应变费，被判四年徒刑，而接受思想改造教育。一九八二年获得平反。

附 言 之 一

由于我之水平有限，兼年龄七十二岁了，回忆卅余年之事，是不十分清楚的。特别是在数目字方面，不能没有出入，但是事情经过都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还希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附 言 之 二

中植厂总处在上海，抗日时期迁往重庆，总经理为张禹九（又名张嘉铸），董事长为吴鼎昌，至于董事人员很多，记忆不清。伍廷飏是中植厂董事之一。

旧柳州中植厂广西区人事名单如下：

梧州办事处总经理：	杨增。
副理：	文福田。
襄理：	李斌良。
襄理：	彭麟才。
襄理：	钟美全。
襄理：	杨任民。
南宁分处主任：	许荣嘉。
桂林分处主任：	杨任民。（兼职）
柳州分处主任：	钟美全。（兼职）

解放前柳州工业概况

唐天禄 白正骝

解放前的柳州工业，在三十年代以前是寥寥可数的几间，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广西成了西南大后方，疏散的人口涌到广西，柳州人口猛增，与此相应，工业也随着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数量逐渐增多，尤其到抗战胜利后的几年，是解放前柳州工业的兴旺时期。其中有广西本地人创办的；更多的则是由北方疏散到柳的外乡人创办，他们原处工业比较发展的江浙地带，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创办人都有一定技术，带有一定资金，做起大生意兴旺起来；有的工厂则纯属迁来，又从柳迁走，所谓“过路”工厂。这些工厂从原来仅有的几家军用工厂，发展到有数十家大小不等的民用工业，下面按行业简单介绍。

一、军用及民用机械业

最早在柳州的机械工业要算一九二八年桂系军阀在鸡喇村创办的“广西机械厂”，同时也是广西机械工业之始。该厂虽名为机械厂，实际上是军阀的秘密飞机修配厂，属于官办军用性质的工业。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

后，桂系军阀把它改为航空委员会第九飞机修理厂，正式名为军用工厂。到抗战胜利后，李白黄依仗美国“救济”物资，在第九飞机修理厂的旧址办起了“柳州中国农业机械公司”，这时才开始生产一些畜力榨蔗机，手摇玉米脱粒机等，摆脱了军用性质而转向民用机械业。

在三十年代，柳州有的一批机械工业，主要是官办的军用机械厂。如防毒面具厂即是桂系军队的军用工厂，主要为生产军用防毒面具，创办于民国廿五年（1936年）厂址在窑埠，有几百人做工多是当兵的，也有一些是该厂当时曾在柳州招的工人这算是当时柳州较大的军用工厂。

广西子弹厂，是国民党桂系军阀办的兵工厂，专门生产子弹（后期又生产炮弹）。约创办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厂址也在窑埠，人数几百左右，也算是当时柳州较大的官办军用工厂。

除官办的军用工厂外，还有一个商办的军用工厂即捷和钢铁厂，规模较官办的小些，约于民国廿六年底（1937年）从广东迁来柳州，厂址在东门，主要生产军用钢盔、铁铲、铁镐等军用物资，人数五、六十左右。

这些厂在柳州的时间不算长，如防毒面具厂、广西子弹厂、炮弹厂都在柳州沦陷时迁走，捷和钢铁厂在柳州被日寇飞机轰炸时焚毁，但这些厂可算是柳州的第一批机械工业，有的厂在柳州招过工，为柳州培养过一些机械工人，对柳州的机械工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影响。

民用性质的工厂在三十年代是很少的。仅见的是一九三七年由梧州疏散来的广成兴机器厂。来柳后由朱福等廿余人

合股在太平东街南一巷开业，改名为工联电焊厂，是为柳州较早的商办民用机械业。主要是修理私营汽车配件、轮船发动机。四四年改为同兴厂，四六年改为工联机器厂。

四十年代初，日寇侵占我大片土地，大量人口疏散至西南后方，柳州人口这时也急剧增长。工厂的数量除以上的几间外有了增加，而且这时主要的是民用机械性质的工厂的增加，如益泰铁工厂、梁芳机器厂均是生产建筑材料及修理汽车的工厂。但因为广西后来也成了日寇进攻的主要目标，柳州已不成其为后方了，人口又向贵州、云南等地疏散，所以这时的机械工业工厂虽有增加却依然很少。到了柳州沦陷时，不但机械工业无存，其它业也几乎逃尽毁灭，柳州处于萧条境状。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几年，是解放前柳州工业兴旺的时期，江苏、湖南、广东人以及广西本地人纷纷在柳州投资开设工厂。机械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三友电焊厂、强华翻砂厂、长寿铁工厂，合和铁工厂等十余个商办民用机械工厂。虽然比不上官办工厂那么大规模，其一般在几十人以下，多数只能是进行一些修理，不能生产工作母机（如机床），而且严格的来说有的不太象机械业工厂，但是这些厂都是当时具有一定规模的，已具有机械性质的工厂了，形成了抗战后至四九年解放的柳州机械工业的繁荣。

抗战后官办的机械工业很少见，仅见的亦是较著名的系高工机械厂，该厂原是高级工业学校的附属工场，供学生实习之用。后来学校的教师合股投资，除供学生实习之外，开始对外营业。除雇有几十工人外，还利用了学生实习这一批

廉价劳动力，规模算来比较大。主要生产畜力榨蔗机、抽水机、白糖离心机、皮带车床、刨床等生产工具，算为名符其实的机械工业。所以该厂当时曾自称为广西机械业的“老二”（老大是柳州机械厂）。

另外在抗战时期迁来柳州，不久又迁走的“过路”工厂也有一些，如中华铁工厂（1942年左右迁来，柳州沦陷时又迁走），柳江机械厂等。

二、化工业

解放前的柳州的化工业非常落后，只有几家。

较早也较大的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桂系军阀在鸡喇村创办的“广西酒精厂”。这个厂创办在鸡喇的目的是配合“广西机械厂”的生产，因为当时汽油很少，往往以酒精代替。供飞机使用，该厂创设时已有100多人以上。主要生产酒精。据说在鸡喇还有一个叫“第四酒精厂”的工厂，主要生产酒精。其具体情况不详。

官办的比较早的化工业还有1926年在宝塔山脚（即今灯塔山脚）下创办的士敏土厂（即水泥厂），但这个厂、因为附近缺乏粘土和煤，未能正常生产。

商办的化工业只是在抗日战争以后才陆续发展起来。当时适应人口增多，出现有一些肥皂厂如广业肥皂厂，天成碱厂均是生产肥皂。玻璃业有合兴隆玻璃厂等，这些厂多是广东人所办。各厂的人数一般在十人左右。

三、纺织业

远在一九一三年柳州就有了织布业，那时柳州只是一、二万人口的城镇。除了部分是本地人办的织布业外，大部分都是广州、湖南人来这里办的。他们都是生活所迫来柳找生活的。湖南人织的土布很受广大农民的喜好，因此柳州的织布业就逐渐发展起来。一九一八年就有二、三台织布机，到一九二三年湖南人已占据了全柳州的织布业，机子的数量扩大到一百多架。到一九二六年可算是织布业的旺盛时期。伍廷飏在做广西省建设厅长时曾在柳州举办织布工厂，名叫“平民习艺所”，招收有数十名家庭妇女及女童工，厂址设在青云路（后改设到今公园路小学右侧），但该所存在时间不长。该所大力提倡改良织布的质量，当时能维持相当的水准，生意逐渐兴旺。同时织布工厂多达二、三十家，各家有一、二十架机子。总共有四百多架机子，年产量达十万匹。

一九二八年，河北大火灾，设在西大街一带的织布厂全部被烧，织布业一度萧条。

一九三〇年李宗仁在柳购买大批军衣服装，织布业又得以复转，可谓中兴。可到了一九三四年又是一蹶不振。一九三八年柳州人口增至十几万，织布业又有了发展，有机户三百余户，织布机有六百多架，月产布达一万多匹，年产十五万匹。这个数目依然是供不应求。到四四年日寇飞机轰炸，织布业被毁。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年）旋又上升，开动的机子达二百多架，四七年有一百八十多架。此后逐渐减

少，到四八年只有一百架，临解放时只有二十多家。

另外染布厂在解放前只有几家。1935年在湾塘路有商办的三友染布厂，开始时有七个工人，到1941年增加到十八个工人。

抗战胜利后，在映山街有商办的鸿丰染布厂，但工人只有一个。

四、印刷业

印刷厂是1926年创办的同人石印社，有工人10人以上，第二年在培新路成立有一个较大的印刷厂叫丽泰印务局，经理是黄明强。最兴旺时有工人二十多个。

最早的印刷厂1927年在中山路开设的生盛昌印务局。该局到1928年后就有工人十多二十名。抗战胜利印刷业也得到较大发展，成立有桂记大成印刷厂。（1942年）——附表。

这些印刷厂一般都拥有几台石印机，到后来就发展到有铅印机。工人一般也都请有十人左右。承包业务不广，一般不能生产彩印。

五、卷烟业

卷烟业也是在抗战胜利后兴旺起来。当时拥有一两部卷烟机左右的工厂达几十家。较大的有1946年9月成立的新华烟厂，厂址在太平街后迁桂柳路，人数达500人以上。全年烟产量约7,600大箱。此外较大的还有大陆烟厂、广全烟厂、中亚烟厂、越华烟厂等（见附表）。

同卷烟业密切关系的有一个锡纸厂，创于一九四七年，有工人七十八人。主要生产卷烟用的锡纸。

六、火柴业

民国三十七年柳江县救济院附设有一个火柴厂。人数有廿多人，是收容县抗战后的难民并雇请有技术的工人组成的。算是官办火柴厂。生产“舞龙”、“帆船”，两个牌子的火柴。商办的火柴厂计有三间即：柳江火柴厂、大明火柴厂、西江火柴厂，规模都在二、三十人左右。

从以上来看，柳州在解放前其工业是相当薄弱的，真正象样的工厂没有几间，不过虽然如此，柳州解放前的工业到了抗战以后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的。这里我们仅就掌握的一些资料对解放前柳州工业作简略介绍，肯定是很不全面的。谬误亦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解放前柳州工业一览表

(一)

项目 行业	厂名	创办 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备	工人数	产 品	备 注	资料来源
机 械 业	广西机械厂	1928年	鸡喇村	省办	(第一任厂长) 黎国培				修理飞机		本表根据访问及档案局资料综合编成
	防毒面具厂	1936年	窑埠	省办				100人以上	军用防毒面具	该厂是军事工业, 44年后迁走。	
	广西子弹厂	1934年	" "	省办				100人以上	军用炮弹、子弹	44年后迁走。	
	协和钢铁厂	1938年	柳州东门	商办				50人左右	军用铁铲、铁镐	在39年至40年间被日本飞机炸毁。	

续表(二)

项目 行业	厂名	创办 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 备	工人数	产 品	备 注	资料来源
	上海 修理厂	1948 年9月	鱼峰路	"	韩文奎			2人 左右	修理汽车		
	三友电 焊厂	1945 年后	鱼峰路 60号	"	高鸣鹤	五百 元光 洋	氧焊设 备二套 电焊机 一部	4人 (左右)	承包电 焊业务	该厂原名交 通烧焊厂19 49改现名。	
	泽记机 器厂	1942 年迁 来	鱼峰路	"	陈锦泽			4人 左右	修理汽 车零件		
	盛昌五 金电镀 厂	1948 年	驾鹤路	"	吴松昌			4人 左右	马达、电 焊工具一 套		
	工联机 器厂	1937 年	太平东 街南一 巷	商办	朱 福		两部机床		修理汽 车配件		

续表(三)

项目 行业	厂名	创办 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 备	工人数	产 品	备 注	资 料 来源
	强华翻砂厂	1945 年9月	太平 西街	商办	浦永根		手摇风扇 一部100 斤化铁炉 等。	2人	承包修 理、火焊 翻砂等业 务。		
	泰昌翻砂厂	1946 年6月	太平西 街104 号	商办	朱心源	光洋 三百元		10人 左右	汽车木炭 炉、水箱 等。		
	长寿铁工厂	1947 年	长寿路	商办	吕焕渠		车床三部、刨床三部、冲床一部。		以修理 为主		
	国华电焊厂	1945 年10月	驾鹤 东路	商办	张世乾		电、氧焊 工具一套	2人 左右	承包各 种焊接		
	云桂电镀厂	1949 年2月	谷埠路 东一巷	商办	王桂林		二匹马力 电动机一 台。	4人	铸造、电 镀金属用 具。		

续表(四)

项目 行业	厂名	创办 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 备	工人数	产 品	备 注	资料来源
	合和铁 工厂	1947 年	谷埠路 东一巷	商办	何根祥	二百 万元 伪币		10人 左右	专修汽 车零件	48年才有此 名,名称,名 开办时,名 称不详。	
	益泰铁 工厂	1941 年	华风湾	商办	徐景之		熔铁 十二座	50人	建筑材 料,铁路 道钉,鱼 尾板。	1951年后改 名为立成铁 工厂。	
	悦兴铁 工厂	1948 年1 月	谷埠路 东一巷	商办	周 滨			长工1 人临工 若干	铁路道钉 桥梁器材		
	梁芳机 器厂	1940 年	驾鹤路 二巷	商办	梁 芳			4人	汽车零 件,及修 配汽车。		
	东方电 焊厂	1946 年	" "	商办	梁 福		电焊机一 部氧焊工 具一套。	5人 以下	承包各 种焊接	49年以后改 名为东亚电 焊厂。	

续表(五)

项目 行业	厂名	创办 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备	工人数	产 品	备 注	资料来源
	昌兴修理厂	1945 年		商办	吴寿卿			9人 以下	配制各种 机器零 件,兼营 汽车。		
	陈述记 模型厂	1945 年8 月		商办	陈 述			2人			
	中华铁 工厂	1938 年8 月		官办		五十 万元	动力设备 36马力木 炭柴油机 四台。	109人		柳州沦陷 后迁走	
	柳江机 械厂	1943 年迁 来	羊角山	官办 (中 央)				200人 以上		柳州沦陷 时迁走	
	柳江机 器厂	1939 年6 月		中央 交通 部		五百 万元	动力设备 340马力 柴油机五 台。	370人		柳州沦陷 时迁走	

续表(六)

项目 行业	厂名	创办 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备	工人数	产品	备注	资料来源
	桂绥第 三器生作社	1942 年8月		官办		一 万 元		24人			
	广西公 路机械 厂	不详		" "			煤油机一 部				
	经纬纺 织机制 造厂	1941 年12月		" "		五 百 元 (国 币)		55人			
	福龙修 机厂	1935 年3月		商办		三 千 四 百 元	五马力煤 油机一 部。	9人			

续表(七)

项目 行业	厂名	创办 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 备	工人 数	生产项目	备 注	资料来源
化 工 玻 璃 业	士敏土厂	1926 年	宝塔 山脚	省办	陈丕杨				生产 士敏土	因原料缺乏 未能正常生 产。	
	合兴隆 玻璃厂	1947 年		商办	左炳			15人	灯罩、 灯坤、 灯药瓶。		
	光明玻 璃厂	1944 年8 月		商办	谢镜源				灯罩、 灯坤、 灯药瓶。		
	骨粉厂	1941 年11 月	窑埠	省办		四十 五元 (未 贬值 国 币)		30人 左右			

续表(八)

项目 行业	厂名	创办 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 备	工人数	生产项目	备 注	资料来源
	宏兴玻璃镜号	1925 年		商办	李少华	二千 元东毫			镜画、 纸张。		广西 年鉴
	天成 视厂	1946 年4 月		商办	梁宗彬	六亿 四千万法币		8个 以下	肥 皂		
	广业肥 皂厂	1945 年7 月	斜阳路 22号	商办	陈 镜			2人 左右	肥 皂		
	广西酒 精厂	1927 年		省办	刘炳新	四十 七万 元		30人	酒 精		
	柳江火 柴厂	1947 年		商办	梁耀庭				火 柴	该厂在解放 前夕停办	

续表(九)

项目 行业	厂名	创办 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备	人数	生产项目	备注	资料来源
火柴业	大明火柴厂	1949年6月		商办	周恩来			30人左右	火柴	该厂曾称柳州火柴厂	
	(救济院附设)火柴厂	1948年		官办				20人左右	火柴	该厂后并入柳州火柴厂	
	西江火柴厂			商办					火柴		
纺织业	鸿丰染布厂	1947年	映山街	商办	杨启				染布		
	三友染布厂	1935年	湾塘路	商办	胡鉴波	约值人民币五百元		18	"		
	经纬纺织厂			官办	黄源培 黄××						

续表(十)

项目 行业	厂名	创办 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 备	人 数	产 品	备 注	资料来源
印 刷 业	生盛昌 印务局	1927 年至 解放	中山路		曾志城		有好几部 石印机。	20人 左右		开始时两人 合股,在民 国18年以后 。黄琳参加	
	桂记大 成印刷厂	1942 年	谷埠路	商办	李希祐	一千 三百元 伪币	对开平台 机、橡皮 机各一 台等。	30人 左右	承包印 刷业务	开始时经理 是梁尚贤。	
	大华印 刷厂	1936 年5 月	中山路 (41年) 培新路 (36年)	商办	黄尧卿		四开平台 机一部 石印机二 部等。	35人 左右	"		
	美华印 刷厂	1946 年1 月		商办	黄厚元	三百 万元	石印机七 部元盘机 一部。	6人 左右	"	后改名新华 印刷厂。	
	天成印 务社	1945 年10 月	中山路	商办	刘崇生	九十 万元	三号石印 机三部。	5人	"		

续表(十一)

项目 行业	厂名	创办 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 备	人 数	产 品	备 注	资 料 来 源
	同人石 印社	1926 年			刘均生		三号石印 机四部。	10人 以上	"	其资金约 值人民币一 亿元(1954 年币值)。	
	丽泰印 务局	1929 年	培新路	商办	黄明强			20人 以上			
	新华 烟厂	1946 年9 月	桂柳路	商办	苏子牧 等	二 亿 千 百 元 (法 币)	卷烟机五 部切丝机 三部。	520人 以上			
烟 草 业	大陆 烟厂	1946 年左 右	谷埠路	"	吴竹林						
	广全 烟厂	"	谷埠路		胡荣文						

续表(十二)

项目	厂名	创办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备	人数	产品	备注	资料来源
行业	越华烟厂	"	西大路		黄宝						
	中亚烟厂	"	兴仁路		陈栋森 81岁		小机每小 时可出 烟四万 支。				
	中孚烟厂	"	北门街		王定一						
	东亚烟厂										
	香港烟厂	"									
	安南烟厂	1948年	谷埠下街	商办	庞海鲲	二千元	卷烟机 一台	20人 左右		每天产 25万支	

续表(十三)

厂名	创办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备	人数	产品	备注	资料来源
新华英修车厂	35年6月		商办		二千元		18			《西年》三上 《年鉴》第四册。
捷和钢铁厂分厂	38年11月		"		五十万元	七马力柴油架油机一架	103			
第一机器生产合作社	39年7月		"		四万八千元	木炭机、柴油机、各部。	30			
利民机器厂	40年11月		"		一万六千元		14			
捷兴煤矿发火机制造厂	41年1月		"		三万元		16			
艺兴机制厂	41年2月		"		二千元		22			

续表(十四)

厂名	创办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备	人数	产品	备注	资料来源
华强机器厂	42年1月		" "		三万元		10			
梁联机器厂	42年1月		" "		二万元		7			
梁芳机器厂	42年1月		" "		二万元	24马力木炭机一部	8			
志成修机厂	42年4月		" "		一万元		14			
西工区第二合作社	42年4月		" "		三万元	10马力柴油机一部	5			
建业机器厂	42年7月		" "		十万元	8马力柴油机22马力木炭机各一部	27			

续表(十五)

	厂名	创办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备	人数	产品	备注	资料来源
	易和煤 气机制 造厂	42年 9月		" "		六万 元	45马力煤 气机一部	22			
	群力机 械厂	42年 11月		" "		十万 元		38			
	捷和钢 铁厂	1931 年		商办		五十 万元	十马力发 动机两部	30 以上			
	协兴五 金制造 厂	42年 7月		" "		一万 元		15			
纺织业	广西企 业公司 染织厂	35年 7月		官办		二十 六千二 百元		400			
	柳江第 一织布 工合社	41年 1月		商办		四千 元		13			

续表(十六)

厂名	创办年月	厂址	性质	厂主	资金	设备	人数	产品	备注	资料来源
柳江第二织布社	41年1月		" "		三千元		10余人			
柳江第三织布社	41年9月		" "		二百四十元		21			
柳州机工纺织厂	42年7月		" "		四万五千元		12			

抗日时期柳州市经纪行业概况

刘振先

(一)

柳州经纪行，古称牙行，俗称平码行或九八行。抗战时期以后，改称经纪行。因为这个行业，主要是居中代客买卖，以口舌唇齿之劳，来做生意，所以古时把它叫做牙行。（古代对个人做经纪买卖的又叫牙子或牙人）。又因它居中介绍买卖，双方都委托信任，因此，这个行业代客买卖货物，都必须斤两十足，秤码公平，不应克扣多少，损害一方利益，所以俗称平码行。还有这个行业以代客售货所得的佣金为业务唯一的收入，于委托出售货物的卖方，收取佣金为货价的2%，卖方实得货款为百分的九十八，所以叫做九八行。这种行业在上海、广州、香港也有，叫做南北行或进出口行，是因为其经营的业务，包括国内外进出口贸易范围广泛而言。

清末民初以至抗战前期柳州的商业活动，限于当时的国内政治动荡，内战频仍，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当时交通，主要是靠民船、汽船来运输。而陆运部分则只靠一小部分公路汽车。商业情报迟滞，省内货币和省外货币不便通汇，资

金和商品的交换周转率低。当时的柳州经纪行业主要经营货物出口，计有米、黄豆、桐油、茶油、生油、牛皮、薯蓣和其他的土特产。至于进口的有棉纱、布匹、汽油、水火油、五金器材、车胎和其他洋杂（百货）。出口的货物则来自柳江上游的古宜、长安（今融安）、柳城、大埔和龙江上游的金城江、怀远、宜山、三岔等地。此外，还有柳州附近的乡村及来宾、象州、雒容、石龙等地。进入的货物则来自香港、广州等地，当时限于交通不便，直接跟省外的贵阳、昆明、重庆等地的商业来往还很少。

（二）

抗战发生后，上海、南京、广州以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新加坡马尼拉等地相继沦陷，印度支那半岛为日寇控制，大量的侨汇、黄金和抢运到达内地的物资都要寻找投资的方向。柳州当时为大西南后方重要的港口，商贾辐凑，游资集中，经纪行的业务经营范围广泛灵活，可以容纳大量的资金，可以通过行商方式，贩运货物，分帮计算盈亏，容易抽调资金和走私漏税。因此，当时经纪行商号大量增加。该行商店原来集中开设在沙街，（现柳江路）这时扩展至正南路（现解放南路）河南大马路、谷埠一带。更重要的，这时经纪行的经营范围、方法和过去迥不相同：

a：以代客买卖为名，实则以自营为主。其方式如下：

1、把本店大部分资金用行商名义，分成若干买卖小组（广东人叫做私帮），从产区、外地或本地进行购销买卖活动；照缴佣金给本店。

2、和外界、外地有商业活动的店号或私人联系，以行商名义，拉拢他方入股；组织私帮，经营货物购销买卖，由本店代办。通过这种方式，促使本店的经纪业务开展，扩大业务关系和范围。

b、当时的经纪业务，不仅是经营土特产和进口洋杂（百货），还有一部分较大资金的行号，进行黄金白银买卖，并和官僚资本的“国营”、“省营”银行的个别高级人员勾结，进行套汇、套息。用空头仓单抵押、以押汇、买汇名义，套用“国家”资金，大做无本生意。此外；也有兼营地下钱庄，接受省内梧州、南宁、桂林和省外衡阳、曲江、贵阳、重庆、昆明等处货币汇兑。

C、有一小部经纪行商店，并无充足资金，只领得一纸开业执照，向外界进行投机诈骗，随时停业倒闭。当时的经纪业店户歇业倒闭的颇多。

（三）

一般经纪行业商店从业人员，大致不超过十一人，计：经理一人（有些设副经理一人），管帐及现金一人或二人（或内柜一人，外柜一人），文牍一人，行情购销员二人（广东人叫买卖手），报关纳税提货秤手一人至二人，青年店员二人（广东人叫后生，负责清洁铺面、帐房、招待住店客人茶水等杂务工作），炊事员一人。

每天营业时间，同其他绸布、百货等业大致相同，夏季七时半左右至晚间八时，长达十三小时；冬季营业时间较短，然亦不少于10小时。有工作就做，并无什么特别规定休

息时间。午饭晚饭由店供应，集体在店开饭。一年到头，除年终除夕前一两天和春节一星期内（即年初七八日左右），商店暂时停止营业放年假外，并无其他假日或星期例假。记帐沿用我国旧式簿记（当时有一间西华行用新式簿记，是例外）。

经纪行商店在筹划经营、谋取利润方面，也费尽心思，另有一套。例如，要扩大本店信誉影响，争取客货来源，除遵守信用、忠实为客人服务，负责代买卖双方做好提货、交货、报关纳税等手续外，更重要的是：要经常向客户提供正确行市情报，争取客户多委托本店进货或销货才是经营作风较好的行号。另外，也有部分行号对客户欺骗，利用货物市价变动，套买套卖客户的货物，挪用客户货款；更严重的，有盗卖客户货物，拖欠货款，倒闭潜逃等。

经纪行因为经营货物种类繁多，所以对于一般货价，特别是主要商品如米、豆、油、纱、布……等行市价格变动，是注意调查、分析并用书信或电报跟有关客户互通情报，决定进货或销货。这种商情报导，抗战前柳州经纪行大的商店除上述用书信或电报作为通信手段外，有些还分旬（每十日）将一般货物行情的最后一天的市价列出，油印一张行情报，分别寄给外地的有关商号客户，间或写上对某种货物起伏的原因和将来的发展，提供客户参考。抗战后，柳州经纪行除了上述通信方式外，还有长途电话，私人电台（即国民党部队的电台、向商人传报商情、搏取经费收入，并从中获得货物市价情报，为那些军官做生意的响导），通信的地区范围扩大，遍及当时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城市，如贵阳、昆明、

重庆、甚至沦陷区的广州、上海的商情，也能从私人电台传来。例如：1943年冬敌伪冻结封存上海的棉纱，柳州的西华行，顺福行即从广州转来情报。

经纪行商店的经理和营业员（买卖手）每天早市都跑街去探听行情，根据本店或外店的物价情报结合市场情况，回来碰头，决定货物开盘市价。如有重大变动，分别用长途电话或电报通知有关客户。至于兼营金、银汇兑的行号，对市场更加注意十分灵活。

解放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个行业部分商店资金转向制药、火柴等工业投资，走向社会主义公私合营道路。

笔者一九四一年起在柳州经营进出口商业，开设顺利行。一九四六年兼任柳州私立中正中学校长，解放后，中正中学易名为新华中学，仍任校长。

抗战时期柳州工商业经济概况

刘拯先

一 抗战前柳州的工商业经济

抗战前柳州工商业的经济活动，是集中贩运购销柳龙两江上游各县镇的宜山、怀远、思恩、河池、南丹、长安、三江、榕江以至贵州的独山、遵义、贵阳等地的桐、茶油，黄豆、谷米、竹木、牛皮、五倍子、药材等土特产。转运至梧州、广州和香港等处出售。换购棉纱、布匹、火油、汽油、五金器材、轻工日用品物，西药等等进口物资回柳。当时它的经济活动范围是属于地方区域性质。因此，当时货物的运输和货币、汇兑、业务经营的方向，物价的变动，只以本地区的，供销情况和有关区域的物价涨落，货源畅滞等条件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对于全国性的经济活动，反应是迟纯的。以货运而言，当时柳州的货运，主要是靠水上航运。至于陆路，因公路运输路线短，且运费高、载量小，故运输量不大。柳州通上游的航线，长安（今融安）一线，仅可通吃水线的机动轮船（俗称火船）。长安以上的航线和柳州通宜山、怀远等地的航线则要用木帆船（俗称民船）。从柳州至下游梧州的航线，其运输工具有火船及由火船拖带的民船，货运时间长，

由柳州到梧州的火船，航程最快也要三天，一般到梧州连同起货时间，最快也要五至十天。如转至广州总要两个星期。若从广州办进口货到柳州，因溯江逆流，最快也要半个月以上。其运输载量亦不大。关于当时的商业情报工作，主要是靠邮递信件及行情报单。能用有线电报来通报行情，只是极少数的大商号，而且只是在货价有很大的幅度变动、同时这些商号又需要及时购销货物时，才用电报通信。

流通的货币，除当时政权不稳定的广西政府发行广西地区的纸币外（如陆谭时代的旧桂币，李、白、黄、时代的新桂钞，地方还习惯使用银毫硬币如：广东双毫，其次广西自铸的双毫，还有光绪年间的龙双毫，还有某些场合如买卖鸦片烟，也有用光洋交易的，（折合广东双毫其比率大约为：1比1.2）。因鸦片烟是贵州云南出产，那里的出售鸦片者，又惯用光洋，故到产地购买时要用光洋。

柳州，在这种交通不便，商业情报梗塞，商品流通迟缓的情况下，当时其工商业经济活动，自然只有很大的区域局限性。

二、抗战时期柳州工商业经济的变化

1937年“七·七”事变，对日全面抗战，上海沦陷，战局由华北逐步南移。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陷香港。上海、广州、港、澳以及海外侨商大量货物资金，纷纷转移到抗战后方。柳州地处西南后方交通的要冲，在这异常形势的推动下，当时柳州工商业经济，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兹分述如下：

1、日寇攻陷香港，加强封锁沿海各口岸，对我实行所谓“全面武力封锁禁运”。当时我国虽已开辟滇缅路，以缅甸属密芝那为中心，运输军事物资至云南等后方地区。但运输量很小，且公路崎岖，运输不便。尤其在1941年以后，日寇已经攻占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其武力足以威胁东南亚，海运也在日寇武力控制下，我后方所需的民用物资和必要的工业器材，滇缅路都不能运进，故无法解决。民用所需柳州和敌占领区，如广州、香港、越南的芒街等地毗连较近，在贸易交往方面也有长久的历史因素。同时，柳州又是西南后方的交通要衡，在这些客观条件有利的行势下，柳州遂成为当时与敌经济战的前哨基地。它从下列五条路线由沦陷区吸取我方需要的器材物资，并相应地输出我方的物资。

(1) 从香港大鵬湾、沙鱼涌、淡水、惠阳、沿粤北至曲江(韶关)转衡阳到柳州。

(2) 从澳门、前山、石岐、至南海、九江渡河到鹤山、沙坪转肇庆入广西梧州到柳州。

(3) 从广州、佛山转江佛路到沙坪转肇庆经梧州上柳州。

(4) 由越南芒街至东兴向东至广西灵山、乐民等地转贵县到柳州。

(5) 从香港或澳门用机帆船(广东人叫“电扒”)到阳江三丫港登陆转罗定、德庆，再转广西梧州到柳州。

故柳州当时市场热闹，从而促进工商业经济空前的变化。

2、由于上述情况，柳州成为当时西南后方重要的货运

枢纽和重要的贸易港口，从而促使其金融市场空前活跃。当香港沦陷后，国民党政府把当时中央银行香港分行的业务，移交给中央银行桂林分行经理。但实际上桂林分行的业务，无论是在代理国库方面或向其他银行信贷来往方面，都远比不上当时的中央银行柳州分行。唯一的原因，就是柳州的贸易市场的热闹大大超过桂林。所以柳州金融市场的活动，也比桂林活跃得多。据记忆所及，当时的柳州银行，除省属广西银行柳州分行外，国家的银行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四所，省银行有广东、湖南、贵州等银行，还有全国最大的民营商业银行——金城、实业银行都在柳州设立支行。再新加坡、马来亚、侨资经营的华侨银行和华侨联合银行，亦在柳州设立支行，香港经营金银业最大的商号也在柳州设立分号。其他如广东潮州帮的光裕银行，四川帮的聚兴诚银行，亚西银行等等都在柳州开业。由于货运频繁，游资充斥，市面大宗交易除棉纱、布匹、汽油、轮胎、染料、西药、五金器材、桐油茶油、牛皮、粮食等货物外，它们还经营金银和外汇买卖，主要是美钞和旧港纸。柳江路经纪行每日货物成交最高数额，记忆所及以1943年至1944年第一季度为最高。因为1944年秋日寇已发动所谓“打通湘桂铁路攻势”。柳州人心动摇，准备初步疏散。当时棉纱日交易额最高可达四百条（包），布达三百多箱（每箱五十匹）。黄金买卖投机性最大，在柳州抛出，在重庆或昆明交货，有时日成交高达一千多条泰条（每一泰条重旧市秤12两。）至于市内买空卖空的黄金交易数字，无法记忆。由于贸易金额巨大，银行的存储信贷业务也异常活跃。当时银行对商业经济采用承兑、买

汇、套汇、抵押、长、短期的信贷等办法，也刺激了商业的投机倒把。

3、如前所述，柳州的工商业经济，在抗战前是局限于地方区域性的活动。但抗战发生后，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大，促使其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以商业情报而言，当时柳州和其它地区所交换的货物市价和金融波动情况，不仅扩大到西南各省抗战后方，还远涉及到沦陷区的上海、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印度新德里，（因为柳州部份外来的侨商，如永隆金号，常从香港套汇美钞至新德里转至重庆汇回柳州抛出）。情报的工具也扩大，有航空信件，隔省的长途电话，无线电报和私人勾结部队的军用无线电报。因此，一个省市或一个地区的物价波动，都会迅速地传到柳州，柳州的物价波动同样也迅速地传到其它省、市、地区。同时，沪、粤、港等地的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营业作风，也就污染了柳州的旧市场的营业作风。

4、1944年11月末旬柳州沦陷，1945年7月初柳州光复。抗战期间集中在柳州的外省的大量黄金，虽然这时大部份抽回原处，但柳州商场投机倒把的作风却继续蔓延。由于国民党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柳州的工商业，也就在赌博性的投机倒把的营业中来挣扎，来欺骗、来图私利。解放前夕，市面掀起了金银买空卖空，囤积粮食、纱布、油料等重要民生物资，炒放日息之风，弄得民不聊生。虽然有一些工商业者办起一些小工厂，如烟厂等等，但他们能够幸存，也是靠物价暴涨，囤积原料获得。至于工人的生活，处于更困难的境地，那是不用说了的。以上种种，都是我亲身经厂亲

见亲闻的柳州工商业经济概况。

最后，还有陈述的：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1950年以后，国家经济恢复发展，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柳州的私营工商业和全国私营工商业一样，得到了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份力量。

注：炒放日息：贷放以日计息。例如借100元，每天利息2元订期五天立单（称本单），付本时，先将五天利息收扣，只借到手90元，到期还本100元。又叫“炒本单”。日息最低1%，高达10%。期限从一天起。

回忆公私合营永新织造厂

市工商联供稿

盛 德 奎

一九五一年春，柳州市政府为了繁荣经济，市工商管理局长余凯丰，号召工商界投资与公方组织柳州市公私合营永新织造厂。提供公私合营厂的模式。当时工商界中有陈栋生（原中亚烟厂经理）王定一（中孚烟厂董事长）盛德奎（原国华书局经理）黄炳桑（和泰百货店经理）叶日青（群益行经理）等十余户私营工商业配合公方筹集资金一万五千元。组成董事会，由工商局长兼任董事长，王定一任经理（义务职），聘袁剑雄为大科长（下设生产、供销、总务三组），秉承董事会决议进行工作，开始筹备工作，一切事务由袁剑雄负责，由市人委发介绍信派袁剑雄到上海学习、参观、采购机器设备、招聘技工（郭章根、吴阿鸿、赵有节、沈绳祖、徐孝常、俞章富、李国华）十余人。经过几个月筹备就绪，于当年八月一日投产。产品主要是：五一牌毛巾、文化衫、背心、各种线袜、拉绒棉袜等。产品由百货公司包销，棉纱由纱布公司供应，生产发展很快。之后，陆续招收张永林（原南方书店会计）为会计，赵有节为出纳，李凤鸣为供销，左炳为总务。

五二年“三五反”运动，余局长被审查，在运动过程中经市工商局、市财科干部（内有黄守仁、黄汝庄）审查帐目

凭证，经过内查外调，均属相符。余凯丰在停职反省期间愤而自杀，王定一被暂押（不久释放）。市府派刘允成任经理。不久，由于内部不团结矛盾加深以至停产，发不出工资。刘被调走。组织上安排陈栋生为副经理。于53年将私股全部退出，将永新织造厂改为地方“国营柳州市染织厂”。委袁剑雄为财务科长，现在为市财政局顾问，陈栋生为行政科长。

从此这个厂发展到目前柳州市针织行业里的主要的几个如：柳州市针织总厂，拥有职工2899人，柳州市印染一厂，职工1782人，印染二厂职工1328人，柳州市袜厂，职工990人，柳州市被单毛巾厂，职工2226人，市染织厂，1684人，市针织二厂，282人，市棉织一厂，2679人，市棉织二厂3397人，市针织运动衫厂，413人，市捻线厂，465人，总计职工18145人，这些厂的主要干部、厂长，大都是原公私合营永新织造厂的职工和技术骨干。如：针织厂副厂长吴阿鸿，车间主任徐孝常，俞章富；被单毛巾厂科长沈绳祖、赵有节、李凤鸣；印染厂厂长郭章根（现调自治区纺织工业厅厅长、工程师李国华。现在这些厂的产品远销到全国各地，有些产品还销到国外。

回忆解放前柳州仅有映山街有几家手工织布机和中山路一家织袜厂，规模很小，都是家庭手工业小工厂，从业人员几十人，经过35年不断发展壮大，轻纺行业已具现代纺织设备，先进技术的规模，如：柳州市针织总厂、柳州市第一、二棉纺厂，化纤纺织厂，织布厂，印染厂，染织厂，帆布厂十多家。产品、产量、产值增减速度惊人，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更快。

柳州三青团从组成到消灭

蒋 霖

柳州三青团（全名三民主义青年团柳江分团部），一九三七年在柳州筹备成立。团址在东大路（即中山东路和罗池路转角向北处）筹备委员会的主任是高天骥。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救亡工作蓬勃兴起之时。青年们的情绪十分高涨，以各种形式走上街头进行宣传，组织义演、义卖，捐献支援抗日前线。唤起群众抵制日货，揭发奸商。三青团组织的成立，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们救国的热忱，更广泛地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因此，该组织在抗战时期深得青年们的拥护，组织发展也很快，围绕在三青团周围的非团员青年也很多。

三青团柳江分团组织成立后，据董咸熙老前辈了解，1938年第一任团委主任为吴赞之；1939年第二任主任为韦勋猷；1939——1940年第三任主任为周佛成；1941——1942年第四任主任为张国光；1943年主任改称干事长，干事长为王剑功，干事为陈如平和董咸熙。吴赞之、韦勋猷、张国光均属地下党员。因此，抗日救亡工作，搞得轰轰烈烈。三九年董咸熙曾参加发动一角劳军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三青团的性质也随着变

化。当时三青团柳江分团部的干事长是冯培仁，书记曾英，总务股长冯祖杰，录事冯忠勋、吴昕，其后是曾广玫，组织股长曾广亮，股员陈作霆、蒋霖、宣传股长张鑫，股员冯萍，女青年股长叶菁。胜利后回柳办理“团员登记”，经过登记了解团员分布情况，编起了九个区队，二十六个直属分队，分散在柳江、柳城、雒容三县辖区之内。属于区队的有柳江县政府、广西供应局、县中、高农、思贤、进德、小山、官塘村、雒容等，属于直属分队的有柳州广西日报社、柳东、柳西、屏山三镇、中正、高工、柳师、大道等学校、宪兵第五团、柳州机场、警局。散布各乡的有中团、穿山、里雍、平川、广源、土博、流山百朋、六道、成团、三都、里高等。这些组织的区队长有覃维英、陈群恩、汪锐、覃其涵、全志洁、曾瑞荣、覃鼎权、覃志和等人。分队长有董伟、陶绍裘、黎绍球、曾文刚、蒋宝仁、郑贤、罗承纲、李荣艳、韦纯宽、蒋光裕、罗崇扬、欧阳翰朝、杨传玉等人。

组织编成后，1946年夏，召开了一次团员代表大会。听取分团部的工作报告，通过团部的预、决算，并选出执行委员，冯培仁、曾广亮、王剑功、董咸熙、陈作霆五人，后补执委蒋霖一名。监察委员杨义等人。组成了三青团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内战在东北开展后，柳州广西日报发表了一则新闻报道，标题为“国军攻占开源县”。中统徐来携报纸到三青团找冯培仁谈及此事，说是报社有问题，不该使用“攻占”二字，随后他俩去专署。不久，柳州广西日报社社长罗培元1946年冬被撤换，调回桂林，由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宣传组长张洁

接任。他从桂林带来了一班人马，把原编辑部的人员全部撤换。任总编辑的刘业馥、副总编辑熊文焕、编辑董伟、记者杨扬、蒋培志、邹文光、白子光校对周玲等人。全都是三青团省支团在桂林主办的青年日报人员，而且都是干事长，书记股长一类骨干。只有编辑陈恩本是由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转来的。后来担任该报唯一的女记者蓝秀珍，也是由冯培仁介绍的，这样就加强了三青团在柳州的政治实力。

一九四六年秋，三青团柳江分团部发出邀请，在培新路珠江酒家三楼，举办一次“东北问题座谈会。”应邀出席的有柳中、柳师、龙中、县中、中正、高工、高农、大道、豫章各校的代表，每校有十名代表参加，另外又邀请宪五团政指室、广西大学、警局、县府等一些社会团体青年参加。主席是冯培仁，记录是我。

会议讨论的内容：是东北内战该谁负责任。通过一般性的发言后，慢慢地转入了正题。柳中、龙中的代表认为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在敌后抗战，就应有权代表人民接收东北。为什么就近的不准接收，要从遥远的大后方，派飞机运送大批军队来接收呢？显然内战是被逼出来的，应由蒋介石负责。宪五团政指室的杨传玉则认为，八路军应听从抗战统帅蒋介石的指挥，没有军令调动，擅自行动，就是企图扩张地盘，应负内战责任。双方以此论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直到下午五时仍未结束。最后由冯培仁按照预定的方案，以“正统”观念，同意杨传玉提出的观点。指责共产党八路军不应进军东北接收，要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否则，引起内战，共产党要负主要责任。作出了结论。当时，柳中、龙中同学仍不同

意，仍要争辩。冯培仁以主席的身份宣布会议结束。

由此，在柳中与宪五团之间产生了对立的关系，当年冬季运动会上，在北较场（即现在的人民广场），进行万米竞赛时，跑完场内二十五圈跑道才是一万米，为了圈数24与25问题引起了冲突。刚好跑在最前面两位运动员，一个是柳中的；一个是宪五团的，互相指责对方只跑了二十四圈，自己都说跑了二十五圈，由激烈的争吵导致互相撕打。宪五团则出动武装，眼看一场流血的事件即将产生。当时在体育场主席台上主持大会的团管区司令王赞斌，得报后马上驱车赶至现场，喝退了武装宪兵，隔开了双方的撕打。以并列冠军来解决这一事件。

一九四八年三青团进行了第二次团员重新登记。并奉令停止吸收新团员，目的是淘汰“不纯份子”，紧缩组织，宣布凡是未参加本次登记的团员，即失去组织关系，登记时收验团证，并在团证上加盖“已参加团员重新登记”印戳。登记后原有团员减少约五分之二，县分团部也同时裁减人员。撤去了女青股。本拟着手重编组织，又奉上级命令准备办理国民党和三青团合并工作。因而把编组工作拖延下来。

国民党柳江县党部与三青团柳江分团部组织合并是在一九四八年秋进行的。合并时三青团的组织是一九四六年的编制，有些组织早已有名无实，尤其是各中等学校团员和骨干分子，早已毕业离校。县级组织合并时，三青团柳江分团干事长冯培仁调梧州国民党县党部任书记长。原三青团人员全部撤换，只留下我任党部组织股股员，其后该股股长余绍元，调到柳江县府任社会科长，我才接任他的职位。执委和

监委都合并到党内。

党团合并又进行了一次登记，不论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都要携带党、团证进行登记，并在党、团证上盖有“已参加党、团员重新登记”印戳，以后凭此证换发新党证。这就把三青团员变成国民党员，从此，三青团组织已不存在。可是，新党证直到临解放的前一星期，全省的新党证才运到柳州，堆集在县党部内。因此，全省的三青团员仍执着团证而告终。

临解放前，国民党在柳州的 应变活动及其覆灭概况

蒋 霖

前 言

我原是三青团柳江分团部的组织股员，国民党、团合并以后，到了国民党柳江县党部。不久，原组织股长余绍元，出任柳江县府社会科长，我才接任组织股长。临解放前书记冯培仁潜逃，在报上发表了我代理他的职务。因为我一向在国民党党、团工作，在柳州的同学、朋友又多，柳州广西日报编辑部46年后全都是三青团系统人员。有时我又同他们一起去采访，对中统、军统、桂绥特务组织，也认识一些人，所以知道的事多一些，但也不见得十分准确，除非是我亲自参与的那一部分。同时，又以时间过久，回忆之下，难免错漏，因此希望了解有关事情的同志，尤其是陈显达、董咸熙、梁镇海等前辈给予修正补充！

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合并经过及目的

一九四八年夏，国民党柳江县党部和三青团柳江分团部，同时接到上级命令，限于秋季前县组织要完成合并手续；并马上要办理党团员重新登记工作，以便尽快地使团员变成新党员，纳入新编的组织之内。

党、团执、监委员会议，于四八年六月在东大路三青团部召开。出席这次会的国民党执行委员有梁镜、韦初开、余绍元、伍于捷、韦彦哲等人，监察委员刘仲辉、徐来，三青团执行委员有冯培仁、曾广亮、陈作霆、蒋霖、王剑功、董咸熙等人，监察委员杨义。会上决定合并后，国民党柳江县党部的工作人员名单，冯培仁奉调梧州国民党任书记长，陈作霆跟去任秘书。因此，柳江县国民党党部书记是梁镜，三青团的书记曾广亮为副书记长，秘书韦初开，总务股长韦超能，股员董琼熙，组织股长余绍元，股员蒋霖，罗炳莹，民运股长农超能，宣传股长黄波萍。不久，韦初开出任柳江县参议会议长秘书由伍于捷出任。组织股长余绍元调柳江县府任社会科长，缺职则由我接任。

党、团员重新登记工作，是由组织股主办的。任务下达后，即印刷党团员重新登记表件。登记步骤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按党、团员原有组织机构发表登记，一方面是由县党部直接办理失掉组织的党员登记。登记手续程序是：一、查验党、团证，并在上面盖有长方形“已参加党、团重新登记”印戳，以后凭此换发新党证；二、发填三张登记表，并附四张照片；三、收回表件审查上报。待上级复审后批发新

的党证字号，填发新党证。这项工作一直做到解放前一个月，最后一批报表才报完。将解放前几天，有一大批箱装空白新党证运抵柳州，党部办公室。所以，凡是这次参加了登记的党、团员，都没有领到新党证，下层区党分部组织也无从编整。

合并后不久，党、团派系发生斗争。副书记长曾广亮被拘入狱。在斗争期中，曾广亮找过柳州广西日报社长张洁，又上桂林找韦贇唐和程思远，这都是原三青团系统在广西实力派人物。48年10月梁镜调南丹任县长，冯培仁转调回柳州。曾广亮被释放。接着就是柳州国民党党部奉命缩编组织。第一次撤减人员，原梁系的农超能、黄波萍被撤减。第二次再次缩编，我和罗炳莹被撤，当时，冯培仁宣布用党部经费继续雇用我和罗炳莹，并先发一月薪金。又支援我一笔结婚费用，把我们稳定下来。

我是四九年中秋前一天（公元十月五日）结婚。正当我忙于婚后处理家务时，冯培仁不辞而别，并在十月七日的柳州广西日报上发表了我代理书记长职务的消息，冯培仁不交秘书陈作霖代理，是他反常的做法。陈叫工友章宗秋把冯留下的大印及一份卷宗送到我家时，我拒不受。翌日，又叫工友送到我家，丢下就溜了。我仍不去党部。那时只有冯培仁的弟弟冯洁之和一帮博白同乡占住。

他们溜走后的第二天（十月十日），武汉华中长官公署来了一位专员（姓各已忘），要工友来找我，我叫工友回答“不在家”。而他叫工友带到我家，逼我同他一起回党部把所有档案搜出来，堆集在天井内焚毁。并嘱我两件事情：

一、把新编组织转入地下，吸收骨干加入通讯网（中统组织）；二、召开工商业联席会议。嘱我回家收拾简单行李，明天带我到海南岛受训一个时期，再送回来。会见后要我带他到天星巷二十一号找铁路中统负责人鹿茂堂，当晚就由鹿招待他食宿。这次嘱咐也就是国民党在柳州给我的临终遗嘱。

工商业联席会议

我奉命后第二天，以代书记长名义发出通知。商会理事长刘郁卿，工会理事长林启明，依时到党部开会。经我介绍认识这位专员后，随着由他向工商界两位负责人布置一些事情：“紧张的时局即将到来，堆集在城里的物资要运出藏好，尤其是粮食，除留少量供市区巷战士兵需用外，来不及运走的要全部焚毁。工人要听从政府的指挥，有些建筑和机器，到时需要破坏的，不许工人抵制。这是战时的需要，目前尚需维持市场上的供应。嘱回去后开会传达。

去留问题

这是决定我前途的一件大事。回家后我认真的考虑了：家中有一个年迈多病的母亲，弟妹又小，自己刚结婚，怎能忍心抛下他们不管呢？其次无法筹备路费，不如留在柳州，还可以想法度过生活。自己不是国民党的达官要人，对国民党腐朽制度，自己也身受其害。整个大陆很快解放，海南岛吹嘘有坚固防线，能保得住吗？国民党说共产党这么坏？人少武器又差，剿了几十年，现在迅速扩大而且很快解放全大

陆。不得到人民的支持，是不可思议的。自己何必去做没落的反动统治的殉葬人！因此，决定留下，当晚就躲到朋友朱孝忠家去了。

“反共宣传大游行”的召开

一九四九年五月，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第二督导团团长）高鸿彝到柳，在体育场（今中山东路财政局——统战部后面）召开“反共宣传大游行”集会。出席会议的人除各机关、团体、学校外，还有各街道的居民。会议由专员苏新民主持，我任司仪，记录是广西日报记者邹文光，和大华报编辑曹达森。会上由高鸿彝讲话，内容全是诽谤共产党的谰言。会场上散发了许多反动小册子、传单、口号。开会时周围军警林立，每个会场出口处，都架有一挺机枪。会后在主席台对面围墙边，枪杀了一个说是共产党的人。接着由一架宣传车开路，途经东大路、中山中路、龙城路、景行路、公园路散会。沿途呼喊口号、散发传单，我和一帮记者在宣传车上，负责宣传车广播的是柳州江汉广播电台一位女广播员。

空室清野演习

在拉堡召开“空室清野”演习活动。以拉堡居民当试点。布置演习项目：①人口疏散，②收藏粮食，③焚毁房屋及一切家俱，④游击队夜间出击，⑤水源投毒……等。我担任现场摄影，然后由高鸿彝、罗培中、王景宜、冯培仁、韦初开，以及柳市各机关、团体、居民代表到演习现场参观。现场即是居民暂躲在屋里，假设的粮仓和房屋、水井上面用

石灰水画符号表明……。最后由马拔翠召集所有参加演习人员，在墟前广场上进行讲评。号召，如果今后共产党来到柳州，就要照着这样干。

开放烟（鸦片）、赌（番摊）

当时军政机构人员扩大，部队增多，饷项支給成了问题。由“华中剿总”成立华中经济委员会，白崇禧派亲信孙国铨、唐纪等委员。开放烟、赌，操纵金融，大做生意以增收入。柳州的赌捐以黄仲琴出面承包，在培新路设均益公司，谷埠设分公司。番摊、烟（鸦片）馆林立，武装保护。不惜毒害人民。

国民党各级机构的掌权人，也相继侵吞库存公款。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为工资，国民党部也是如此。柳州专员公署有一位中校医官龙某，为扣发工资不能养活八口之家把未成年的妹妹送到理发店当学徒，自己逼得执刀在公园拦路抢劫，被捕关在县府监狱，直到解放，一家人才能团聚。公开抢劫金铺的事情，也在此时发生。

桂中军政区司令部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九月，桂中军政区司令部在柳成立。司令部设在龙中。军政区司令王景宋发出请柬，在龙中大礼堂举行了成立上的招待会。应邀出席的有柳州警政、保安机关、各

人，我也应邀参加。会上王景宋说：“奉白崇禧命令，把广西分为若干个军政区，便于布置指挥作战。王某被派至这里负责。从今天起要实行军事管制、还要建立一些机构。希望在座各位大力支持，……等等。同时，宣布从明日起实行宵禁，晚上十二点以后，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一律禁止通行。有形迹可疑的人，要拘捕审察……。

警局三楼的一次招待会

两天以后，又接到军政区司令部的请柬，在正南路（今解放南百货公司）警局三楼召开茶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大多数是各机关、团体的代表，而县参议会的议员较多，尤其柳江县属各乡的参议员。会上由军政区司令部三个军官，漫谈他们家乡解放时的情况，实际上他们是在“控诉”共产党，企图达到煽动仇视共产党的目的。

报刊杂志审查委员会

成立报刊杂志审查委员会，由国民党柳江县党部冯培仁任主任，县参议会议长韦初开任副主任。所有柳州出版的报刊杂志稿件，在排版前先要送审，不合格的稿件不许排印刊登，这项工作过去早已建立，那时的名称是报刊，杂志检查小组，原由国民党宣传股，县府社会科，警局督察室，宪兵团政指室组成。曾经查封过莫林记报社和青年书店，以后党部人员编制缩减，就未有派人参加。

军政区域防巡逻队

城防巡逻队的组成，由军政区司令部一位军官负责，成员有警备司令部的韦庚修，警局的蒙郁承，县府的王继光，党部派我参加，每天乘一辆吉普车巡逻于桂柳路，柳邕路，柳石路，……等各个哨卡。了解各个哨卡盘查过往行人车辆情况，如发现问题及时向军区司令部报告。

全市户口大检查

柳州全市户口大检查，是在临解放前一天零时开始进行，七时结束。事前我也不知道，查到我家时，我才知道。见到是警局蒙郁承带来的，经介绍，有：军区司令部，警备部，省保安司令部的人员。蒙对我说：“这次查户口、事先他也不知，晚上才接到命令组织人员，这次抓了很多。”

四个支队的成立

把地方保安团队和收编的土匪组织起来，编成四个支队，这是白崇禧的部署。这四个支队司令是刘棟平、林秀山、陈伟、（还有一个忘记），这帮人在柳州市外围都有一定的实力，军区司令部又拨了一批枪枝、子弹，并配备有电台联系，和拨交一定数量的经费。还号召由县府、参议会、党部等地方主管机关名义向柳市各界筹募资金慰劳。资金筹集后，党部派我去买四十头生猪。负责屠好后，送党部集中，由他们分配送往各支队驻市区联络处慰劳。余下的肚内下水、主办和出资单位代表在党部聚餐。

商民自卫队的成立

随着时局的演变，县府奉省保安司令部指示，仰各地商会组织自卫队，详见刘郁卿《惊险的一晚》。

柳州城防工作会议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柳州警备司令部召开了柳州市城防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有秦镇、郭炳祺、韦庚修、刘郁卿、林启明、罗培中和我等人。会议由秦镇主持，他报导了柳州外圍军事布署的大致情况，要抓紧时间动员河北这而非战斗人员和物资及时疏散出去，留下少量的物资供应巷战人员使用，万一抵挡不住，撤往河南，走后炸毁浮桥、铁桥，如再抵不住，就按计划听指挥退驻山区。以后再配合大部队进行“反攻”，希望各方面组织人力、物力配合战略任务进行各项工作。

白崇禧到柳和离柳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白崇禧乘坐一架专机降落柳州机场，柳市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都到机场迎接。当晚住在东大路新建的中国银行大楼内，门口站有三重卫兵，并拒绝记者采访。三楼灯火通明，据冯培仁回来透露他听取了各方面工作的汇报，以后又陆续单独召见了一些人。新成立的四个支队司令，召见的时间比较长。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从中国银行出来了几批高级军官，也不知白崇禧是在哪一批中出来的，由柳州北岸过到柳江南岸，沿途布置有

岗警，中国银行楼上仍然灯火通明，但是卫兵减少了。当晚十点多钟，一架飞机在柳上空盘旋，向南飞走。

柳州解放时的情况

按照国民党的布署，柳州是要经过一场战斗的，连市内的巷战工作都准备了。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河北市区内人心浮动，也不知县府是否传达了非战斗人员撤离市区的指示，还是居民们知道了局势的吃紧，开始向南岸撤出。解放军进军的神速，打乱了白崇禧在广西的布署，我也料不到柳州会有这么快解放的，刚刚开完城防工作会议，尚未进行工作就听到了三门江、长塘方面发现了解放军先头部队的消息。以至连我家的家属也来不及撤出。浮桥已断了，我只得回家告诉一声只身离家。我走时发现在小南路沙街排队等待渡河的汽车长龙，大批武装的国民党各种部队，源源向南面撤退。这时国民党在柳州宣告覆灭。二十五日凌晨，柳州疏散出来的人就更多，大批的船只沿江而下，八时左右柳江铁路桥被炸毁。

解放第二天，我爱人回村（茅洲——鹧鸪江对河）告诉我解放军进城，不进驻民房，居民商店不受惊扰，市面秩序井然。若不是我爱人来说，真的有点不敢相信，为了彻底了解一下真相，来决定我的前途，通过亲戚关系，约定丘行在莲塘路冯老金家会面，潜回市区与丘行父亲住在一起，在市区巡回观察一遍。并打听共产党人对我们国民党人员的态度。又潜回乡住，再考虑。特别使我敬佩的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已令我想通了，过去国民党那些

诬蔑共产党的谰言，在事实面前已不攻自破了，我想到“得民者昌”的这句古语，才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出来自新。在柳州的国民党机构就这样结束——灭亡。

五〇年的土匪暴乱

国民党桂系声言在海南岛布置了巩固的防御阵地，作为反攻广西的大本营。因此，有意地在广西境内布置了各种反动武装，作为策应。我的前途，在短时间内必需作出决定。当时我所潜伏的地区人心还向着我，但我已看到不久自己会陷入孤立。如果双方对峙局面形成尖锐，自己就会处于夹墙之苦。所以，当我接到高天骥的信和路条时，就毅然出柳，到柳江路胜利大厦与他和魏伯市长会面，当我离开乡间时，旧军官欧阳×、朱××等还劝我不要出去送死。家人也劝我要拿定主意。出来后没有事情。五〇年三月市公安局把我扣押了。还说：“扣押对你有好处，今后你会知道的，目前不管你怎样埋怨”。的确我当时是想不通，到五〇年五月后土匪暴乱，和五一年镇反高潮时，我才觉悟过来。因为，我所认识的那些迷信武器，反攻大陆的旧军官们，一个个被俘了。有的枪毙，有的判了重刑。同时，我看到一份以我的名义去搞土匪暴乱的文件，这时我才真的理解在我立场尚不稳定时，是共产党保护我，挽救了我。

结束语

为国民党党务工作直到国民党在柳州消灭。我长期受反动思想的熏陶，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罪恶，在改造期中通过各

个历史时期的认识，自己才对共产党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坚信“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这一真理。同时在改造中，使我从一个毫无所长的普通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秦镇的投降真像

朱焕章

秦镇字超然，少年时又名济邦。柳州市水南街人。一九三九年在灵山代理新十九师师长。四七年初冬出任宾阳县长。在任不久，他制造“宾阳暴动案”，逮捕了宾阳县现职干部二十多人，（详见广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四八年二月，广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莫树杰为首的视察团到宾阳视察（时笔者在保四团任营长，路过宾阳）。不多时，他由三等县的宾阳，调升一等县的怀集县长。

一九四八年秋，他曾在柳州柳江路开设大昌行经商。当时国共间气氛缓和些时，他被诱到桂林“开会”，由广西省保安司令部的保安处长姚槐扣留后，送到桂林市地方法院看守所，（笔者于四九年六月，在省保部的徐钊先生陪同，曾到桂林法院探望过他。据他讲，宾阳案件，他是用长途电话“请示”省主席黄旭初后才着手行动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湖南解放了，广西也快解放了，白崇禧又突然想到秦镇，释放他，还把柳州警备司令一职委派他。十月下旬，他来到柳州，住在东门街唐纪的家。

由于他刚从囚犯变成光竿司令，桂绥指定驻柳的第四支

队（相当于一个步兵团）刘栋平派借一个步兵排，给秦镇接任后的守卫站岗。

十一月一日，他接印时，前任警备司令莫树杰早就带同他的“班底”走向桂西，只留下马拔翠任内连任该部的参谋长郭炳祺及十来名官兵与秦，并由郭代办移交事宜。

秦任所缺人员，多由唐纪、陈如平（秦任新十九师代师长时的政治部主任。当时的龙中校长，后在南宁、区农工民主党工作，八二年已故）介绍，也有一些路过柳州相识他的人来从。笔者是陈如平介绍充任该部参谋组组长的。

警备司令部是以甲种师的编制为规模的。该部在司令，参谋长之下设有：参谋、副官、稽侦、军法及政工等五个组和一个秘书室。

另外，有一名从未到职的副司令蒙智仁。十一月中旬，桂绥又加委了一名额外的上校副司令邓烈，他专管船泊的调配。警备部先是设在龙城中学，后移中山东路琴园内办公，而邓烈则在水上办公。

秦司令住在部里，每天除了办公外，他都带同一名携带卡宾枪的侍从副官李华到培新路找均益赌餉公司的经理孙国钧聊天，事实上，孙每日“孝敬秦价值一百个光洋的黄金。

据梁镇海记述：秦镇奉令通缉张任民并查封其财产。闻说张任民因从本省民主人士签名上书请白崇禧接受和平解放广西，遭到白的处分。

秦司令得知张任民有一辆小轿车在家，他即派副官组长莫增光（柳江县三都人），带同司机把那辆车开回警备部，占为己有。笔者对他讲，任老总算是我们的前辈，这车能用

多久？而且我们用不着几辆车，不如还了，以后好相见。他听劝，遂退还。

十一月中旬一天的晚饭后，秦镇就写一纸手令，而授稽侦组长朱为瀛（博白人原是卸任警察局长黎百竿的主任秘书，解放那早回乡了）。当晚子夜，乘小吉普车到柳新街××号，“逮捕”叶中语及×××两人，罪名是共产党人。两天后，陈如平告知笔者，四八年，叶某两人在桂林一小报当记者。秦入狱时，叶等曾撰文攻击他，因而这次他是假公济私，挟嫌陷害。叶某两人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人。这两人在解放那时，也逃脱了，后来曾在市人民文化馆工作过。据叶对笔者叙述，他们遭捕时，曾被搜去百多元的硬币。

桂特头目梁学基的一名喽罗刘铮，流落到了柳州，秦任刘为稽侦组的一名少校副组长。刘向秦推销梁学基的坑害善良的手法，拟印一些“特工人员登记表”分发各旅社、客栈、理发室、浴室，要各工友每人填写一份，送呈警备部，就算是警备部的“特工人员”。责令工友们，凡遇见有行迹可疑的共产党人，就马上报部，以便追踪、搜捕。秦命刘迺与郭参谋长研究办理。郭是笔者初中不同班的同学。因而对他讲，刘的办法是徒有其名，没有作用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请考虑！事遂罢。

十一月十九日，桂林解放前时，白崇禧乘飞机逃到柳州，住在中山东路中国银行。桂中军政长官王景宋 带同 秦镇、县长罗培中、警察局长王景宜等人去机场候迎，并听候分咐。

二十日，秦面着郭炳祺亲拟计划，召集柳州专保公署、

县府、警察局、宪五团驻柳的一个营、军统柳宜小组、中统柳州小组、桂特柳州小组、铁路护路第二团等等有关单位的代表到警备部开紧急会议。会议是在21日和22日两天的下午举行，均由郭炳祺主持。第二次会议中，秦到会走了一转。在会上，郭布置在二十二日晚，全市户口大检查，目的是要搜捕暗藏在柳州的共产党人。两次会上及开始行动时，都未见郭出示“黑名单”。这次大检查，由各有关单位拼凑了二百四十多人，以警察局的巡官、警佐、宪兵的排班长为主，每五人编为一个组进行检查，共编成四十个左右的小组。其余的人，分为三人一组的游动岗，负责“解送留宿不报”的人。（第一次散会后，笔者将大检查之事告知小南路大丰商店经理余绍祥，请他迅转陈如平）

大检查是由二十三日晚十时起，开始宵禁，至二十四早上七时结束。柳市南北两岸，以留宿不报的“罪名”共‘逮捕’了七百多平民！全部关在映山街的映山戏院内，交由军法组长韦××、军法陈标芳（此人住小南路斜坡杂货店南邻）和另一军法曾美川（此人是龙中学生、西大毕业，陈如平介绍，解放后在桂林市当教师）三人处理。这些人中，凡有相识官场中人者，知会一声，走了；不识官的人，就每人罚大洋三块，也放了。大约共收到罚款几百元。

二十四日下午两点钟，白崇禧在他的侍从伴随下，去机场飞逃南宁。接着，桂中司令官王景宋部送来一份密件。要警备部派员监督工兵第十团，爆破柳州的电厂和水厂！四时许，王景宋又乘车来警备部找秦镇、郭炳祺秘谈。郭随王走后，笔者对秦讲：柳州现在约有八万人，要是一天没有米，

当然会乱，没有水和电，可能也会乱。司令！能炸水、电厂吗？！秦反问怎么办？我答：我们以不明工十团的下落，不便派人监督为由，退还原件。秦同意，我即直奔王部。面见该部参谋长周禹（原名复盛，我初中不同班同学）。那时，周已是“远行装束”。我将原件置其桌上，同时简陈理由。周微怒复苦笑地讲：不大合适吧！后来的事实是25日清晨，工十团去炸厂，厂的护厂工人们只好接受匪徒的讹诈勒索，两厂才免遭炸毁。

白崇禧离柳 不到一个小时，柳州专保公署的人员及家属，首先向南岸移动了，一些路经柳州的单位也相继而动了。黄昏时，浮桥一度下沉！

二十四日晚八时许，柳江县长罗培中偕一亲随来警备部。罗对秦讲：“超然兄！我向你面报两件事，（1）我知道专署已经在焚烧文件档案了，刚才，我也着人将县府的烧了。（2）据我的侦缉队陈队长汇报，闻说有些散兵游勇，准备在共军未到之前，劫抢、焚烧停在小南路上待过车渡的几十辆商车。我们县是无能为力的，王景宜要我向你面报，你看怎办？”秦命人请郭炳祺来商置，但郭未归，罗遂辞去。秦命秘书陈冠猷、参谋钟长义督焚所有文件。快近十点钟了，笔者向秦谈散兵游勇滋事问题：国共相争，我们无权无力过问。柳州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世代住在这里，民国十七年的大火，决不能重演！否则，就对不起祖先和后代！秦曰：“你去找王景宋司令官，请他拿主意！”我讲：“王景宋不是我们柳州人，可能他已跑了，找也无用。依我看，王景宜见你不走，他也不敢带警察走的。刚才，我还看见撵了

背包的交通警在站岗，要是司令你能出现在他们面前，我猜想他们是不敢比你先走的。”秦寻思片刻，遂命持卡宾枪的李华着司机开小吉普来。于是我们就在北岸各大街上缓慢地巡视了一遍，回到部时，郭炳祺已躺在秦的床上。

秦见郭时忙讲：“刚才不见你，我们出去逛了一圈。”茶后又对郭讲：“老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才好？”郭不假思索即答：“白光头一个战斗兵也不给你。他也不叫你打。现在怎么办？就是三十六计那一条路了。司令！对不？”沉默片刻，秦又开口讲：“两位老弟！（其他人，有的五天前走了；有的近两天也不来了，当时，大约仅有二十来人，而在秦房内的，只郭与笔者）你们和我一块走向南宁好吗？到了那边是有办法的，天是无绝人之路的嘛。”郭即应曰：“不去南宁，也就没有路可走了。我们马上走！”我即接着讲：“两位老大哥！我不跟你们，谁又还能带我走。请允许我回家禀告老母，取件衣服马上来随（其实我们三人是同床异梦一分道扬镳的）。”秦对我讲：“快去快回！”并着司机开车送笔者回家。我在家静候解放。这时已是子夜了。

附 笔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约七点钟，陈如平、赖德昭两人到我家对我讲：“有一帮散兵游勇去培新路抢我们的布（大批的棉布，是在武汉解放前几天，白崇禧命唐纪派人劫运来柳，交陈如平、谭权、李松先等人保管和变卖的。一部份分存在罗池路现在的市印刷厂内秦集如的家，另一部份存在培新路唐纪所有的屋内），我们特地来找你去‘止咳’！赶快换‘蛤蚧皮’！”我只好叫一名过去跟我当过班长的苏焕（此人解放后，在邕贵航道上做水手）跑去龙中要那挺冲锋枪，我也

腰带手枪，随同他们去“止咳”。这帮家伙见到了真枪实弹，就鸟兽散了。可是来晚了，还是被抢去几十匹棉布！待我回到家时，已听到稀疏的解放枪声了。

十二月初，匿居在柳江县里雍乡、走投无路的秦镇闻说，高天骥出任柳州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党代表是沈章平，陈如平、赖德昭与笔者参与工作。他遂派人（我忘其姓名）向高表示：愿意投诚。高与沈向上级请示后，他在中旬的一个傍晚，到了高的私宅。高等决定，安排秦暂住笔者家，并命他写一份“坦白投诚书”。

（笔者记得，他这份投诚书上坦白了一点：十一月二十二日，白崇禧当面授意他，广西“沦亡”后，在邕柳线上，组织一个师打游击，待机配合“反攻”。

不几天，笔者奉命陪同这名投诚将，他身穿灰棉布长衫，头戴一顶旧毡帽，很狼狈地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部队投诚。

投诚时，他除了呈交坦白投诚书外，还上缴了黄金三十两。据他说是白崇禧给他打游击的经费。（事实上是三百多两黄金。）

又几天，柳州市军管会成立了，笔者又陪他去军管会报到。他投降后，一直是自由的。

柳州改编委员会迁到浮桥北端的一家旅社办公。秦镇就搬到那儿住。

改编委员会的主任，是柳地区专员魏伯（后专任柳州市长）兼任。主要负责的是地区公安处处长周海如（他目前可

能还在柳铁党委工作），赖德昭也参与工作。

不久，秦镇接到他老婆从香港的来信，说是生了重病，盼望他去“照料”。他就借此为由，请“探亲”假一个月。得到了魏主任的批准。

一九五〇年春节的第二天，他在改编委员会的楼上，请了周海如、陈如平、赖德昭和笔者吃了一顿饭（也请高天骥的。他婉谢）

第二天年初三的早上，秦镇坐火车走了。大约一个月，他从香港来信，说是他老婆的病未愈，请求续假一个月。之后，就杳如黄鹤。

惊 险 的 一 晚

刘郁卿

1949春商会理事长刘郁卿，接到县府一件公文，内容大意是遵照广西省保安司令部的指示，为了保护后方治安，安定民心，仰各地商会组织自卫队，文件还附有组织办法：枪械由商会自己购买，经费和以后给养由商会自筹自治……。

当时县商会正是多事之秋：恐吓信啦，广东同乡会迫迁商会会址啦，商号倒闭的债务纠纷啦，一系列的问题，要理事长去处理。县府这个通知，要商会组织自卫队，是史无前例的事；刘郁卿是没有经验的。在48年未被选任理事长之前，他只以为商会不过是一个社会团体，只有为商号企业排忧解难的任务而已。殊不知遍地荆棘，已经烦恼重重，又来个组织自卫队的命令，怎么办？！只好请柯秘书来商量，柯传滨已是两任商会秘书了，做事慎重，经验丰富。他已看了县府这个通知，他说不好签意见，只好交理事会讨论，柯秘书已经考虑到，这件事要筹钱，买枪，要人。买枪还是一次过，以后的给养，长期下去，经费不易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军事常识，招募来的人，良莠不齐，难于管理，办起来了，县府要你去哪，不得不去，不办也不好。

后来常务理事张文英、谭竹铭、崔东山、江涛几个人研究，只好召开一次监理事联席会议，来解决，开会结果：一致认为商会不能办自卫队，一办起来，事情就多了。就把这件事搁下来。

春去夏来，时局一天一天紧张。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县府又来一个筹措军粮的通知，要商会拨给军粮五千斤，理事长刘郁卿觉得上次组织自卫队公文，已经搁置暂时不搞，现在要借军粮，我们也没有。于是，也把它压了下来，事实上当时商会经济也很紧张，能推就先推了。

再一次县府直接来了个传票，要商会理事长于当天下午三时到县府财粮科，这又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想叫别个常务理事去，是没有人愿去的，刘郁卿只好自己直接去找韦瑞霖县长讲讲理，为什么用传票传理事长？谁知韦瑞霖已去了桂林。不得不到财粮科去问个究竟，原来就是追索那5000斤军粮，不得以任何借口，拒办，没有米就筹款买米，按米价交钱也可，明天就要交来，再拖就是违抗。第二天只好将5000斤米的价款交去，才解决了问题。

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后，县府再次催促组织商民自卫队，三伏天，特别炎热，赶着开会讨论，这次是各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联席会议，结果仍然是迟办不如早办，不办也得办。其实不少商号希望商会组织自卫队，因为听到一些地方在国民党军队撤走时，商店遭到掳掠，有自卫队维持他就不敢。讨论到谁来负责时，大家一致推举陈潮鸣为大队长，财务则非粮食业理事长苏伯城不可，经费则采取一次募捐办法。不久民生粮行倒闭，损失自卫队经费一万多斤大米，后来又重新推举庞晋担任。这时韦瑞霖已调桂林，罗培中来接充县长。

汉口解放了，九、十月间，自卫队已买有七、八十支步枪，当时的桂中长官已是王景宋。湖南起义了，反动派更加紧张。王景宋第一次要商会负责人到长官公署会见，要商会

筹点钱买迫击炮、机枪，加紧训练，配合作战。我们的意图是与他们的意图相违背的，商民自卫队只是准备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解放军尚未到达的真空时间，出来进行自卫的。因而拖到十一月中旬才正式成立商民自卫队。

国民党军队撤回柳州的越来越多，商店倒闭的也越来越多，谣言更多了，有说解放军已过冷水滩，也有说到了三江融安，情况不明。眼看柳州就要解放了。商会不得不做好准备工作。既不能明目张胆的反对国民党的措施，又要到时能做到保护商民的目的，困难是不小的，万一做得不谨慎，就有身命的危险，经过常务会议的研究，决定召开联席会议，并邀请地方父老参加，

十一月廿二日下午商会的会议决定，商民自卫队任何时候，不撤出柳州，准备在几条大街设置闸门，以维持市内的临时治安。不知谁把这种决议精神，报告了罗县长，廿四日下午四点多钟，县长罗培中亲自由县府来电话，要商会理事长刘郁卿马上到县府。这时县政府已经翻箱倒笼，乱七八糟，作紧急撤走行动。刘郁卿上到县长办公室，罗培中正在清理各种文件，办公室里一团糟。见面就问，你们商会召开了个什么会？刘说没有什么会。罗说：你们前天开的会，是什么会？是想造反吗？你们的会开得好！秦司令（警备司令秦镇）叫拿你的人头去见白总司令。罗接着说：现在你回去，今晚七点钟你到警备部去见司令吧！当时刘郁卿被吓得一身冷汗，饭后马上到商会找陈潮鸣、叶日青几个人商量，去还是不去？他们说不去，事情更不好办，去了，解释一下，解释得通就算了，万一扣留人，我们再设法营救你，等

你回来才走。

刘郁卿硬着头皮，七点钟到了警备部，一到办公室就遇到朱焕章，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秦司令叫我来不知有什么事？他说，你进来吧，司令部这时也已做撤退工作。我向秦镇打招呼，问道：秦司令叫我有什么事？秦镇说：坐下吧！这时刘栋平、罗培中也先后到了，警备部这时电话来个不停，一片忙乱，在秦、罗、刘的谈话中，对前方的情况完全不明。电话传来，刘栋平问“沙埔电话为什么不通。”刘郁卿这时看见情况紧张，就向秦告辞，秦不表示什么，但罗培中却下命令要商民自卫队在商会集合，晚上一点钟由他派副官来通知，一同撤退过河。刘郁卿心想只要你给我走就得了，口头上连声唯唯！

刘郁卿回到商会，几个常委和关心时事的庞晋、张国英等都在理事长室，焦躁不安地候着他回来，一见了面大家心里才放下一块石头，刘郁卿把在警备部看到和听到的电话情况，以及罗培中的命令向大家一讲，大家都觉得柳州解放就在明天了。但今天这个晚上怎样摆脱反动派的控制呢？怎样在这紧要关头维持市内的治安呢？陈潮鸣作了个安排：在刘郁卿家里临时安个电话，由商会总机直通；商会派人值班，有事马上通知刘郁卿即刻走开，不给反动派见面；商民自卫队分成南北几个队，分段巡逻，不给散兵游勇乘机作乱，如果县府真的来传令撤退，则以收队不回的理由，硬拖过去；并且交代河南的自卫队长，保护浮桥，不准反动派撤退后拆毁，如果拆毁就开枪打，使解放军进城时能一直逼过去。由于解放军的进军神速，反动派仓皇连夜退走，当晚平安无事，第二天一早解放大军进入市区，柳州市获得了解放。

质疑 订正 补充

“覃连芳一九四四年柳州沦陷前被挟持去重庆”之说，不是事实的考证

文史室

关于去年我会编印《柳州文史资料》第二期，其中有《覃连芳生平简介》，内载：“一九四四年柳州沦陷前覃连芳被戴笠挟持去重庆”一语（见该期190页）有读者疑无实据。经我会研究，进行调查，兹考证如下：

一、已去函全国政协，转请沈醉先生回忆、了解。旋承沈醉先生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函复：“（云云）见附抄”。

二、我们再就近走访本市第二空压机厂的退休老工人王碧广。王系南宁人，当李品仙任广西边防督办时，他在督办署当餐厅招待兵，覃连芳接充督办后，他继续被留用。覃调任师长，他跟覃当卫士。后来学会开汽车、修汽车，得到信任，随从覃连芳直到一九四九年去香港之前。解放后王碧广在二空当修理汽车等技术工人。

王碧广回忆，称：“柳州沦陷前几个月，胡子（指覃连芳）将离柳，叫我去向汽车工友借钱，以后在连衡（覃连芳

七弟）手要钱归还。胡子那次出走不带随从，有陈督军的一位小姐同机飞往成都。送行的有：覃采如（覃连芳的二哥）、刘棟平、覃继雄、陈振尧（陈小姐的侄子）同我（王自称）。

根据上述查考，可知“一九四四年柳州沦陷前覃连芳被挟持去重庆”之语不是事实。

当时我们审编此文时，未经详细查对，便遽然刊载，工作未能深入，并向读者致以歉忱。

抄沈醉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复信：

【关于贵辑所刊覃连芳被戴笠挟持赴重庆一节，据我再三回忆，一九四四年七月间，戴笠没有去过广西，因我当时任军统总务处长，常在他身边工作。再说，广西方面当时有军统局桂林办事处和军委桂林办公厅民众情报处两个单位，由杨继荣、曾坚等大特务在负责。办这一类事，戴笠不会亲自出马，而肯定会派在广西负责的大特务去执行。

覃连芳安排在南温泉，我过去也没有听说过，因当时南温泉一带是C、C系统所领导的匪中统局势力范围。匪军统软禁或囚禁的重要人物，如廖承志、叶挺诸公，均系军统控制的磁器口匪中美合作所范围内。凡军统囚禁软禁的重要人员，生活照顾上都由我亲自安排。我对覃连芳在南温泉的情况，一点没有印象。】

广西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搬迁情况补充点滴

刘启陆

1952年12月至1953年1月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柳州高工调整搬迁情况如下：

机械科 合并成立武汉汽车制造学校，先搬迁到长沙市上课。1955年汉口罗家墩校舍建成后，从长沙搬到武汉市。学校全称：第一机械工业部武汉汽车制造学校。

土木科 搬到湖南沅陵县城，成立武汉水利学校沅陵分校。1953年9月合并到武汉水利学校。校址在武昌洪口。

矿冶科 合并成立武汉地质学校。

电机科 合并到郑州成立郑州电力学校。

化学科 待查

柳州高工为当时中南地区具有一定规模，学科设置完善的一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目前很多已成为企业领导干部和高级工程师，分配在全国各地。从解放初期一直为祖国建设在努力工作。柳州高工为国家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高工机械厂为当时设备较好的实习工厂，学校搬迁后，工厂仍留在柳州市，扩充成为“柳州农业机械厂”，八十年代改为“柳州汽车厂”。当时校长是李荫白，教务主任是刘育奇，工厂经理是邱圣德。

学校当时不设水利科，但土木科开设水利专业课程。解放初期为发展各县水利事业，在柳州曾办过水利班，培训各县干部，属短训班性质。年深月久，情况记不清，希知情同志补充指正。

编 后 话

今年来，全国各地出版文史资料，风起云涌，随着慧寄赠阅——传经送宝，我们受到启发和鼓舞。同时，本市党史办、柳州日报社、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对我们大力支持，现已将有关文教、司法、交通、经济及其他方面文史资料选辑为《柳州文史资料》第三期稿件，经交由柳州日报社印刷厂承印，赶在今冬出版。各兄弟单位帮助我们完成这项计划任务，深深感谢！

我们今年征稿工作中，有从古迹、文物里追溯、研究辑成的稿件，给我们认识到，随时随地应注意文物的征集。例如本期所载《立鱼峰上石刻》、《广西柳州市灾区图》《清末两张学业文凭》、都是具有相当价值的文物。

我会于今不仅征集有关地方的军、政、经济、文教、卫生、社会各方面历史资料稿件，全国各地的资料，我们也广泛收集，同时征集各方面的历史文物。敬希读者广为宣传，予以支持！报酬从优。还可以按质议酬。

编者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柳州文史资料 第三期

作者=

页数= 2 5 2

S S 号= 0

出版日期=

目录
正文